



余慈度传


吴秀良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余慈度传

吴秀良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慈度传 / 吴秀良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08-1449-5

I. ①余… II. ①吴… III. ①余慈度 (1873 ~ 1931) —传记 IV. ①B97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2036 号

余慈度传

作 者 吴秀良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9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49-5

定 价 37.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二十世纪初中国 教会复兴的内在因素

近20年来，海内外对中国教会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有关中国教会史研究的书籍和论文，每年都有不少新作出版和发表。作为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重视。美国波士顿学院历史学教授吴秀良博士的这本《余慈度传》一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再次挖掘和展现了中国教会史中许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该书以传记的形式讲述了中国教会中最早的女奋兴布道家余慈度的一生，着重介绍了余慈度的属灵经历、在教会中的奋兴布道活动，以及对中国教会的复兴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众多学者对中国基督教会史的研究相比，吴教授的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突出的特点：

首先，与其他学者从社会、文化、外交等外在环境的角

度研究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不同。吴教授着重从教会内部、从信徒属灵经历的角度来探讨教会在中国的成长。基督徒的信仰在不同国家、文化中的传播及发展，固然受到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发展的动力最终还是来自信仰本身。因而，从教会内部、通过透视信仰的历程来研究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就显得异常重要和必不可少。余慈度作为中国教会中最早的一名女奋兴布道家，其信仰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我们了解她那个时代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吴教授的这项研究不是对历史书籍的整理和总结，而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追踪和揭秘。据我所知，中外学者对余慈度的研究非常缺乏，已出版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作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循，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吴教授花了五年的时间，透过各种信息管道，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经过严谨的数据检验，像一名侦探那样，向我们一步步、一层层循序渐进地展示了余慈度的生平经过和属灵历程。这项研究本身也是吴教授历史治学方法论的现身说法。读毕该书，读者们不仅对余慈度的一生有所了解，而且对如何进行历史研究也会大有所获。

第三，吴教授在这项历史研究中，秉持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对余慈度属灵经历中的高潮和低潮都做了全面、真实的记载，而非报喜不报忧。也许有不少人会认为，传道人

或教会中的属灵领袖都没有信仰的低潮，在属灵生命中都没有任何危机和困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每个基督徒，包括传道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余慈度也不例外。把余慈度属灵生命中的低潮如实地记载下来，使我们了解到信仰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这对于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特别是处于低潮的时候，如何去面对挫折，相信会有所帮助。

《余慈度传》是一本既有学术深度，又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对教会内外的人士都会有所帮助。对教会外的学者和大众来说，该书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内在因素；对教会内的信徒而言，该书则使他们更清楚地看见上帝在中国信徒、教会中奇妙的工作，从而获得激励和鼓舞。

王忠欣

王忠欣为波士顿大学教会历史神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教授基督教会史，著有《波士顿华人基督教会史》、《传教与教育》等书，现任“北美华人基督教会学会”会长。

与上帝交接的生命记录

本书所依据的最重要史料是余慈度在 1916 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见证。它是一本六十几页的小册子。1927 年，她又在原册里增加了一章。这篇见证并不是她为自己所写的“自传”，而是一篇“灵程自述”。在这篇“自述”中，她叙述自己一生如何经历上帝的“对付”（包括成全和引导），因而她就给她的见证定名为《上帝如何对付余慈度》（*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这本小册子，并不是她自己生平的详尽的记载，而是她内在生命与上帝交接过程的记录。她的见证，不是述说“她”如何“为上帝做工”，而是述说如何在她身上“被上帝作工”。她见证的焦点是“上帝”如何拣选了她，“上帝”如何像一个陶匠，借着内在生命和外在环境，把她塑造成合乎他用的器皿，以便借着她来完成上帝在那个时代的旨意。因此，在她的见证里，对于她“个人”的事，诸如人物、事

件、时间和地点，这些构成“自传”最重要的史料都非常缺乏。即使有时她顺带提到一点，那也是因为这事可以说明上帝在她内在生命里的工作，或者与上帝如何在她性格上的塑造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她的见证里却充满了属灵的经历。她提到如何与上帝有亲密的交流，也提到上帝在她生命里的引领。她也毫不犹豫地承认，她在对上帝的回应中所犯的错误，所经历的失败，以及自己的软弱。她也坦率地描述自己如何因为不顺服上帝而在内心引起的挣扎、冲突、痛苦以致于绝望。她在见证中用一个反问句说明自己的不配。她说：“上帝在我的里面，岂能找到任何的理由，竟然使我能配得他白白地向我倾倒出来的大爱吗？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我的里面没有别的——只有罪恶、败坏和贫乏。”因此在她的见证里，她让我们看见并不是“她”在上帝复兴的工作中为上帝做了什么伟大的事，而是那一个伟大的“上帝”通过一个不堪的器皿发起他复兴的工作！

因为余慈度对人性的洞悉，她并不相信任何人可以为别人写出真实的传记。她在见证的序言中声称：“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生命里最深处那些深深扎根在我们里面的罪和软弱，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胜过；也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所犯的错误和我们所经历的失败。这一切情况只有我们自己和那位一直以他无限的慈爱和忍耐来包容我们的主知道。”因此

她曾告诉她姐姐，如果她一旦突然故去，绝对不要为她写传。

但是，后来因为一直有人敦请她的缘故，她终于感觉应当把她如何在一生中所经历的“上帝信实的对付和带领”（God's faithful dealings）见证出来。她的决定是缘于以下两种考虑。她说：我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正经历我自己在过去人生旅程中所遇到的试炼和艰难，因此我觉得，如果把我一生中是如何蒙受上帝的恩典说出来，也许会对他们有所帮助，成为他们的鼓励。

“另外一个影响我作此决定的理由是：当我读到一本别人为我一个已故朋友所写的传记时，我发现其中有些事情，如果是我朋友自己写的话，他（她）就一定写得不同。”

有两位内地会著名的传教士看过她的见证以后，曾经作了极具属灵眼光的评述。一位是费琦教士（M. M. Fitch）。他说：“在这本小书里，所呈现的脸看来的确是余慈度的面孔，但是，我们在旁边观看这一张面孔的构成乃是那一位上帝，他像一个熟练的画家一样，亲手用他那神奇的铅笔，一笔一笔地在他拣选的活石上，为着建造他的灵宫而绘画出来的。”另外一位是内地会的主席史隆（Walter B. Sloan）。他在为余慈度见证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她的自述“在本质上实在是一个人在她内心深处和上帝交接的生活记录。”史隆也指出，余慈度之所以能够达到“圣洁的生命和维持与上帝不断交通”的境界，其秘诀并不仅仅在于她的祷告和属灵的追求，也在于她一生中对于“罪”

深切的认识，以及她不断对付罪的生活。

余慈度在她的自述中竭力避免谈到她“自己”。因此，对一个非信徒而言，它读起来也许会无法理解；即使对灵命不深的信徒来说，也会显得有些深奥；而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来说，也许会觉得毫无“历史史实”可言。因此，笔者在以下的篇幅中，试图把她似乎过于抽象的属灵自述作了一番详细的注解，同时，也把她放在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环境中，包括上帝在中国教会复兴中的奇妙作为，以期使她成为一个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

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对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加以修正。根据这个传说：余慈度在年幼的时候曾被父母送往英国去学医，结果船到法国马赛港时，她受到圣灵启示，毅然放弃留学，返回上海。这件事引起她父母的愤怒，甚至要与她断绝关系等等的说法。这一则动人的故事最早见于金倪尔（Angus I. Kinnear）医生所著的倪柝声传《中流砥柱》（*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中，以后也散见于其他的书里。^①笔者与金医生通信查对此事后，他很谦卑地写信给笔者说，他把这个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纳入他的著作中，实在是一个“大错”（bad mistake）。笔者和金医生从上世纪 50 年代就在主内认识，他于 2001 年夏，曾邀请笔者到伦敦和他共同修改他的原著，以期尽速将修正版刊行以飨读者。可惜他在 2002 年秋因血癌病故。

本书依照《圣经》中对历史的写法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原则：教会的历史包括复兴史，它不但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涉及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新约中的《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教会史。它不但是一部“使徒”的“行传”，更是一部“圣灵”的“行传”。使徒们的布道活动，从开头就是由上帝亲自主导。保罗和巴拿巴是“被圣灵差遣”出去布道的（徒13章4节），他们的布道活动也是受上帝所引导的：当他们的行动违背上帝的意思时，上帝会“不许”甚至“禁止”（徒16章6-7节）。同样，我们今天读教会的历史也好，写教会的历史也好，都必须看见上帝在历史中所扮演的地位。我们必须根据这一个《圣经》所提出的观点，才能理解余慈度的见证。

余慈度的见证的中心是要阐明上帝对她个人的带领，也多次提到上帝如何在奋兴会中感动参与聚会者相互认罪，彼此赦免。正如美国著名的教会复兴史家洛福莱斯（Richard Lovelace，葛登康威尔神学院教授）评论说：在教会经历复兴时，如果我们忽略了上帝在背后的工作，而单单注意到“人”的活动，“那就像我们观赏美式足球时，我们只看见一队球员跑来跑去，而另一队却是隐形不见，我们将会觉得那一队跑来跑去的球员们不知在做什么，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如果我们以这个观点来看余慈度的故事，我们就能对教会的复兴史有深入的理解。

本书的摘要，曾于1999年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神学院主办的“世界基督教潮流：传教与性别”（Currents in World Christianity: Missions and Gender）专题讨论会上，以论文方式宣读。笔者感谢与会的神学家和教会历史学者们所提供的评论和鼓励。在专题讨论会上，韩国教会历史学者玉圣得（Sung Deuk Oak）博士，曾致力于监理会在朝鲜传教史的研究，并且搜集了不少有关“俞灵芝”的资料。当他获悉俞灵芝就是以后在中国的著名女布道家“余慈度”时，他就把他所搜集的宝贵资料全部供给笔者分享。因此本书中有关余慈度在朝鲜期间的几个疑难问题，如“金永准事件”，都应归功于玉博士的帮助。

在韩国“福音书房”事奉主的 Jang Mi Beck 姊妹和 K. H. Kim 弟兄，曾经为笔者到“培花女子学校”查询有关余慈度的数据，使笔者得到不少继续追踪的线索。另外，笔者非常感谢美国“联合监理会档案馆”（United Methodist Church Archives）所提供有关联合监理会在中国和韩国已刊和未刊的资料。本书原稿曾寄给数位对中国教会史有经历或从事研究者赐与评论，包括江守道弟兄、余洁麟弟兄、梁家麟教授、赵天恩牧师、庄祖鲲牧师和王忠欣会长。笔者对他们所做的改正和提出的宝贵建议，都非常感激。至于尚未发现的错误一定不少，未能看到的资料仍待发掘。笔者切盼读者多方协助，以期再版时加以修正。

前 言

余慈度与 20 世纪中国教会的复兴

笔者于 2001 年夏季访问杭州，当时我就想：这个美丽的城市原来就是余慈度的故乡。她于 1873 年在杭州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大院里出生。那时她的父亲正在学习做传道人，等于一个非正式的神学生。她从幼儿时代就对杭州存留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回忆。她记得两岁半时，她的父母被派到杭州附近的一个小村落去牧会。那个村落只有 24 户人家，但村落的周围都是一片片美丽的茶田。有一天笔者在“龙井村”的路旁一个小茶亭喝茶，茶亭的对面就是布满茶树的山丘。那时，我不禁回想起余慈度自己的一个见证。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当我父亲带我去茶田里散步时，我常常在山丘上的茶树丛中跑来跑去，尽情地玩耍。”

现在离余慈度出生的时代已相隔 130 年之久，但杭州郊区的自然景色，依然美丽如故。那里仍然有一波波起伏的山丘，山丘上仍然布满了片的茶丛，杭州的龙井茶仍然像 19 世纪一样受到国人的喜爱。但是今日杭州郊区的农村，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广大原野中，已经和一百多年前余慈度幼年代大不相同了。

这个地方是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区的萧山县（现在是杭州的一个区），也是当日中国大陆众多的教会复兴中心之一。根据 1949 年上海福音书房刊行的《执事报》记载，当时这里“地方教会”（俗称“聚会处”）中信徒的人数不过 2000 人，而现在的信徒人数极有可能已经超过 11 万。从中国教会整个的情况来看，在 1949 年，全国基督徒人数不过 70 万，而目前至少已经达到千万^①。当我们追寻今日这种复兴现象的根源时，我们自然要从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时代来寻求答案。我们要问从 1900 ~ 1949 年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我们要想得到圆满的答案恐怕要写几本书才能讲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为这个复杂的故事找到一个合适的起点。

要想认识 20 世纪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可以用 20 世纪上半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余慈度作为我们研究的焦点。除了她具有代表性以外，我们还有更多把余慈度作为我们研究焦点的理由。她在中国现代教会复兴史中的重要性，

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第一，她是中国人中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经济支配，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并且她还是位女性。

第二，她是现代中国传道人中间，唯一被邀在国际上最具属灵权威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上，作为主要发言人的。

第三，她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和每年夏冬二季的查经培灵会，为中国教会训练了许多称职的女传道人。

第四，余慈度的属灵果子，对中国教会 1930 年后第二期的复兴运动，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她最重要的属灵果子就是倪柝声。在 1920 年的一次复兴大会中，17 岁的倪柝声因为听见余慈度的讲道而得救，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接着上帝借着倪柝声在中国发动了“地方教会”中的复兴运动。1949 年后，倪柝声的“属灵异象”借着他的同工们和跟随者，把教会复兴的洪流带到世界各地——由台湾到东南亚，以及日本、韩国，最后又流到美国，遍布世界六大洲。倪柝声的书籍已经成为全世界有心追求属灵的基督徒们非常珍贵的读物。他的《正常基督徒生活》（*Normal Christian Life*）一书也已经被译成数十种语言，销量达百万册以上。如果要追本溯源，我们可以说，没有余慈度，也就不会有倪柝声，自然也就不会有上帝在全球性的地方教会中的复兴运作。

她的见证也证明她早期并没有去过英国，乃是在 1913 年（那时她已经是 40 岁的人了），才第一次去英国。可是她的见证对于那些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实在是令人失望。因为在这个见证中，凡是有关她生平的重要史实，诸如人物、地点、时间和事迹等重要因素，她都避而不谈，而只注重她如何“受上帝的对付”，上帝如何使她成为一个“基督十字架的使者”。

关于余慈度的史实

她的见证着重说明，她的内在生命如何经历上帝，上帝如何用外在环境里的各种人、事、物做为“工具”来造就她。关于史实方面，她的见证中只提到，她从 15 岁那一年开始念了 8 年的医学院，但是关于那个医学院的名称、地点、教授阵容、设备、课程以及学校的生活等重要史实却只字不提。因此，任何人若想从她的见证中去研究西方医学院在中国的历史，一定会大失所望。

她的见证提到，她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就离开中国到朝鲜（俗称高丽）去做传道工作，但是她却不提她受什么差会派的，是跟谁去的，只说她是因“朋友”的邀请，就答应与朋友同往。至于那个朋友是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男是女？她一概不提。

纵然如此，我们获得了余慈度的见证，对笔者的“侦察”工作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在她的见证集中，我们至少可以察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史实。根据这些零散的史实，我们得以从英文和韩文教会史料中，发掘到更多有关余慈度的资料。

但是，我们最终所能找到的还是相当的零散。因此在以下的篇幅中，您也许会发现这一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勾画出来的余慈度，并没有什么令人特别兴奋之处。但是，您如果和笔者一同分享似乎是以侦探的身份来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曲折的侦探过程（也就是历史研究法），以及我们对余慈度的生平所发掘出来的结果，同样产生兴趣——也许对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会觉得更有趣些。

目 录

第一部 家世与童年

第一章 动乱时代的家世/003

第二章 杭州愉快的童年 009

第二部 博习医学院

第三章 医学院在哪里? /017

第四章 医学院期间灵性的成长/033

第三部 朝鲜半岛的华人传教士

第五章 监理会到朝鲜/043

第六章 开创妇女工作/051

第七章 回国就医/059

第八章 重返汉城/065

第九章 回国前的挣扎/073



第四部 复兴的洪流

第十章 复兴洪流到东方/083

第十一章 复兴洪流到中国/089

第五部 信心生活的构成

第十二章 信心生活的开始/097

第十三章 信心能力的根源/107

第六部 复兴职事的转变

第十四章 复兴运动的高峰/113

第十五章 复兴运动的同伴/121

第十六章 复兴培训的建立/129

第七部 复兴布道的果子

第十七章 江南的大家闺秀——汪佩真/141

第十八章 热衷革命的女强人——林和平/149

第十九章 雄心勃勃的大学生——倪柝声/157

第八部 复兴运动的继续

第二十章 福州大复兴/165

第二十一章 上海大复兴/175

第二十二章 信仰的捍卫者/181

结语：余慈度复兴职事的时代意义/189

注 释/205

结 语/215

引用书目/217

中英对照表/229

目 录

第一部 家世与童年

第一章 动乱时代的家世

家世点滴^①

余慈度的祖籍大概是在江浙一带的乡下（地点不详）。根据她的见证，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拥有一个庞大的庄园。那个庄园是她祖父用了2000万墨西哥银元所建造（至少相当于今日数百万美金）。庄园四周的围墙有三里之长，不幸的是，偌大的庄园竟遭祝融之灾，一连烧了三天三夜。大火扑灭后，她祖父的财产几乎全部烧毁，只剩下一幢个人的住宅。

从此以后，她家道中落。大概是在祖父去世以前，她那个年轻的父亲就开始行医。那个时候西方的医生传教士刚刚进入中国，而余慈度的父亲可能是第一个“受美国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②谁知道他这一个职业在中国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1850-1863）运动发生后，及时救了他的性命。她父亲的婚姻和信主的经历，以及他如何成为中国最早传道人之



一，而最终落脚在杭州等所发生的一段曲折迷离的故事，都和中国那一个动乱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交织在一起。

余慈度的祖父在太平军攻打到他故乡以前已经去世了，因此他就“有幸地免除了中国千百万平民所遭遇的灾难”。根据余慈度的见证，她的父亲曾经在清朝的军队（多半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所率领的湘军和淮军）和太平军的攻防战中“被俘”。但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忠实又深具同情心的医生，太平军认为他可以为受伤的士兵服务，所以不但没有杀死他，反而非常优待他。

纵然如此，她那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父亲，总觉得为那些具有极端革命思想的太平军服务，是一件没有安全感的事。因此他就想尽了办法在一个黝黑的深夜里，从太平军的营房中逃了出来。

余慈度的父亲结婚时已40岁左右了。她见证说：“我现在回顾我家庭的情况，实在要感谢上帝，是他使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在当中被抚养长大。”

余慈度对她这些家世点点滴滴的回顾，无意中提供了一些线索，因而使我们对她的家世和她所处的时代，能够做出更进一步的推测：

第一，笔者相信余慈度的父亲当时并不是一个老百姓，而是一个“军医”。这主要根据“被俘”这两个字。太平军的政策是不许把老百姓当“俘虏”对待的。

第二，鉴于余慈度的父亲最终落户在杭州，他的“被俘”应当是在太平军和清军在杭州附近的拉锯战争中所发生

的。在余慈度的见证中，所提到一般老百姓在战争中所受的“苦难”，就杭州的军民来说，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这一切都可以从史料中得到佐证。

现在让我们根据史料将以上两点加以深入考察，以便对她父亲在太平军中的服务和百姓遭遇苦难的情况，得到清楚的了解，这样可以便于我们推测她父亲如何最终在杭州落脚，并如何遇到他信主的妻子与岳母。

动荡不安的年代

太平天国的动荡从1850年开始，到1864年结束，一共延续了13年之久。太平军于1853年攻占南京，一直到1860年，双方军队集中在长江下游，进行剧烈的拉锯战。在这段期间，太平军一直没有攻打浙江的省会杭州和其附近之城市。

从1860年开始，在其精明的忠王李秀成领导下，太平军首次对浙东的重要城镇发动攻击。1861年秋，太平军控制浙江全省，只有杭州是到该年12月28日才被攻陷。因此如果她父亲那时是在杭州或其附近政府军中服务，他就应当是在这一个期间被俘的。

至于当时杭州城内居民和清军所经历的苦难，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又文教授在他所写《太平军革命运动》（*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书中，有下列凄惨的描述：



“……到1861年秋……李秀成已完成对杭州的严密封锁，双方在城内交战，陷入胶着状态。在城内居住的60万平民（不包括旗人和数以千计的政府增援军队），经过两个月的严密封锁后，城内的粮食已消耗殆尽。”^③

他形容当时城内居民的窘况说：“杭州已陷入极端的混乱状态，士兵和军民互相争夺残留的食物，或者在城中到处寻找树叶充饥，或将皮革煮熟而食，甚至有人竟然以人肉充饥。”^④

杭州城被太平军攻陷后，驻防的巡抚已经上吊自杀，剩下的政府军队和官员，若非死于太平军刀下，就是遭受被俘的命运。至于城内残余的百姓，因为多日处于饥荒状态，他们的脸色苍白，站起来就像扎在一起的骷髅，甚至连“长毛”也不忍杀死他们。在内城的万名八旗军队成员奉命坚守到底。直到该城的驻防将军自刎后，他们和其中旗兵眷属等3万之众也集体自杀了。^⑤

根据史家估计，经此战役后，原来杭州内城的60万居民一半死于饥饿。两年后（即1863年），经过6个月的苦战，清军终于收复了杭州。那时杭州城内几乎变成一个荒凉的鬼域，居民人数只剩下不到原来总数的十分之一。

至于余慈度说她父亲被俘后受到太平军的优待，这件事我们也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佐证。因为她祖父是笃信孔孟之道的乡绅，她父亲被俘前一定是在湘军或淮军中服务的军医。至于太平军所以保留他的性命，也是符合太平军优待医生的政策。耶鲁大学的施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在其洪

秀全传《上帝的中国儿子》中，对于太平军的医务政策有一段简明的描述：

“那时有一种特殊技能的人员，就是医生，是太平军极其需要的，因为大部分精于此道之人，在太平军攻陷南京及其他附近城市之前，都已经逃离南京，或到上海，或到其他城市避难。因此，像南京这样一个大城，疾病的袭击随时可以发生。在战争中，伤亡的军民也日益增多，造成众多幼童和妇女与亲人突然分离。东王杨秀清因患耳目之疾，不能到前线指挥，因此北王就向太平军占领区发出通告，征召那些精通眼科和幼儿科，以及妇科的人才。那些被推荐者，都由太平军从各地专程护送到天京（南京）服务，医术确实高超的人，还可以得到高官和数千两白银作为报酬。”^⑥

我们相信，在余慈度幼年时期，或茶余，或饭后，她父亲不可能不把他在战乱中的遭遇像故事一样地讲给孩子们听。这些对于余慈度童年的心理成长和她到苏州去学医，都应当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章 杭州愉快的童年

除了家庭以外，影响余慈度心理成长和灵性根基的尚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杭州这个城市和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另一就是她父母所属美国长老会的属灵环境。

杭州是位于中国上海南部大约 180 公里的一个重要城市。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里有迷人的西子湖，它的周围满布了美丽的村庄，和满山遍野的茶田。自从清初，杭州就是清帝国“八旗驻防”的重要城市之一，这些驻防的八旗军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杭州的“内城”，与当时的北京城一样，一般的汉人和传教士都只能住在“外城”。余慈度出生的那一个长老会差会大院，也必定是坐落在外城的范围之内。

基督教在杭州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公元 718 - 906），那时最早的景教（基督教教派之一）就已传入杭州。在 1315 年（元朝），天主教在杭州设立了第一个主教。更正教（基督教）各教派到中国传教是 19 世纪初才开始的。1858 年，太平军还没有攻打杭州之前，美国（北）长老会差派了



倪维思牧师（Rev. John L. Nevius）伴同美国驻宁波的领事和一位圣公会的教士到杭州做了一次匆促的考察。但是他们并没有在那里设立差会据点。^①

到了1864年，太平天国平定以后，先有圣公会著名的牟尔牧师（Rev. H. G. Moule）首次在杭州设立永久性的差会工作站。接着美国长老会于1867年也在杭州设立了差会据点。^②

1872年，余慈度出生于杭州美国长老会的差会大院里。那个时候，她的父亲还是一位“学习传道人”。^③她的父母只生了两个女儿，余慈度是老二，她的姐姐比她大两岁，应当是生于1870年。对于她的童年时代，她只见证了几个与她属灵生命和她性格成长有关的故事。

对大自然的深情

余慈度两岁半的时候，她父亲被派到杭州附近一个只有24户人家的小村落中作牧师。在这段时间里面，她提到如何常与邻居小朋友们到村庄外面，茶花遍野的优美小丘上玩耍，这就使她养成对于大自然和花草的爱好。

她记得父亲常常牵着她的小手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游览。有一次，她和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到山上茶田里去玩耍。由于她的同伴不告而别，她就迷失在茶田中。当时，她感到极端的害怕，不知所措。当她听到父亲从远处呼喊她的名字时，她就立刻大哭起来，一面哭着一面跑向父亲的怀抱。这件事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后她就用这个经历说明

她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她像一个在世界上迷失的人，幸而听见了天父的呼召，而得以回到他的怀抱里。

她父亲在这一个乡村的小教堂中服务不久，就又被调回杭州城内服务，但是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养成了对于大自然的深情。

柔慈怜悯的心肠

余慈度5岁的时候，被送进长老差会所办的儿童日校（Day School，相当今日的幼儿园）接受教育。对于这段经历，她有一些简短有趣的回忆。例如：她跟姐姐一同上日校的时候，她姐姐的头脑似乎比她聪明很多；但是在另一方面，她的心肠却比姐姐柔慈，她从幼童时代就养成了对于贫病老弱之人的同情心。

那个时候，她的外祖母已经年老多病，常常孤单地躺在床上，虽然她那么小的年纪，却能够乖乖地坐在祖母的床边陪伴半天之久，和她说说些老人家喜欢听的话。

在属灵生活方面，余慈度从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操练祈祷，并建立了对上帝单纯的信心。她见证说：“自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就每天学习向上帝祷告。我很少忘记这样做，对我来说，基督乃是一个实在具有位格的上帝。我的姐姐在夜间常常因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为什么害怕呢？”

当她7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她回忆说：



“我似乎是在天上，看不见任何人，却听到美妙的乐器，弹奏着甜美温馨、难以形容的属天音乐，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认真坚忍的性格

余慈度在见证中提到了几个她从小即养成的性格上的特点。她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她没有办法领会什么是开玩笑。因此别人对她说的话，她都全然信以为真。所以她说：“我在朋友中间，常常成为他们的笑谈。”

她举了以下几个例子。在她非常小的时候，有一次，母亲给了她一碗炒米饭。她正在吃的时候，她母亲对她说：“我可不可以吃一调羹呢？”她说：“可以。”但是她母亲吃完了一调羹以后想故意逗逗她，就没有经她许可又吃了一调羹。她立刻对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撒谎呢？你刚才不是说只吃一调羹吗？你为什么又吃一调羹呢？”她的妈妈听了以后禁不住大笑起来，几乎使她口中的饭呛住了喉咙。但是余慈度说，这件事对她妈妈来说，也许是件好笑的事，可是对她而言，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另外有一次，她的父亲在院子里磨一把切菜刀。有一个邻居想故意吓唬她一下，就向她说：“你知道吗？你爸爸在磨刀呢，他可能是想要把你杀死喔！”她听到以后，马上流着眼泪，跑到她爸爸那儿问他说：“爸爸，你真的要杀死我吗？”那个时候，她爸爸眼角展露出笑容，只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并没有回答她所问的问题。她说：“很多的时候，在这些事

上，别人也许认为我是个傻瓜，但这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啊！”

她还有其他性格上的特点：比如她的心地非常单纯，从不会想到复杂的事情，她的性格也非常坚忍。但是对她的朋友们来说，她有时似乎偏于倔强。她说：“只要我接受任何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它，不管有什么障碍，我都一定要把它做好。”

当余慈度 8 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又被调到杭州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做牧师。在那里，除了一部分的时间去外面上学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她父亲在家里教她读书。在这一段时期中，她承认自己也具有普通儿童们所共有的难处。比如说，她很不喜欢听到父亲对她错误的指责。一直等她长大以后，她才知道她父亲的指正对她非常有益处。

1888 年，余慈度 15 岁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城市去上医学院，只是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医学院的名字和它的所在地。

第二部 博习医学院

第三章 医学院在哪里？

余慈度说：“我15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外地去念医学。”但是在她的见证里，我们找不到任何与她就读的医学院有关的资料。

比如说，医学院的名称、地点、教授阵容，以及她所修的课程等等，这都是任何对历史传记有兴趣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然而，她在见证里却只字不提。因此，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这些重要的史实，就需要从事一种类似侦察无头案的工作。

寻找蛛丝马迹

纵然如此，在她的见证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环境上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她所念的医学院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线索是她自己说的，她念了“8年的医学院”。^①一般医学院只要念5年就可以毕业了，她的为什么要念8



年？猜测这主要可能是由于该医学院的设备不足，师资亦极其缺乏之故。我们知道她于1888年进入医学院，8年后，毕业的那年应当是1896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任何中国最早期医学院1896年的毕业生名单，她的名字就可能在其中了。这是我们所掌握的第一个线索。

第二个线索，这个医学院显然离她家相当遥远。当她进入医学院以后，不到三个月，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接着两年之内，她的母亲也因着严重的心脏病与世长辞。她离家后历经父母的先后离世，连与他们最后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她曾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既缓慢又耗费时日，因此，显然这个医学院离她父母的家有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②

第三个线索，她所念的医学院应当是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因为她曾见证说，1899年，她从高丽因重病回到上海某医院就医时（见下章），上海医院的医生拒绝为她开刀，因为他们觉得手术太大，很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因此，她不得不回到她母校的附属医院去就医。这说明了她的母校应当坐落在离上海不太遥远的城市。她的见证也透露说，她的姐姐和姐夫一再地表示欢迎她到他们家里去住，显然他们所住的地方离她的医学院也不太远；虽然她没有提到她姐姐住在什么城市，但她却提到他们经常是坐船从水路去看她的。这说明了她所就读的医学院应当是位于长江下游与大运河纵横交错的水陆网上，这是第四个线索。

侦察开始

根据这些线索，笔者采取的第一个侦察行动，就是想找出在长江下游有哪一个城市早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建立了西医学院？那个时候，长江下游除了上海以外，最大的城市就是苏州。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苏州是长江下游最大的商业城市。根据中英鸦片战争后于1842年所订的《南京条约》，清政府对西方开放了五个港口，上海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我们所常听到的“五口通商”。

上海最早只不过是一个以捕鱼为主的小村子。但是开港以后，随着外贸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它逐渐顶替了苏州原有的经济地位。1860年，清廷于“英法联军”之役被击败后，又签订了《北京条约》，因此连中国的内地城市也相继被迫对外开放。著名的“内地会”就是1860年后由戴德生领导下建立的。

西方差会在1860以前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医院和医学院。由上海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苏州自然就成为西教士开展教区的第一个重点城市。因为早期西教士中有许多位都是借着行医来华传教的（戴德生就是其中一例），苏州也就自然成为上海以外最可能建立西医院的地方。根据这些考虑，笔者就把侦察的焦点放在苏州这个城市上。以下就是侦察过程的简述。



“余慈度”或“俞灵芝”？

即使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初期，我们如果想要搜寻有关苏州的数据，仍然需要到美国各大东方图书馆亲自考察（这是在美国作研究的情形）。一般来说，要想从这些东方图书馆中查考数据，有时需要花上成年累月的时间才行。

幸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各大图书馆藏书卡片大都已经输进了数据库，并且可以通过网络查询资料。有一天笔者在网络上借“关键词搜寻法”（Key Word Search），将“Soochow”这一个英文字输入计算机中（19 世纪有关苏州的书刊，都是用 Soochow 而非 Su-zhou 一般正规的拼法），果然屏幕上出现了一系列的书目，这些书目中每一个都包括了 Soochow 这个关键词。在这些众多的书目中，一个英文书名 *Soochow Hospital Extras* 忽然映入我的眼帘。当我看到 Soochow Hospital 这个名字时，我兴奋地几乎要跳了起来！

等我借到这本书以后才知道它的全名是 *Soochow Hospital Extras With an Appeal for a Larger Hospital in Honor of Dr. Park's 60th Birthday* 是一本中英对照的纪念册，中文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全名是《博习医院成绩记：本院创办人柏君六秩大寿之纪念品》。

在这个纪念册中，有一页列举了 1896 年博习高等医学堂的毕业生名录（中英对照），一共有 5 名毕业生，3 男 2



我们知道基督徒信主之后，改名字是很常见的事：倪柝声原名倪述祖，宋尚节原名宋主恩。但是既改名又换姓的例子极其稀少，因此这个俞灵芝到底是不是余慈度？就需要进一步地小心求证了。

我们可从她的见证中找到另外一个线索，她说她医学院毕业以后不久，就陪同她的传教士朋友到朝鲜传道去了。这位朋友的名字、性别、年龄、国籍、甚至到朝鲜的哪个城市传道，她也一概不提。

监理会的考察

但是根据我们所发现的纪念册，我们知道这一个博习高等医学堂是由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两位著名的医生所建立的。一个叫蓝华德（Walter Lambuth, M. D.），另一个叫柏乐文（W. Hector Park, M. D.）。因此，如果余慈度就是这个医学院毕业的话，她的教士朋友，也应当是美国（南）监理会的教士。美国在 19 世纪中叶，因解放黑奴问题发生南北战争，因此也引起“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简写是 MEC，总会在波士顿）的分裂。南方的称 MEC, South 以示区分，北方仍沿用旧名 MEC，不加 North。但翻译成中文时，在中国和朝鲜就产生两种不同的名称。在韩文中把 MEC 译成“监理会”（指北监理会），把 MEC, South 译成“南监理会”；但在中国却把 MEC 译成“美以美会”，而把 MEC, South 译成“监理会”。因此读者

应对这一个在中韩文翻译上的不一致加以注意。现在要查考监理会在中国和朝鲜的传教数据比较容易，数量也比较多。

白乐浚是20世纪最早研究监理会在朝鲜传教史的学者，在他的《韩国改新教史，1832-1910》（1927年延世大学出版部）里，谈论到韩国京畿教育事业发展史的时候，提到这样的一段话：“监理会宣教部……派遣该宣教部妇女会甘博（Josephine P. Campbell）师母（姜慕仁夫人）到朝鲜去开工。甘师母在中国该会宣教部服务10年之久，极富经验。她带着一个中国女医师俞小姐一同到汉城，在城东北区建立总部，开始传教工作。”^③

但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俞小姐”；并不是“余小姐”。因此我们虽然知道这一位美国教士带着一位中国医生“俞小姐”到朝鲜，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这位“俞小姐”就是余慈度。并且这里只提到她的姓，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我们的侦察还需要更向前一步。

我们既然确定了到朝鲜传道的这位美国教士甘博师母是属于监理会的，经过进一步侦察以后，发现耶鲁大学1947年一个博士论文中，明言余慈度的原名就是俞灵芝。^④

以后，我们又发现在倪林和平（倪柝声的母亲）的自传里记载说，1897年，当她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曾经和余慈度见过一面，并且非常佩服她。此后不久，“她（余慈度）就到高丽（朝鲜）去传道了。”^⑤

我们仍然不知道余慈度为什么把较复杂的“俞”改成简单的“余”。她的英文名字“Dora”，也很可能是因佩服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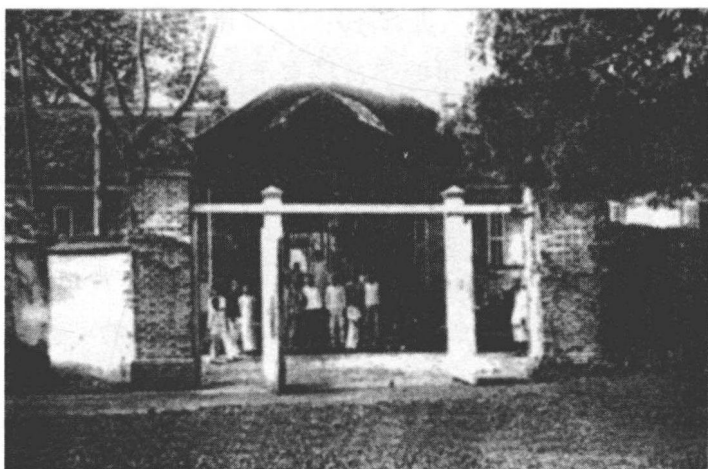


时在上海附近工作的、一个著名的监理会教士 Dora Rankin（甘博师母的挚友）而取用了她的名字。我们完全确定了她的本名就是俞灵芝以后，也就自然证明苏州的博习高等医学堂就是她读过的医学院。她是 1896 年毕业，1897 年到朝鲜去的。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我们可以把余慈度母校的建立经过规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来。

医学院的建立经过

监理会的医务工作是 1848 年由戴查理医生（Dr. Charles Taylor）开始的。1883 年，蓝华德医生在苏州创办博习医院（又称“总院”），目的是要借行医推广福音。1888 年，蓝华德医生被总会调往日本为监理会开工，博习医院就由他的内襟柏乐文医生来接办。^⑥

博习医院的建设工作是逐渐完成的。院址位于苏州葑门内的天赐庄。最初只有平房八座，类似临时诊所。1883 年，博习医院建成并开始接纳病人。此前蓝华德和柏乐文两位医生在 1882 年就已经创办了一个小规模附属医学院，正式名称为“博习医院医学堂”（Soochow Hospital Medical School），限收男生。根据前面所列举的纪念册，这一个医学院 1888 年首届 3 位毕业生全是男性，其中包括杨维翰医生（Yang Wei Han）（他在 20 世纪初成为余慈度最重要的同工）。博习女子医学堂于 1888 年开始。它的成立与妇科医院的建立有密切关系。1885 年，美国监理会妇女国外布道会的



1983年由蓝华德医生与柏乐文医生所创建之博习医院

董事举行年会，决定在苏州建立一个妇科医院，以便增强苏州总医院（就是博习医院）的功能。

当初妇科医院的建立，也是想要达到传福音目的：因为19世纪的中国妇女，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妇女，绝对不肯接受外国男医生的诊疗。这些妇女被西教士称为“自我禁闭”（shut-in）的妇女。因礼教的束缚，她们一般连抛头露面都会被认为是违礼，当然更不肯去接受西方男医师的诊断了（因为西医常常要求女病人宽衣解带接受体检）。如果有西方女医师主持的妇科医院，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中国上流社会的妇女，并且可以借着治病而将福音传给她们。

1885年，监理会的国外布道董事会妇女国外布道会，拨了一笔巨款有6000美元左右，作为筹建苏州的妇科医院的费用。1886年，该会首先派遣女医师费蜜芝小姐（Miss Mil-



dred Phillips) 到苏州负责妇科医院的筹建事宜。

费小姐是美国宾州的“费城女子医学院”（Women's Medical College in Philadelphia）的毕业生。她到了苏州，立刻利用两幢房舍开了一个小诊所，第一年就有 2200 个病人来就诊。1888 年 10 月 25 日，妇科医院正式落成。^⑦同时，她也在妇科医院中开了一个小型的女子“医学班”（Medical Class），是由 3 个女护士（包括俞灵芝）所组成的。费医生因要结婚于 1892 年 12 月返美。^⑧

柏乐文医生同时在女子医学班兼课。妇科医院的行政工作就委交给甘博太太全权负责。甘博太太原来是在医院里负责妇女的福音工作，她既非医生也非护士，但是她经过柏乐文医生的训练，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使这个妇科医院得以照常运作。她代理院务一直到 1893 年。那年美国母会派了从密西西比州来的华安妮医生（Anne Walter）接掌苏州的院务。

成立女子医学院

华安妮医生于 9 月 19 日抵达苏州。抵达半小时后，她就换穿白衣到医院里的门诊部去会见病人。^⑨可见当时这些医生教士的服务精神是多么可佩。也就是在华医生主持妇科医院时，她把原来那一个简陋的女子医学班改造成了一所近代化的女子医学院。

在华院长主持院务之前，男校的柏乐文医生抽时间



博习女子医学堂

到女校授课。华院长就任后，女医学生才首次被准许到男校上课。但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风俗仍然很强，上课的时候，男女医学生虽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他们的座位当中还要用布帘隔离。^①第一间“男女合校”的医学院——“博习高等医学堂”——在中国出现了。根据《博习医院成绩记》所写，男女毕业生都被授予博习高等医学堂的毕业文凭。在华院长任内，她还向美国母会呼吁为苏州儿童医院的建立捐献。华医生服务3年以后，于1896年与福恩医生（Dr. Fearn）结婚，婚后他们夫妇被派到苏州附近的常熟去做诊疗服务。接替华医生任务的是朴露克医生（Dr. Margret Polk）。

朴医生接管妇科医院以后，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第一件是妇科医院得以扩建，增加了博妮尔病房（Alice Bonell Ward）；第二件是一个近代的儿童医院得以建立。这个儿童



医院的资金是美国北卡罗来那州（North Carolina）各地的儿童团契响应了华安妮医师的呼吁踊跃捐献的。这些儿童团体在各地都以“亮晶晶的珍宝”（Bright Jewels）^①来命名。在百年以前，美国南方的儿童对中国贫困的儿童这一份纯爱的表现，确是一件极其感人的事情。这座儿童医院和妇科医院共同坐落在一个场地上，因此就合为“妇孺医院”（Mary Black Memorial Hospital）。第三件是博习高等医学堂首届的两位女毕业生出现了，一位是石馥梅，另外一位就是俞灵芝。

最称职的护士

有关余慈度8年医学院生活的资料非常缺乏，在监理会的档案中有两个片段的描述。

第一，当她1888年进入博习女医学堂的时候，显然是以护士的身份接受初步的医学训练。她的工作表现曾受到华安妮院长的赞赏，在华院长1895年的医务报告中，她特别提到3个中国护士的工作表现，她说：

“这3个本地的护士，也就是我们女子医学班的成员。她们值得我们最高的赞赏。没有任何外国（指中国以外）的护士比她们更为可靠，更为忠实，更为永不动摇地献身于她们的工作。她们在手术室也好，值夜班也好，都表现出勇敢不懈的精神。她们赢得院中同仁们一

致的爱戴和尊敬。”^⑫

第二，华院长在 1893 年的年度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俞灵芝。她说：“妇科医院的护士们，都是经过良好训练的，跟我们美国医院的护士相比，一点也不差。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护士，她的名字叫灵芝，是一位娇小的中国女子。当我出诊的时候，她担任我的翻译。当我参加教区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礼拜不在医院。有一天，有人到医院来找医生去诊疗一个鸦片中毒的病人。那个时候苏州医院里的医生都去参加大会，没有医生值班。在此紧急关头，灵芝就勇敢地叫了一台轿子，带着她的鸦片诊疗箱赶到病人那里，给予及时的诊疗，救了这位妇女一命！我们为着灵芝深感骄傲，只有那些对于当时中国上流社会中自我禁闭的妇女们所过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她英勇的作为是何等地超凡。”^⑬

另外，余慈度在她见证中，也透露了她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维持她的求学生活。除了做护士的工作以外，她还需要在药房值班。有一次，一个同事向她索取几个软木塞，她没有得到院方许可，就给了她。以后她非常懊悔，因为她知道这种卖人情的做法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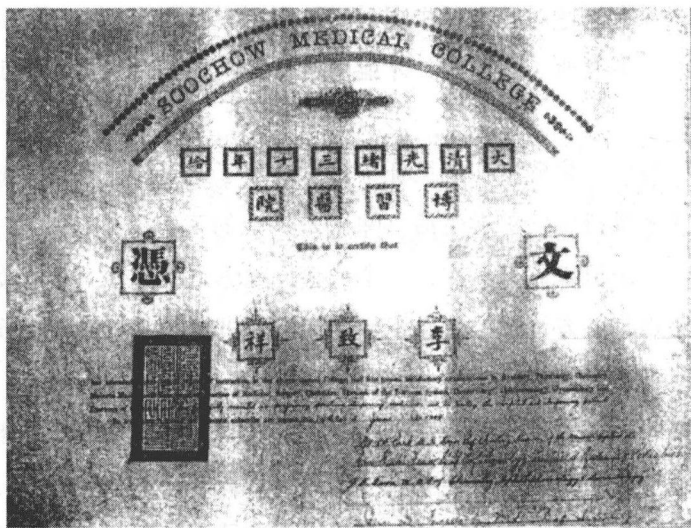
余慈度于 1896 年夏季从医学院毕业，因为她和石馥梅是最早从女子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因此校方为她们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毕业典礼，时间是 6 月 20 日下午。与她们同时毕业的尚有男医学院的 3 位男生。典礼是在妇孺医院举行，



除了苏州本地的高级官吏和地方有名望的乡绅以外，还有外宾也受邀参加。日本驻苏州的领事在典礼上用英文致词，一位曾任上海“会审公廨”（Mixed Court，中外官员合审之法庭）推事的蔡君，以流利的中文发表演说。

毕业生的代表在致词中，特别介绍了校方所购置的最新设备，尤其对于 X 光仪器加以详细的介绍。典礼节目中，还有中国的乐队演奏和钢琴伴奏，会场上布满了鲜花和绿藤，最后由学校的牧师颁发毕业文凭，并且为所有毕业生祝福祈祷。^④

余慈度毕业后留在妇孺医院继续服务，有时候也会被请到监理会所办的女子学校去做证道的工作。下一章，我们将回头看看她医学院八年中属灵的生活和经历。



博习高等医学堂之文凭



东吴学堂医学院之文凭

第四章 医学院期间灵性的成长

余慈度的医学生活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成长阶段，在8年的时间里，她度过了少年末期和青年期。当她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23岁成熟的女青年。要想了解她这8年中人生的经历，我们不但要考虑到“心理”（Psychological）因素，更要考虑到“灵理”（Pneumatological）因素。现在，我们根据她的见证，把她这8年中的心路历程和属灵发展，大概分成四个关口经历（crises）来讨论。^①

胜过孤凄之感

余慈度进入医学院后所遭遇的第一个关口，就是学习克服因父母双亡而产生的孤凄感觉。她还没有到苏州学医之前，就已经知道病重的父亲不会活得太久，果然，就在她离家三个月之后，父亲就病故了。那时她的母亲也正患着严重的心脏病。不到两年的光景，她慈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了。

她在见证中描写到母亲去世前被疾病所折磨的情形：



“漫长的6个寒冬，母亲因着心脏病的缘故，不能平卧在床。有的时候，我真希望她早些脱离病痛之苦，安息在主的怀抱中。可是，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失去双亲以后那种孤凄的感觉。”每次看见一个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时，她的内心就不自禁地感到嫉羨和悲伤。特别暑假来到或新年假日的时候，同学们都一个个在家与父母团聚，她一个人住在那空荡荡的宿舍里，因而就更加感到凄凉。她感叹说：“那时我虽然有一个家宅，但是那个家宅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果父母还没有死，我就还有一个家。他们去世以后，我就没有家可言了。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多么希望我们姊妹能到家里去看他，但那个时候，中国的交通极不方便，需要长途跋涉，因此父亲的愿望一直到死时都没能实现。”

虽然她的姐姐和姐夫对她很好，也随时都欢迎她到他们家里去；但是她说：“他们家到底还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就越发感觉自己在世上是一个孤单的人！”幸而在这段期间，她常常得到那位教士朋友的慰藉，同时也一直学习在内心与主保持亲密的交通。随着年日的增长，她终于习惯于那种孤单的生活方式。

解除婚约的挣扎

1892年，余慈度已经19岁。此前她已经订婚，不过在她的见证中，有关她未婚夫的资料，一点都没有提。显然他们是在苏州相识的。她未婚夫可能是她医院里的同事，或是

医学院里的同学。我们虽然不敢说她的订婚是经由自由恋爱的方式，但显然也不是奉父母之命而成的。

她说：“我的订婚是我自己选择的。”她本来预定和未婚夫在1892年成婚，但就在婚礼渐渐逼近的时候，她忽然觉悟到婚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并且发现她也并不愿意结婚。她见证中说明她这样的想法是有几种原因的：

第一，她实在“不喜欢过婚姻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的身体不好，担心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点很可能因为受了父母遗传的缘故。

第二，她不愿意和另外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意志”。她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特别她已经奉献一生，立志遵行上帝的意旨。她极不愿意在生活中因为双方意志的冲突，而造成婚姻中的困难。

第三，她怕结婚后她对上帝的纯爱会被另一个人分割，以至影响她爱主的心和事奉主的生活。

按照当时中国的习俗，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理由，解除婚约将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所以她说：“我有两个礼拜之久，每天夜里为这件事流泪不止。我向上帝恳切祈求说：‘你如果能把我从这件事里释放出来，我愿一生做你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她首次提到她的教士朋友，就是甘博师母，她说：“我有一个教士朋友，自我父母去世以后，就一直对我非常照顾。虽然我从来没有在经济上依赖任何人，但我这个朋友总是借着祷告和她一切所能做的，尽量给我帮助。”

“最后”，她说，“慈爱的天父终于答应了我的祷告，使



我得到自由。但那时上帝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先向上帝说‘是’。如果‘是’他的旨意，要让我结婚，我就必须顺服上帝的旨意，对他说‘是’。”

当她向上帝顺服以后，上帝就听了她的祷告。她说：“当我得到男方的回音，同意我们的婚约可以解除，我那时的感觉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这件事显然也在她朋友之间造成相当的轰动，很多人批评她根本不应当这么做。但是上帝要她安静接受这一切的批评，要她“用生活而不是用言语”来证明她的诚信。别人对她解除婚约的动机有所怀疑，她当时的感觉是：“我进入社会时，还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在许多事上，我都还非常孩子气，做事不够谨慎，也不够智慧。虽然我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3次，但我仍然发现我有很多缺点。我认为对的事，我就觉得别人也应当认为是对的，我认为错的事，我就觉得别人也应当认为是错的。当时，我也相信任何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就必定是上帝真正的儿女，而不应当对彼此有任何怀疑；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别人会对我的诚信有所怀疑。”

因解除婚约而引起朋友和同事们的怀疑和批评，自然也影响了她与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

认罪与赔偿

余慈度所经历的第三个属灵关口是关乎“对付罪”的经历。1895年的一个早晨，当她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突然内

心产生一种极端被定罪的感觉。她觉得自己犯了一种不能得到上帝赦免的罪。虽然那天她照常工作，但是她那位教士朋友却注意到她的情形与往常有异，因而就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她很愿意知道她的问题，好为她祷告。

但余慈度说：“我不肯告诉她，因为我觉得在我灵魂中，这种可怕的感觉是不可为外人道的。我只觉得我是一个被上帝定罪的人，我似乎正站在地狱的边缘上，随时都会被推下去似的！”经过她朋友多方的劝慰，她终于向她透露了内心的感受。她的朋友就跟她一同祷告，也告诉她自己要向上帝祷告，并且告诉她上帝一定会赦免她的。但她说：“我自言自语地说：‘你根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我知道，我是不能被上帝赦免的，因我的罪孽太重了。’因此我根本就没有祷告。”

当她私下独处的时候，不论白天或夜里，她有时会大声哀哭，祈求上帝怜悯她，这种情形持续了两周之久。

她说：“在那个时候，我简直惧怕得要发疯了。有时候在夜间，我高声向上帝呼喊，祈求上帝的怜悯，但内心中那种可怕的感觉仍然没有除去。那些日子，我几乎无法进食，我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堕落和痛苦。我真希望别人不会有我这样的经历。有时我甚至于觉得，如果我根本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多好！”

这里我们看见，有些信徒对基督的救赎和罪的赦免这件事，在真理上有极端的偏差；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要“感觉到上帝的赦免，而不是“相信”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



的救赎和所流的宝血而一定得到赦免。

余慈度继续描写她此时内心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她说：“我的朋友想尽办法来帮助我，她说只要我信耶稣基督赦免我，并信他一切都已为我们做成了。但是我虽然想相信，却不知道如何相信，当时我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真正渴想上帝的赦免吗？我会渴想到一个程度，情愿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放弃而去做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她最终向上帝说：“是的，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事都可以，只要我心里得着平安就好了。”

“上帝接着又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是他的旨意让我一辈子做一个残病的人，肯不肯呢？那时我没有立刻回答，我想如果我跟上帝说：‘我肯！’我怕撒旦会立刻在我面前呈现出一幅极其黑暗的前途。”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她说：“我实在是极端的痛苦啊！我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如何选择。我觉得黑暗和死亡困扰着我。”她最终对自己说：“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任何身体上所遭遇的痛苦，可以和我现在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和恐怖相比。因此，我就在绝望中呼喊说：‘是的，主啊！我愿意。’”

在那个剧烈的属灵挣扎过程里，她向上帝敞开，彻底地让上帝搜查她的内心。因此她就回忆起许多以往所犯的罪，并且圣灵向她启示她应当认罪悔改。她承认说，在这以前，她根本不知道《圣经》上还有所谓的“认罪”和“赔偿”这样的事。上帝让她看见她从前所犯的一件罪，就是有一天她在医院的药房值班时，一个朋友来向她要了几个软木做的

瓶塞子，那个时候，她并没有经过医院的许可就给了他，因此她说：“这时主显明这件事给我看，告诉我已经犯了偷窃的罪。我就问上帝：‘我怎么办呢？’上帝就回答说：‘你要赔偿。’因此我就顺服上帝，对付了这件事。”

但是她顺服以后，并没有得到里面的释放，相反的，她那一种的罪恶感持续了两个礼拜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她说：“一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晚上，在熄灯以前，上帝忽然把天向我开启了，并且使我充满了上帝自己的爱。”那个时候，她就向主大声呼喊说：“主啊！这就是你的爱吗？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以前我以为我知道如何爱上帝，但是现在我才领悟到我以前根本并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听见上帝对我说，我一切的罪都已得到他的赦免，我却感觉到他的爱是那样充满了我的心。那些被定罪和恐惧的感觉都顿然消失无踪了。”

因此，她就从床上跳下来跪在地上祷告。但是，那个时候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唯一能说的就是：“主啊！我感谢你！”她连续三次重复这样的感谢。她说：“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我内心被充满的喜乐和感激的。”第二天，“似乎整个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甚至于太阳也照得更为耀眼。”（她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参《使徒行传》13章52节）

世界的诱惑

经过这次以后，约有一年半之久，她一直活在属天的喜



乐中。后来她受到自己雄心的诱惑，就又慢慢地回到“世界”去了（她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内容是什么）。根据她的描述，这种落到世界里的经历，起头并不是上帝的同在突然消失，而是渐渐地消失。开头的时候是因为她不顺服上帝，使她与上帝之间产生了间隔，因此祷告的时候，她说：“我也不再感觉与上帝交通的甘甜。我发觉我又开始享受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物。但是在我的心中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不但如此，当她与上帝渐渐疏远的时候，她也就被地上的人和事所困扰。

她说：“一旦我回到世界里，属地的事情似乎对我具有吸引力，也似乎显为真实了。别人对我的一言一行，都会摸着我的心而产生深切的影响。他们有时使我感到酸苦，有时又感到自信，甚至使我产生偏见和骄傲。我此时已经是被地上的事物所占有，而不是被上帝自己所占有。我的情况既然已经降低到世界的水平，我自然也就无法胜过世界和其中的事物了。”多年以后，她才领悟到，一个信徒从世界中蒙拯救的唯一的路，就是与基督同坐在诸天的境界里（《以弗所书》2章6节）。唯有这样，才能够胜过地上诸般的引诱、试探和试炼。她这种低沉的属灵生活延续到医学院毕业以后，在这期间一直都没有好转起来。

她对于世界所存的雄心，最终使她决心跟随她的朋友到朝鲜去开创监理会的妇女福音工作。她承认这一个决定完全是出于她自己，根本“没有得到天父的许可”！

第三部 朝鲜半岛的 华人传教士

第五章 监理会到朝鲜

关于余慈度随着她的朋友到朝鲜去传道的历史，在她见证中所提供的线索非常有限。她 1897 年离开上海的时候，才 24 岁。由于她为的是专门见证她里面属灵的经历，因此就把这一段国外布道的生活形容为“在旷野的漂流”。至于她的朋友是谁，到朝鲜哪个城市去传道，差她到朝鲜的公会的名称等，这些基本的史实，她一概不提。

但是，因为博习女子医学堂是美国监理会所创办的，我们经过一段查证以后，就断定了她是由监理会差遣到朝鲜去传道的。因此我们要想知道余慈度在朝鲜传道的活动，和她那 6 年中间所有的属灵经历，就必须把这些都放在监理会于朝鲜拓展福音事工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够得到比较深刻的了解。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和他所服务的机构，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环境是无法分开的。



江华条约

基督教传入朝鲜的时间比到日本和中国都晚，原来西方人认为朝鲜是一个“隐士的国家”。国王和人民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基督教是异端邪教。至少有两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道人想通过中国的东北潜入朝鲜，试图打开传道之门。他们被当地政府发现后，立即被斩首处决。

西教士能以进入朝鲜是在东北亚三个主要国家政治角力之后的结果。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逐渐发展其向中国大陆的扩张政策。朝鲜也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而朝鲜的宫廷也因此被卷入日清两国权力斗争的漩涡中。19世纪后半期，朝鲜宫廷中分成两个党派。一个是坚持继续亲华的“保守派”，一个是主张亲日的“开化党”。后者是因为看见清朝政府的实力和威望日益衰落，而日本的明治政府的国力日益强盛，因而受到西方列强的重视。

“开化党”希望借着与日本之间的亲善，学习其维新的经验。这两派之间常因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内部的政治冲突。西方教士就是因着一次流血的政变，而得以打开朝鲜传道之门。

日本向朝鲜扩张其势力的里程碑是1876年和朝鲜所签订的《江华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朝鲜的国际地位与日本平等。表面看来这似乎使朝鲜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实际上借着这一个条约的签订，日本就可以否认清政府

和朝鲜的宗属关系。此后只要日本能够诱使朝鲜国王和她签订任何协议，清政府就无权干涉了。这时候清政府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如李鸿章等，仍然采取了所谓的“以夷制夷”政策。经过清政府积极地促成，朝鲜首先和美国订立了通商条约，就是1882年的《舒孚尔（R. W. Shufeld）条约》。随后，朝鲜也与英国和德国建立了类似的通商关系。

开启福音之门

1884年12月底，朝鲜发生了一次政变（即“甲申之变”）。那时朝鲜已经采取了西方的邮政制度。该年10月，邮政总局办公大楼落成。总理邮政的洪英志属于开化党，他与同党先和日本驻朝鲜的公使商妥，在庆贺邮局落成典礼的宴会上发动政变。

他们约好在晚间的宴会中采取行动。在这次政变中，朝鲜的禁卫大将军尹泳楸离开宴席，出去巡视时被叛党砍伤，流血不止。朝鲜的医生采取东方的医疗方法，但是仍不能为他止血。尹泳楸是朝鲜皇后的近亲，当他们自己的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就去请一个在美国公使馆服务的艾伦医生（Dr. H. N. Allen）来救助。

艾伦医生是美国长老会的教士。因为朝鲜政府不允许西教士进入传教，他就在美国公使馆以医生的身份获准居留。当他到皇宫去看受伤的尹泳楸时，那些朝鲜医生正在采用土法，想用蜡油堵住伤口，自然是毫无功效。艾伦医生用西方



的针药使血很快地止住了，这对朝鲜的医生们来说简直是神迹奇事。朝鲜国王为了表达对艾伦医生的感谢，就用政府经费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西医院，即是著名的塞弗伦病院（Severance Hospital）。^①

自此朝鲜王室对西教士的观念整个地改变了，渐渐允许西教士入境，并准许有限度的传教活动（两年以后，1886年，第一个朝鲜的基督教徒在这个国家中产生了）。

传奇人物尹致昊^②

在这次政变中，有一个19岁的开化党青年，因着政变失败，就流亡到中国上海去避难，这就是以后开创朝鲜监理会的关键人物——尹致昊。

尹致昊生于1864年，出身于一个朝鲜非常有名的家庭。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据说他早上三点钟就起床研读孔孟之道。他的父亲尹熊列在朝鲜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物，也是开化党的重要份子。1881年，朝鲜王室派遣了一批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尹致昊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印象颇深。1882年，美国所派第一任驻朝鲜公使傅特将军（Lucius H. Foote）路过日本。经日本外务省（外交部）的介绍，傅特得以和尹致昊认识，并请尹做他的翻译和参谋。他陪同傅特回到朝鲜后不到两年，就发生了“甲申之变”。因他是被政府追拿的开化党首要份子，经过傅特将军的介绍，他就潜逃到上海去会见中西书院（Anglo -

Chinese College) 的校长林乐知 (Young J. Alle)。他到了上海以后, 就在“中西书院”进修英文。



身着朝服的尹致昊

那段时间, 他受了林乐知和波尼尔 (W. B. Bonnel) 教授的影响而决志信主, 并受洗加入监理会。1888 年 8 月 (就是余慈度进医学院的那一年), 尹致昊受林乐知的鼓励, 进入美国南方著名的文德比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即宋美龄父亲宋耀如就读的学校)。他在那里读了两年的神学, 以后又转到乔治亚州的爱莫瑞学院 (Emory College) 就读。那时候他对于教会非常热心, 常常被请到各地的监理会教堂去证道, 结识了很多教会的朋友。

他在 1893 年返国以前, 把自己节省下来的 200 美元



（那时 200 美元至少等值于现在的数万美元）捐给校方，请求校长康德勒（Dr. W. A. Candler）将其作为在朝鲜兴办学校的基金，并且希望监理会能派人到朝鲜去开展布道工作。那时候，朝鲜政府仍在保守派控制之下，他还不能立刻返回朝鲜，因此就先回到上海，在母校中西书院担任英文讲席。他常常被请到当地的监理会的学校去证道，包括中西书院的姊妹校中西女塾（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s）。以后他就和中西女塾毕业的一个中国女子（同公会牧师的女儿）结婚。1894 年，朝鲜宫廷又发生了政变，因而触发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清廷失败以后，宫廷中的保守派被打倒，亲日的开化党夺得了政权。这个时候，朝鲜的政府实际上已经逐渐落入日本的严密控制之下。

尹致昊再一次向康德勒校长写信，请求派人去朝鲜拓展福音事工；同时他也写信给当时监理会的会督亨卓斯（Bishop E. R. Hendrix），敦促他趁着到远东考察教务之便，能够到朝鲜去看一看。

监理会（MEC, South）到朝鲜

那时朝鲜半岛是隶属于监理会的中国教区。恰好这个时候在中国上海的监理会教士中，有人对长江下游的气候不能适应，常常生病。他们希望能迁往中国华北、山东一带开辟新教区。后来经过考察后发现这些地方都已经被一些早来的公会（如长老会和美以美会）所“占领”。因此在 1895 年

10月13日，亨卓斯主教就带同在上海的教士瑞德（Rev. C. F. Reid，韩国文献中称为李德）到汉城去考察。在那里（北）监理会的会督司克敦（Bishop Scranton）教士帮他们在汉城的南门内购得了一所房屋，房子位于司克敦居所的隔壁。1896年8月，瑞德教士的家眷从上海迁到汉城，成为监理会到朝鲜传道的第一个教士。不久他就被亨卓斯主教任命为朝鲜教区的长老（Elder of the Korean District of the China Mission）。^③

那个时候，尹致昊的父亲担任将军的职务，在地方上非常有权势。他捐了1000美元，帮助监理会在朝鲜建立学校之用。同年12月，他们经过北监理会的帮助，聘请到两个朝鲜本地人成为监理会的售书员（Colporteur）和福音传播者（Evangelist）。1897年1月27日，另外一个在中国教区的监理会教士柯立（C. T. Collyer，韩国文献中称他为李永福），和尹致昊从中国一同到朝鲜（那个时候尹致昊代表王室参加俄国沙皇加冕庆典后，从欧洲返回朝鲜的途中来到上海），就成为监理会第二个来朝鲜的教士。

柯立到了汉城以后，立刻就被派往离汉城不远的开城（Songdo）开始传教的工作。那个时候，瑞德教士已经在汉城的郊区给24个朝鲜人施洗。监理会在朝鲜的第一个正式的聚会就这样产生了。那时，尹致昊把他自己在汉城的一栋住宅捐出来作为聚会之用。同时美国的母会也决定将朝鲜划为一个独立的教区，任命瑞德牧师为会督。同年9月，朝鲜教区的第一个年会在汉城召开。决定将朝鲜教区分为汉城和



开城两个连环道 (Circuits)。同年 10 月 9 日，一个在美国母会属下的“妇女海外布道会”所任命的第一位女教士也来到朝鲜。这个教士就是甘博师母。她邀请了余慈度一同去那里开辟妇女传道工作。^④

第六章 开创妇女工作

监理会在朝鲜开展妇女传道工作的起因和中国相似。朝鲜的民俗文化深受儒家影响，男女授受不亲。如果想要向女界传讲福音，就必须有女教士才可以。因此，甘博师母才被母会的妇女国外布道董事会，从上海教区抽调到朝鲜，去开展妇女的福音工作。

甘博师母^①

甘博师母 (Mrs. Josephine Peel Campbell, 1852 - 1920) 在韩国文献中被尊为康夫人或姜慕仁女史。她是美国德州 (Texas) 人，父亲皮尔 (Bryant L. Peel) 是律师。她于 1878 年与甘博牧师 (Rev. A. M. Campell, 北卡罗来纳州人) 结婚，生有一子一女。数年内，丈夫与年幼子女先后病故。她受监理会在华女教士景海 (Laura Haygood) 和蓝琴 (Dora Rankin) 的影响，决心奉献终身，赴华传道。1887 年春天，她由美国抵达上海 (见甘博 1886 年 7 月 14 日致蓝琴亲笔



函)，^②在那里，她和瑞德师母建立了深厚友情。



开创妇女工作的甘博师母

甘博师母是一个多才多德的教士，擅长音乐，曾经担任日校的教师，并从事社会服务和福音的工作。她曾把《圣经·约翰福音》翻译成上海和苏州方言。她最大的贡献，乃是帮助柏乐文医生（Dr. W. Hector Park, M. D.）管理博习妇孺医院；并于1889～1893年间代理博习女子医学院的校务。那时余慈度父母双亡，甘博师母对她照顾备至，建立了非正式的谊母和谊女的关系。甘博师母在美国教士中间极受同工们的尊重，他们形容她是一个“文化渊博，异象超阔，极其坚忍和大有信心的女人。”^③

1897年10月初，甘博师母偕同余慈度坐船离开上海，10月9日夜间抵达汉城，被接待在瑞德医生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她们就马上去察看瑞德为她们所购买的新房子；同时立

刻开始学习韩文，以便能够尽速展开妇女福音工作。从同年年底，甘博师母向美国母会报告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她对于这一个新的工作所怀的迫切心情。

“我们非常盼望整个教会（指监理会）能够向上帝屈膝，为着朝鲜人的得救祷告。如果整个基督的教会，都能够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心就要受到激发，而担负起我们应担的责任，我们就不会只想到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而是想到如何来拯救灵魂了。”^④

就余慈度来说，她到朝鲜是为了逃避在现实环境中的种种试探。她见证说：“1897年，我的教士朋友约我和她一同到朝鲜去，我没有得到我天父的许可就立刻答应了。当时我心里以为只要能离开我现在的的事情，就可以将职务做得更好，并且也可避免当时看来似乎是非常大的试探。我就是在这种光景中，没有得到我（天上）君王的许可就离开了我的祖国。大家可以想象到在我以后的路途上，将要受到什么样的待遇。”^⑤

她见证中并没有说明这些遭遇是什么，却明言她是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借着诸般的人、事、物来作为成全她的工具（instrumentality）。她又说：“上帝是一个永远爱人的父亲，也是宇宙中公义的主宰。他把我立刻放在他的手中，并开始教导我许多宝贵的功课。这些功课，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并不能体会出它们带给我的意义，我也不欣赏他那双为我



安排道路的手。我曾极力反抗全能的上帝所用的诸般工具，且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出乎他的手。”

克服语言障碍

到底上帝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对付她、成全她呢？她的见证中透露得极少，因此，我们又必须从客观的史料中来寻找一些可能的答案。像任何外国教士一样，余慈度在朝鲜第一个必须跨过的关口，就是克服言语上的困难。她见证说：“我一到朝鲜，不久就发现，许多的事物对我来说都非常地生疏不惯，最使我泄气的一件事就是语言——它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我来以前有人跟我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朝鲜文应该不太难学。但是我记得第一周语文课的最后一堂，老师让我们把韩文的“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当面背给他听。我的朋友比我年岁大许多，却能背得比我更好。”

余慈度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即使是说自己的本国语言，她也会有“咬舌头”的毛病。在她的家人里面，父亲很有语言的天赋，他能够在几天之内学会一种新的方言，她的姐姐也是如此。因此，她一定是加倍地苦读，才度过了这一个外语的关口。她见证说：“上帝可怜我这个愚笨的人，借着祂柔和的爱，他使我学会了足够的朝鲜语文，而不久就可以用它来和人交谈。”

余慈度在汉城只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因重病返回中国就医。在此时期，她与甘博师母共同奋斗，几乎一切事情

都得包办。

妇女和儿童工作

就她来说，因为身份是医生，她第一个责任就是为当地的妇女诊病。当她的朝鲜文稍微有一点基础后，就开始向当地妇女传扬福音。另外，对于甘博师母兴建学校的事，她也不得不尽一切所能的予以协助。不仅充当教师，连教材编撰等工作都成为她分内之事。

1898年5月，甘博师母建立了第一个日校，开始只收了两个女童和两个男童，都是穷困阶层出生的孩子们。因为人手不够，她们就从汉城美国长老差会聘请了一名教师来帮忙。同年夏天，甘博师母又在距汉城十二英里的高阳（Koyang）建立了第二个日校，收了12个学生。她们从本地的信徒中间物色了一名女教师，但是，因为这个教师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基督徒的教育，效果方面当然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高阳是位于汉城郊区的一个很小的村落，这是瑞德医生抵达汉城后最早宣教的地方。1897年，高阳有24人受洗。瑞德把他们分成两个小班（Classes），每一个小班都有一个带领人（leader）负责牧养。后来，其他的村落也仿照这种做法，纷纷建立了各种小班。第二年，一部分信徒从高阳迁到汉城，这就是监理会第一个正式聚会的开始。汉城是监理会的第一个教士站（Mission Station）；开城被开辟为第二个教士站。^⑥

这时候，甘博师母和余慈度的同工阵容一共有4个，分



别是甘博师母、余慈度、瑞德师母和尹致昊师母。后来陆续来到朝鲜的同工，都被分派到汉城以外的教士站。柯立师母随着丈夫柯立牧师（C. T. Collyer）从中国调来后被派往开城；哈迪师母随着哈迪医生（R. A. Hardie）被派至釜山（Fusan）和元山（Wossan）从事妇女福音工作。哈迪医生是加拿大人。他起初是加拿大各大学海外布道会的代表，负责釜山和元山教务达8年之久。他转入监理会后，仍然留在原地工作。严格说来，瑞德师母并不算是女同工，因而不能称为“教士”（missionary）。她是以“教士妻子”的身份来参与妇女和儿童的工作。

对于余慈度在福音事工开创期所遭遇的种种艰难，我们并没有任何的数据可以参考。但是，瑞德师母在同一时期所描述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余慈度的经历应该是大同小异。1896年，瑞德师母就到了朝鲜，她同样遭遇到语言不通的困难。她最初没有办法用朝鲜文来开办查经班，但是她非常注重祷告。她描述自己刚到朝鲜时那种极端孤单的生活：除了服侍丈夫以外，还要照顾4个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料理家务上。她学了一些基础朝鲜文会话以后，马上就邀请本地妇女到家里来谈论福音。她描述当初的情况说：

“为了招待她们，我只能把与主有关的图片给她们看一看，或给她们喝一杯茶，或做一些任何其他动作，只要能够表达我的善意就行。就这样，我看到她们常常是高高兴兴地离去。”^⑦

同时，她在自家的客厅里开办了一个主日学，除了自己的孩子以外，也邀请了其他公会教士的孩子们来参加。1896年秋天，瑞德教士盖好了正式的聚会场所后，她在本地的妇女中间正式开始传道的工作。次年春，尹致昊师母和柯立师母从中国被调来参加妇女工作，使瑞德师母孤独之感顿时消失。

她描述她们同心向妇女布道的情况：

“我从街上随便请了几个韩国妇女（包括一位已经信主的）到我客厅里坐一坐。虽然我只会讲一点点朝鲜文，我还是想尽办法和她们聚会一小时。我一面带领她们，一面也向她们学习。我用诗歌本当做教材，选了一首比较熟悉的诗歌，让她们先帮我和她们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每读一行我就问她们懂不懂，解释完后，就再读下一句。读完整首诗歌以后，就一句一句地唱。唱完后，就由那一位信主的朝鲜姊妹带领我们，一同学习用韩文把诗歌化作祷告。”^⑧

培花学堂的成立

我们现在回到甘博师母和余慈度的情况。余慈度借着行医向当地妇女传福音。对于她医疗服务的情况，甘博师母在1898年的年会中报告说：

“不少本地妇女来到余小姐的地方看病，而且她们



都是不请自来的。”^⑨

甘博师母在同一时期集中精力筹办培花学堂的事。这个女校于1898年10月2日开始招生，开头只有数名贫穷女童愿意就学。校址在汉城的古涧洞（Ko-kan-dong）。学校的经费是美国北卡罗来纳的信徒所奉献的，因此这一个学校的英文名称是“卡罗来纳学校”（Carolina Institute）。这时候，余慈度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详细的病情她没有透露，但她说她必须节制饮食，有时候只能喝牛奶）。培花学堂建立后不到6个月，她就因重病回国就医，因此她对培花学堂的积极参与，是她从中国返回汉城以后的事。

第七章 回国就医

余慈度对她在朝鲜第一个时期中所经历的人、事、物等各方面的描述，因为数据缺乏的缘故，无法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在她的见证里，对自己属灵的经历和身体的健康情况，则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在这一年半期间，她在上帝手中经过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关口：一个是追求“圣灵充满”的关口，上帝使她学习因信而活；一个是身患不治之病的关口，上帝使她学习因信得医治。^①

追求圣灵充满

余慈度到汉城不久，她就非常渴想追求圣灵的充满。有一天晚上，她和另外一位教士（大概是柯立师母）一同追求圣灵的充满。她们找了一个地方跪下来恳切向上帝祈求，一共跪了3个小时之久，期待着圣灵的印证。那个时候，她们以为圣灵充满一定会有一种超凡的表现，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令她们非常失望。多年以后，余慈度才认识到，虽然她



相信，有时候上帝会向他拣选的一些人显示神奇的事，但是“我们绝对不应当盼望，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得到圣灵。因为我们是誰，竟敢要求上帝照着我们的意思行事呢？”

这次失败以后，余慈度以为，也许她应当独自到上帝面前寻求才能得着。有一天早晨，用过早餐后，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且把房门锁起来，决心非要得到圣灵充满以后才出门；但她刚刚跪下不到10分钟就有人来敲门。她见证说：“我决定不论是谁敲门我都不开，因为我正在我的君王面前，向他呈上一个特别的请求。如果我从我的膝盖上起来，那将是对上帝的大不敬，也许就不能使我得到那个‘祝福’。”

可是那个人不但未停止敲门，而且敲的声音越来越大，她还是不去理会。没想到那个人又绕到她卧室的后面，敲她后面的窗户，而且敲得声音大到几乎要把玻璃给震破了。这时候她才不得不起来，心里实在是失望至极。她下结论说：“我是不可能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得到圣灵充满的！”

追求圣灵充满失败之后（从她的观念看是“失败”），她陷入一种长期的恐惧感中，一直持续了一年左右。这个恐惧的来源与当时19世纪末的“大灾难”（Great Tribulation）神学思想有关。她见证说：“追求圣灵充满失败以后，约有一年左右，我经常感到恐惧，生怕将来（主再来时），我会被主撇在地上，不能被提，而让我经过大灾难。我怕基督再来提取他教会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预备好。”她继续说，“当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的时候，我的属灵的生命也随着瘫痪了。我里面一直感觉到非常空虚，但我不再去想追求圣灵

的充满了。”

1899年4月，余慈度的健康实在太差了，不得不暂时返回中国去寻求医治。甘博师母在1899年底向美国母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余慈度的情况：

“1899年4月，我们的人力大大减少。瑞德师母（因为重病）返回美国（于1901年5月17日去世），做她查经班助手的尹致昊师母，随着丈夫迁到元山（尹致昊被任命为元山市的市长）。一直做作我助手的余小姐，也因为身体健康不佳而返回中国。因此，我们这里的妇女工作就有一段时间受到了相当的影响。”^②

余慈度没有想到，她回到中国以后，还有更大的磨难在等待着她。

神迹医病

余慈度回到上海后，她首先去一个著名的妇科医院治病。经过检查以后，医生认为，必须动手术才有可能解除她的痛苦（她并没有说明她所患的是哪一种病，很可能是与神经系统、脊椎骨，或心脏系统有关的重病）。但是医生们认为需要动的手术太复杂了，因此拒绝为她开刀。她不得不回到苏州她所服务过的博习医院就医。那里的医生也告诉她，她的病是不可能完全医好的，恐怕一生都将过着残病的生



活。她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种失望的感觉，但作为一个医生，我对我的前景是非常清楚的。”她心里产生了激烈的交战，她见证说：“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永远不会再看见我那个朋友了（指甘博师母）。第二个想法是，我心里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还没有被上帝使用，就被他撇在一边了。我认为服事上帝是我唯一可以讨上帝喜悦，也是唯一可以表达我爱上帝的途径。”

以后，她认识到“顺服上帝”比“向上帝献祭”更能讨上帝的喜悦（《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暑期到了，她搬到姐姐家里住了几个月。她病重在床，每天只能坐起来几分钟后就得躺下去。就在那个时候，她读到一本杂志，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上帝医治的文章，她的心被触动了。她一面继续吃药，一面迫切地向上帝祷告说：“如果是你的旨意，就求你使我的病得到医治。”到了秋天，当她到医院去复检时，她的医生朋友们惊奇地发现，她的健康状况居然大大地好转。他们准许她在次年（1900）1月回到朝鲜继续传道的工作。

在她将要离开中国的前一个月左右，她的姐姐忽然得了重病，多半是产后猩红热一类的疾病。照人看来这种病是致命的，她回顾当时的心情说：“唉！在这种压力之下，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一旦主把姐姐接去，她会撇下6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一周。这样我就要忍受与我家人中最后一员永诀的痛苦，也必须放弃为主在朝鲜所要做的工作，而留在中国，去帮助我的姐夫照顾他的孩子们。”

当她第一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她的姐姐曾嘱咐她说，如

果一旦自己在孩子们成年前就过世的话，她应当为姐姐照顾最大的女儿，因这个大女儿的性格非常特别，和其他孩子们不同，她没有办法适应没有母亲的生活。

余慈度的身体情况虽然进步很大，但是医生们不允许她做照顾病人的工作。一天晚上，她姐姐忽然陷入昏迷，她在无助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房间，向上帝把心事全部赤露敞开，求上帝自己来担负她心中的重担。她见证说：“我极力想睡去，但是心情太沉重，无法成眠。正当我睁着眼睛，为着此一黑暗的将来左思右想的时候，上帝忽然对我说：‘你记得你刚才祷告时所说的话吗？你不是要我背负你的重担吗？可是除非你把重担放下来，不然我怎么替你背负呢？你在祷告中所说的，如果是出于内心，现在就应当入睡，也应当已经安息在我的里面了。’我听到这些话以后，实在对自己的不信感到羞愧，于是我求上帝赦免我。之后我就睡着了，也不再有任何的思念了。”结果出现了神迹，“第二天早晨，我5点钟就醒了，当我到姐姐房间去看她的时候，她的病几乎完全好了，高烧也退了。虽然前一晚她陷入昏迷，如今她也认得出我了。我是何等地感谢上帝啊！我虽然如此固执和任性，他却永远是一位爱我的上帝，一位信实的上帝。”

1900年元月，余慈度返回汉城继续她传道的工作。那时候她并不知道，在她离开中国半年之内，一个以杀洋人与中国基督徒为对象的义和团运动将在中国发生。她在可怕的风暴即将来临之前，离开了中国。可是她并没有想到，回到朝鲜后，还要经历更严厉的考验。

第八章 重返汉城

余慈度返回汉城以后，立即投入监理会的全面工作，包括教育、医务和福音。这两方面的工作是相互关联的。她在培花学堂需要与甘博师母分担授课和教材编纂的责任，另外还需要充当校医。学校的教堂建成以后，她还要以女传道的身份主持主日的崇拜聚会。因为她是监理会唯一的医生，除了为学生看病以外，还要为小区中的妇女做免费诊疗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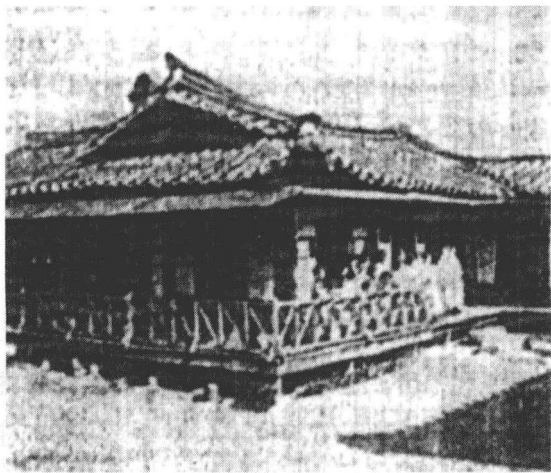
另外，她也要和其他的女传道共同负责小区的福音工作。现在我们把她在学校和小区所担负的繁重服事加以分析。

培花学堂的职责

在学校的教务方面，她负责教材编纂和教学两方面的工作。那时培花学堂的课程已经包括美术、生物、国文、地理和历史。其中地理教科书是由她负责编译的。1901年，她把



一部中文版的地理教科书翻译成韩文，共上、下两册。另外她还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绘制各种地图。^①



培花学堂最早的校舍

在教学方面，她一边充当生物和美术的教师，一边训练学生学习手工艺，担负工艺部门的全部责任。根据美国监理会在国外兴学的政策，除了《圣经》和普通科目以外，也训练学生们学得一技之长，以便他们毕业后可以谋生自立。余慈度生长在江浙一带，那里的女孩子从小就学会了花边和刺绣等工艺，因此她就成为负责工艺科的最佳人选。在她指导下，工艺部很快就发展起来。1902年，学生们制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市场要求的水平。甘博师母在1903年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工艺部门已经按照订单出货了。这样不但

为我们增加了购买材料的本钱，也让这些年岁较大的女孩子们，亲身体会到可以凭着自己的双手来谋生。”^②

工艺技术的训练，对于学生们的性格也产生良好的影响。甘博师母在同年的报告中说：

“因着女孩子们在智力、品德和工艺方面的平衡发展，她们暑假回家后，都给父母留下很好的印象。有的父母写信给我们说，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女儿进步的情况。有一个父亲甚至还说，他的女儿比去年进步了百分之十。”^③

在学校医务方面，余慈度除了在学校诊所照顾学生以外，还要负责医院（监理会办的）里的两张病床，照顾住院的病人。尹师母身体多病，有一次余慈度放下了学校一切职务，在医院里专心照顾尹师母3周之久。^④另外一次，一个学生受到严重灼伤，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照顾这位学生。当全校学生们遇到特殊情况时，她的工作就更重了。1902年，学生们受到流行感冒和喉咙发炎的侵袭，以致造成学生的死亡，那时全部的医护工作都由她一人独自担当。甘博师母在同年的报告中说：“余小姐对这些生病孩子们的照顾，令我们怀念不已。她的医术和长期所受的训练，使她成为一位非常称职的医生。”^⑤



“女传道人”在监理会中的角色

根据监理会的传教制度，牧师的职位只有西教士才能担当，他们到了国外的工场以后，立刻就开始训练本地的信徒充当牧师的“助理”（assistants）。助理包括四种人：男传道人（Preachers）、女传道人（Bible Women）、劝诲员（Exhorters）和查经班带领人（Class Leaders）。

这四种人除了女传道人外，都是男性。劝诲员和查经班带领人的职责是帮助牧师照顾会众属灵上的需要，从这两种人中间就逐渐产生出男传道人。女传道人的产生和东方的社会风俗有密切的关系，她们在中国和朝鲜都占有独特的地位，如前述，在朝鲜因为儒家传统的观念，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因此西教士必须有专门为妇女举行的崇拜聚会。女传道人在西方教士的监督下实际上就变成妇女崇拜聚会的带领人，诸如对妇女的探望、讲经和勉励等事工，都在女传道人职责的范围内。在朝鲜的女传道人一般都是年岁较大的妇女，这种现象也是与朝鲜的风俗习惯有关，如果年轻的妇女随便到别人家里去串门，在社会上被认为是不合体统的行为。她们一般受的教育水平不高，必须先接受基本的训练，增强阅读的能力，以后才能参加查经的训练。

我们看见，女传道人在监理会所负的责任，并不是单纯的牧师助手，而是像今日独当一面的女牧师一样。

余慈度与妇女工作的开展

余慈度于1900年元月返回汉城以后，重新全面投入妇女工作。当时日俄双方都想加强其在朝鲜的控制，朝鲜的王室和人民都感觉到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日本帝国主义在名义上是帮助朝鲜进行全面改革，实际上是加紧其对朝鲜的内政和外交的控制（日俄在朝鲜的政治角力中，至终引发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这种国际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氛中，无助的朝鲜人民纷纷转向基督教会，寻求心灵上的寄托，因此慕道者人数激增。根据甘博师母1903年的报告，^⑥在余慈度返回汉城后的两三年中，她们日常工作量加重了三倍，但是同工的人数却相对地减少。余慈度的身体就是在这种超负荷的情况下累垮了。

从1901年末，虽然余慈度在监理会组织中的地位，已经从女传道人提升到传教士或外国工人（Foreign Worker）^⑦，但是她仍然必须继续从事女传道人的工作，并且她的工作繁重无比。

监理会的档案中，对余慈度在该会的繁重事工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报道。在福音工作方面，她一开始就担负起女传道人的职责。那时在汉城担任女传道工作者通常只有4人，其中有两位金师母，一位金师母体弱多病，另一位金师母也常因需要照顾有病的婆婆无法专心尽职。



另一位女传道人的职位，先后由两三位妇女来充当，但工作能力不足。余慈度是她们中间唯一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根据她 1901 年对母会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妇女工作涉及两方面的事工：由周一至周六，她们或到小区挨家挨户访问，或在她们的住处接待来访的妇女。在那一年中，她们挨家挨户访问的人数达 1000 人以上，在住处接待过的妇女也有 1601 人（根据甘博师母 1901 年至 1902 年元月 4 日报告的统计）。

根据甘博师母 1903 年的报告，女传道人在该年度中到小区挨家挨户访问的妇女人数，高达 2454 人，另外在茶洞礼拜堂接待来访妇女 1653 人，儿童 244 人。在 1653 名来访的妇女中，有 925 人由余慈度独自承当接待和福音的任务；在 244 名儿童中，也有 211 名是由她独自招待的。换言之，在两方面的事工上，她一人分别承担了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 3 个女传道人只承担了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十的工作。

除了单独到小区造访，在茶洞的教士之家接待来访的妇女以外，余慈度需要为有心追求的妇女办小组查经班。每天早晨，还要为培花学堂的工作人员举行晨祷聚会，包括一个厨师、两个看门人、一个打杂的男孩和女佣人。晨祷后她继续和他们一同研读礼拜天的主日学课程。余慈度在礼拜天的例会中，所担负的责任也相当重。她于 1900 年元月从中国返回汉城，该年春天位于茶洞的教士之家（Mission Home）建成了。复活节的礼拜天，她们在教士之家开始了为汉城妇

女所举行的崇拜聚会。

1901年春，茶洞礼拜堂（Louisa Walker Chapel）建成。礼拜堂坐落在培花学堂的院子里，除了作为学生主日崇拜之用外，也向大众开放。自从茶洞礼拜堂开放以后，有一年半之久，余慈度都是该教堂的主讲人。那时每周有三次聚会；一次儿童主日学，两次成年妇女的聚会。那一年参加崇拜聚会的人数共有1492人，平均每次30人（不包括本校的32名学生）。另外，特地来参观茶洞礼拜堂和慕道妇女的人数也有1200人之众。

这样沉重的负担，连正常人都会累垮，何况她本来健康就有问题。她见证说：“我的身体愈来愈坏，但我仍然必须不停地工作。在那些日子中，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的。”^⑧

甘博师母在1903年的报告中也提到：“余小姐因为健康不佳，而必须返回中国。”^⑨她形容这是一件“令我们心里伤感的事”。但是根据余慈度的见证，我们发现健康问题，并不是她必须返回中国的主要原因。那么，她是因为什么而被迫回国呢？

第九章 回国前的挣扎

余慈度见证说，她返回汉城后不到一年，上帝就催促她再返中国，但是她不肯顺服，因此上帝就借着疾病使她就范。她之所以不肯顺服上帝，乃是因为她不肯放弃“世界”和上帝给她的“那一个东西”。我们要想解开她像谜语一样的见证，应当首先看一看，她在那些受试炼的时日里的健康情况，然后再来探索她所说的“世界”和“那一个东西”是什么。

余慈度回到汉城后不久，她的健康就出了问题，她说：“我身体上的疾病影响到我内心属灵的情况，最终我整个人都垮了。”她曾提到几种身体上所遭受的疾病，包括扁桃腺炎、白喉症和肺炎等。但实际上她所害的病恐怕还不止这三项，因为这些病都不应当让医生们放弃对她的治疗。她说：“当医生们认为我的病使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就放弃继续给我治疗，因此我就索性自己开药给自己吃。”

从1901年下半年开始，几乎有两年之久，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每天晚上均得服用一种强烈的安眠药（Bromide，溴化乳剂）。即使如此，她仍然常常失眠。她的神经变得非



常脆弱，只要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她就会激动得哭起来。她的情况“成为甘博师母一个极大的试炼”。

上帝亲自鼓励

余慈度身体的疾病自然影响到她日常工作和正常的属灵生活，她说：“我常常经过整夜失眠以后，身体没有得到休息。但是第二天早晨，仍然要强迫自己起来，又恐惧又战兢地去面对一天繁重的工作，我的身体虚弱到极点，有时因为起得太晚，没有时间祷告，我就会匆忙地把主祷文背一遍，希望这样可以保守我白天不会跌倒。”^①

在她长期的痛苦中，她说上帝曾经利用梦境给她属灵上的鼓励。她见证中描写到上帝那一次向她“在荣耀中显现”的特殊经历：

“在我软弱和失败当中，有一次上帝向我显示他最宝贵的大爱。我梦到基督就要降临，来审查我们的工作。那时我似乎很急着要去见他，一点也没有去想我自己的工作是否可以得到他的称许。忽然间我发现我已经站在主的面前了。哦！我看到他的荣耀，我感受到他那难以形容的温柔，和他面上所流露出来的大爱！在那一刹那间，我的全人似乎都变化成透明的状态。并且我也知道，有罪的我已经被洗得雪白了。按照《以赛亚书》1章18节所说的，当我仰起头来，注目观看他那荣耀无比，满有慈爱的面容时，

我对他说：‘主啊！我爱你。’他用极温柔和慈爱的声音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

死亡的试探

作了这一个甜美的异梦以后，她的健康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的，她的病情愈来愈糟。她痛苦到一个地步，甚至会想服用过量的药物来结束自己的性命。她见证说：

“我曾经两次求上帝让我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撒旦向我建议说：‘你为什么不索性吃一些烈药把你自己了结呢？’我回答说：‘不！我要等到上帝的时间来到才死。’哦！那是何等黑暗的时刻啊！活在世上对我来说实在太痛苦了，简直是一个难以担当的重担。我觉得我是一个人单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似乎正在把属世的信心和爱心从我身上完全剥夺殆尽，这自然对一个活在肉体中的人只能带来灰心和失望。”

她认为她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有“上帝的手在其中”，因而就陷入极端自怜自怨的异常心理困境中，她说：

“我的思想混乱到一个地步，使我几乎要发疯了。没有人了解我的苦衷。有的时候，只好把我最珍爱的小



猫抱到院子里那棵榆树底下（我是一个非常爱猫的人），在那里我用中国话和它交谈。这只可爱的小猫似乎真的了解我向它所吐露的悲伤。它那两只小眼睛一直瞪着看我的脸，流露出它对我的了解和同情。”



这就是当时的榆树

这个时候她感觉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并且她的身体也已经瘦得像一个皮包骨的人了。她在绝望中向上帝说：“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可以使我不必再用药物而刚强起来。不然，我就是吃药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的。”

她记录说经过这一次向上帝迫切祈求以后，她的病情忽然开始好转了（不过一直到她返回中国以前，她的健康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

余慈度在多年以后才认识到，这一切的病痛都是“上帝

厉害的手”所安排的工具，为要使她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她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折磨才顺服上帝的指示呢？到底阻挡她顺服上帝的“世界”和“那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余慈度在她见证中用以色列人40年“旷野漂流”的故事，来形容她6年中在朝鲜传道的经历。她说她是落到“世界”里了，却又不肯“向世界死”（《加拉太书》6章14节）。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世界”是信徒陷入“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根源（《约翰壹书》2章16节）。而这两点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生活的特征。那么，余慈度在朝鲜时是否曾经落到“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等试探中呢？关于这个问题，她在见证中没有提供任何说明。

我们在韩文资料中，所能找到的唯一与她有关的线索是1901年的“金永准事件”。

金永准事件^②

金永准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政客，是他父亲的庶妾（姨太太）所生。他为人精明能干，得以进入王室中的侍从院（王室侍卫队）服务，并得到朝鲜国王高宗的信任。他揽权索贿，无所不为。1900年前后，他曾担任过汉城警务使（警察总局局长）、军部大臣和陆军参将等职。1901年初，事件发生时，他正担任“署理法务部大臣”。

金氏的政敌是当时革新派人士所组成的“开化党”，党



员中包括尹致昊和其父尹熊列（原任法务部大臣和将军要职），以及李承晚（二次大战后朝鲜第一任总统）等重要人士。尹致昊虽然与金氏维持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金氏的为人极为不耻。尹氏夫妇都是监理会的重要成员，而金氏又在汉城警务和司法部门身居要津，对传教士的活动有直接管辖权。很可能他因着与尹致昊的关系，得以和监理会的教士们（包括余慈度）有所接触。

当时，在朝鲜社会中的门第观念仍然很重。虽然政府的官员也有庶流（平民）出身者，而那些士大夫（Yangban）家庭出身的官吏即使和前者称兄道弟，但他们绝对不肯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庶流之辈。因此金氏一直无法找到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结婚对象。

余慈度出生于中国江南世家，并且在中国文风最盛的江浙一带成长，在容貌、风度以及才能方面，对金氏来说自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对象。金氏因为企图陷害政府中的同僚和阴谋发动政变，以重组新政府（1900年他企图把西教士全部杀掉），因此受到酷刑审问，被判绞刑处死，时间是1901年3月18日深夜（19日子时）。

尹致昊在日记中提到金氏被处决事件时，同时也提到了余慈度。他说：“金永准曾经千方百计企图和那一位与甘博师母同住的中国女士俞灵芝结婚。他真是邪恶之极，他受绞刑是罪有应得……”^③

尹致昊的日记里，并没有说余慈度对金永准的追求有任何“断然拒绝”等类的话。但是鉴于她长期失眠，甚至有自

杀的念头，这种情形应当和健康以外的情感因素有关。至于其他方面可能遭受的打击，诸如与同事间的摩擦等事，都不应当使她在情感上受到如此极端的刺激。另外，在她见证中提到上帝的灵催促她回国的时间，正是金永准被处决后几个月内的事。

至于她在见证中提到她不肯放弃的“那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显然是和她在监理会妇女工作上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见，她在监理会中担负多方面的重任。医疗方面，她独当一面；教育方面，她和甘博师母共同创立培花学堂；教会方面，她成为“茶洞礼拜堂”的主讲人，并且成果累累。因此，她居然会同意撒旦对她的耳语：“你多么傻啊！你不知道这一切事物都是从上帝的来的吗？你现在不肯放弃的只是上帝所给你的恩赐之一啊！”她承认证说：“我居然愚笨到一个地步，听从了撒旦的建议，因为我正在寻找借口去保持我所得的‘那一个恩赐’。那恶者永远知道，何时是它向我们进言最好的时候。哦！我们何等需要在祷告中拒绝我们自己既定的主意啊！”

结束“旷野漂流”的生活

到了1903年夏天，上帝用“荆棘做成的围墙”把她圈住，只留给她“一个出口”，就是“生命之路”。但是她还是想穿过围墙，结果被围墙的荆棘刺得遍体鳞伤，她就像一只困兽，终于就范。那时，她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真



要我回中国去，就求你给我一些钱，因为我在银行里只有两毛六分钱。”

她说上帝很快就答应了她的祷告，她见证说：“在一个月內，我所收到的钱数，比我平常所收的多五倍。虽然我一直不知道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确实知道，这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

就此，她结束了“旷野漂流”的生活。她说：“我路上的一切障碍都清除了，我再一次回到中国，并且行走在顺服上帝的路上；上帝也就以他的大爱和不可言喻的喜乐，充满了我的心。”

回到中国以后，她还不知道她即将进入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大复兴中。我们现在需要放眼全球，来认识这一个复兴的洪流是如何涌到中国的。

第四部 复兴的洪流

第十章 复兴洪流到东方

复兴运动 (Revivalism) 在西方教会中，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以后，接着 18 世纪时圣灵在欧洲发动了以亲岑多夫 (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 - 1760) 为首的摩拉维亚大复兴 (Moravian Revival)，同时也在英国发动以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1703 - 1791) 为首的复兴，并在美国发动以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 - 1758) 和怀特菲德 (George Whitefield, 1714 - 1770) 为首的复兴。

到了 19 世纪，又发动了以芬尼 (Charles G. Finney, 1792 - 1895) 和慕迪 (Dwight L. Moody, 1873 - 1899) 为首的福音派复兴。其中借着约翰·卫斯理所启动的复兴又并发成导向全球的宣教运动 (Missionary Movement)。这个崭新的运动 (其实是从使徒时代就开始的一个古老运动的恢复) 不但把福音推展到西方以外的国家，也将复兴的流带到世界各地。

如果我们观察 20 世纪头 10 年中，圣灵复兴之流的导向，我们会发现它像一股巨流，首先顷泄到英国的韦尔斯



(Wales) 这一个坝口，从那里这一股主流的主流首先被导向西方的美国，接着又导向东方的印度，然后又从印度流到朝鲜，再从朝鲜流到中国的东北，再继续流到华北和华中以至华南。导向美国的主流在洛杉矶的艾苏萨街 (Asuza Street) 涌至巅峰，然后再由那里向全世界喷射出更多的支流，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我们若要了解余慈度在中国教会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把她放到圣灵在全球的流通网络中，才能看得清楚。

威尔斯大复兴 (Welsh Revival) —— 复兴水流的坝口

英国当代研究教会复兴史的白炳屯 (D. W. Bebbington) 教授认为，英国近代的复兴运动在卫斯理各公会 (Methodism) 中最为明显。复兴的流先从卫斯理公会的圈子里喷发出来，而后影响到其他公会的复兴。他说：

“教会的成长一部分是一种稳健的、持续的过程，而另一部分是一种短暂的、人数急剧增长的突发情况。复兴的爆发在卫斯理公会中间最为显著。一旦爆发了，它也就影响到英国其他地方的教会。”^①

就英国 1904 至 1905 年的威尔斯大复兴来说，除了英国以外，它还影响到世界各地教会的复兴。威尔斯大复兴是在

该区的“加尔文派的卫斯理公会”（Calvinistic Methodist Churches）中爆发的。在这次大复兴中，上帝所拣选的器皿是一个名叫罗伯兹（Evan Roberts）的年轻矿工。

复兴的流使整个威尔斯区教会的例会完全停顿，也迫使那里的电影院和酒馆全部关门。大批矿工经历了厉害的得救，使他们的生命产生了剧烈的改变，以致造成煤矿生产的停顿。一两年内，在威尔斯有 10 万人得救归主。

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的重要领袖如坎培·摩根（C. Campbell Morgan）、梅尔（F. B. Mayer）和宾路易师母（Mrs. Jessie Penn - Lewis）等，都是亲身到那里做了实际的考察，一致确认这个大复兴是真实的。宾路易师母并因此成为罗伯兹的亲密同工。他们中间如梅尔等受邀到美国以及中国去，专为这次的大复兴作见证，他们也就成为教会复兴的渠道，把复兴带到世界各地。在东方，复兴之流首先到达印度，并继续以印度为跳板涌流到朝鲜、日本和中国。

印度的复兴——东方复兴水流的跳板

圣灵在印度的复兴，至少从两处开始，一个是卡西亚（Khasia Hills）山区。^②那里的传教士们是从韦尔斯来的，差会的名称是“威尔斯加尔文卫斯理公会”（Welsh Calvinistic Methodists）。该会的教士于 1841 年到达卡西亚。多年来，这里的信徒们一直是萎靡不振的。后来，上帝兴起了一批“守望祷告者”向上帝祈求复兴的来临。1904 年末，信徒们听



到威尔斯母会的复兴情况后，就迫切向上帝祈祷。在1905年一次的大会中，圣灵开始作工。他们回到各自的村落中，也同时把祷告的负担带去，不久教会迫切期待的复兴就爆发了。

另外一处是借着印度著名女教士拉玛白（Pandita Ramabai）开始的。^③她是印度美以美会慕克替（Mukti）女子学校的校长。1905年元月，她呼吁该校女生们自愿参加她每天主领的祈祷会，最初只有17位学生参加，该年6月增加到30位。她们停止学业到乡下去传福音，并且每天向上帝祈祷，求上帝将“上面的能力”赐给她们。

在复兴来临以前，已经有550位学生，每天聚集两次迫切祷告。据说，同月29日清晨三点半钟，一位女孩在睡眠中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她旁边的一位室友看见她身上被火包围，急忙跑出去提了一桶水来，就要泼在她的身上，可是发现她身上并没有着火。在一小时内，全宿舍的女生都围绕在她的周围痛哭流涕，向上帝祈祷认罪。从那时起，复兴的火就在那里燃烧起来，并且扩散到慕克替全区和印度其他地方。^④

印度复兴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远东，复兴的流也就在朝鲜和中国发动了。

朝鲜大复兴^⑤——中国复兴的前奏

1903年，余慈度离开汉城后不久，朝鲜的大复兴就爆发

了。那时朝鲜正处在日俄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他们在极端无助的困境中，不得不迫切归向上帝。同时，上帝也借着他所兴起的仆人，使本国信徒和西教士们从冷漠的光景中觉醒起来。当韦尔斯的复兴巨流还没有冲击到朝鲜的前两年，复兴已经在朝鲜像汲汲溪流一样开始发动了。

1903年，7位西教士在元山有一周的祷告读经聚会。那时，一个从中国福建来的监理会女传教士白美丽（Mary Culler White）来朝鲜度假。她向与会的传教士报告，1895年在福建发生的教士被谋杀的“古田惨案”，以及它如何影响到那里的传教士，和他们如何迫切向上帝祷告，渴慕复兴的来临。她的报告使那些在朝鲜的传教士们，对于他们自己安逸的生活方式感到惭愧。当时，特别受感动的是在元山负责监理会教务的哈迪医生（Dr. R. A. Hardi，加拿大人）。同年10月，世界著名布道家傅蓝森传教士（Frederick Fran-son）——美籍瑞典人，也是北欧布道联合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的创办人——来到了朝鲜。因傅蓝森的复兴布道，哈迪医生首先痛哭流涕，向上帝认罪悔改，因此带进了元山的复兴，接着复兴的流也在平壤开始了。

当时，傅蓝森帮助哈迪医生学习得胜的祷告，就是要向上帝迫切呼求：“哦！父啊！你能做！你一定能做！你一定会做！你一定要做！”那时正值“日俄战争”（1904-1905年）期间，双方的军队在朝鲜的北部和中国东北的南部剧烈拼杀。最后日本击败了俄国，排除了俄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的势力。

接着，日本开始对朝鲜人民加强政治迫害，迅速进行日



化朝鲜的高压政策。那时，朝鲜王室摇摇欲坠，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许多人都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基督教会的领导上。信徒的祷告越迫切，信主的人数也越发增多。1905年，复兴之火在朝鲜北部的平壤首先开始燃烧，两周之内就有700人归主。次年，传教士庄士敦医生（Dr. Howard Agnew Johnston）从印度来到汉城，他报道了圣灵在威尔斯和印度复兴的情况，使复兴之火在朝鲜南部也燃烧起来。慕道者和信徒将汉城每一个教堂都挤得水泄不通。同年的元旦，平壤的福音聚会有4000人参加（全城人口只有2万人）。平壤附近信徒的人数从6507人突然增长到11943人，就是有83%的增长。同一年，汉城各公会联合布道，信主的人数首次达到1000人之众。美国著名布道家慕德（John R. Mott），在那里向6000听众布道达两个半小时之久。

另外，在济物普（汉城西南十二英里的港口）有一个北监理会的教士君斯（George Herber Jones）。他在那里工作数年之久，没有得到一个果子。当复兴的流于1906年到达济物普时，他的讲道聚会有900人参加。^⑥同年秋天，江华港各公会联合布道，结果有2500人得救。在平壤，从1906年8月开始，在哈迪医生带领下，西教士们举行了一周的祷告读经聚会，次年新春元旦，各地教会在平壤举行查经聚会，他们同心合意祈祷，带进了1907年全国性的大复兴。

1908年，中国的“东北大复兴”虽然是直接受到了1907年朝鲜大复兴的影响，但是中国教会中复兴的洪流，早在余慈度1903年离开朝鲜以前，已经在北方逐渐启动了。

第十一章 复兴洪流到中国

1903年9月，余慈度离开汉城。那时，正是教会复兴的洪流在中国汲汲发动的时候。^①

从1901年开始，余慈度就感觉到圣灵的催促，要她返回中国。根据她记录，上帝对她说：“你回中国去，因为在那里有我要你去做工的。”那时，她显然不肯放弃自己在朝鲜所耕耘的那一块属灵天地。她并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中，上帝正在朝鲜酝酿着他自己的复兴运动，同时也在亚洲各国开始在当地信徒中间兴起他的器皿，来承当教会复兴的责任（相对的，上帝也正在那里迅速减轻外国传教士在教会复兴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余慈度来说，她的回国，正好符合这一个神圣的计划。就是要兴起朝鲜本地的信徒来担负上帝在朝鲜的复兴工作，同样上帝也要余慈度回到她的祖国，有份于上帝在中国的复兴工作。果然，她回到中国不久，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卷入圣灵在中国复兴的洪流中。



复兴的起因

复兴洪流在中国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支流所形成。一是福音的广传，导致得救人数急剧增长；二是信徒本身灵性的复苏，促成他们属灵生命的更新和奉献。在1900年以前，全中国受洗的基督徒人数不到8万人（这是西教士从1807年开始，在中国将近一个世纪所获得的成果），但是此后6年之内，信徒人数就激增到17.8万人之多。^②

在她的见证中，余慈度对于这些圣灵外面工作的表现提到的很少，虽然她也谈到上帝如何从一个似乎不太著名的地方开始，使她逐渐有份于全国（特别华中和华南）的复兴工作，但是她仍然对于人、事、物和地点都故意加以省略。相对的，她却详细描述圣灵如何在她身上借着环境来带领她。因此，我们需要先把这段时间中，教会在华发动复兴的工作，做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衬托出她在教会的复兴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1900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西教士和中国信徒都遭受到严重的伤害。经过了八国联军之役，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庚子条约》，此后不得不开始在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改革。原来以义和团为首的仇外观念，突然转变为崇拜西方文化的社会心态；对于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也突然由仇视而转为友善和赞赏。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公私机构对洋学和外语（特别是英文）人才的需求

剧增，教会学校也突然感到人满之患。一时之间，全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间兴起一股亲基督教的潮流。即使在西南边陲的四川，富人们也自动向当地教会（内地会）慷慨捐输，作为建立教堂之用。这种不请自捐的举动常令教士们不明所以。同时间，“受洗入教”的人数也急剧增长。

就内地会而言，至1895年，每年受洗入教的人数是700人，到了1905年就增加到每年2500人。因为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大，新建的大学和中学也日益增多，众多西教士都热心投入中国的教育工作，而那些以“拯救灵魂”为宗旨的教士人数也相对减少了。³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帝开始在中国人中间兴起合用的器皿，来为他担当中国教会第二期复兴工作的重任。他们的名字和出生年代如下。

女性方面有：

1. 陈玉玲，1886年生于浙江。
2. 焦维真，1888年(?)生于山东。
3. 蔡苏娟，1890年生于江苏。
4. 李渊如，1894年生于湖北。
5. 汪佩真，1899年生于浙江。
6. 侯秀英，1900年生于山东。

男性方面有：

1. 王载，1898年生于福建。
2. 王明道，1900年生于北京。
3. 宋尚节，1901年生于福建。
4. 倪柝声，1903年生于福建。



5. 李常受，1905 年生于山东。

6. 赵世光，1908 年生于上海。

在这个中西人物交替的期间，西教士中间仍然被上帝重用的人，男性方面有加拿大长老会的古约那单（或称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女性方面有女青年会的安汝慈（Ruth Paxon）和内地会的葛洁茜（Jessie Gregg）。

复兴三阶段

20 世纪的头 10 年中，中国教会复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⁴ 1901 ~ 1904 年是第一波，是复兴的初期；1905 ~ 1907 年是第二波，是复兴的壮大期；1908 ~ 1909 年是第三波，是复兴的高峰期。余慈度于 1903 年底从朝鲜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第一波的末期。以下简述这三个阶段中，上帝如何复兴中国的教会。

1. 复兴的初期（1901 ~ 1904）

义和团运动是在 1900 年夏天爆发的，在此之前，上帝已经在中国各地发动了许多小规模의 祈祷运动。1900 年春天，复兴首先在北京东郊通州的“潞河学院”（North China College）开始启动。那里的学生们受圣灵感动，认罪奉献，全校停课三周，学生们到四周乡村去传扬福音，影响到北京、保定和天津地区的公会。这些学生在同年的夏季动荡中，有 40 人被杀。同年春天，福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学生有 70 人悔改信主（占了全校人数一半以上）。

1903年，东北和华南各省也呈现出初步的复兴现象。

该年春天，在广州一地就有700人加入教会。同年，福建的信徒和西教士组成了“福建联合祷告会”，求上帝显明他的大能。1904年，上帝在云南边区借着内地会的传教士们，在少数民族中间燃起福音之火。有一个地方，一个美以美会的教堂，有4000人参加崇拜聚会。当环球布道家傅蓝森访问福州时，那里的大学生和该区各公会都得到相当大的复兴。1904年，圣灵在河南作工的古约拿单传教士心里动工。他听到威尔斯教会复兴的消息后，对自己果子贫乏的工作感到不安。他开始阅读19世纪美国奋兴家芬尼的著作，希望从芬尼的经历中发现复兴的“定律”和秘诀（同年1月，余慈度被上帝呼召，凭信心献身于全时间的布道工作）。

2. 复兴的壮大（1905~1907）

1906年，复兴的流扩展到华北、华中和华南。北方山东省的复兴情况最为显著。根据报导，青岛一地就有600位信徒聚集，迫切祷告，其复兴情况与五旬节相似。有一个地方，信徒们在清晨破晓前聚集祷告；另外一处的信徒的祷告聚会长达6小时之久，其中与会者自动放弃与对头的诉讼，彼此认罪和好。潍县“广文大学”（长老会办）的200个学生中，因参加奋兴会而悔改信主的达196人。在华中的扬州、上海等地都有复兴的报导。南京的各公会开始举行联合复兴布道会。大会的主领人不再是西教士，而是一个放弃高薪，凭信心全时间布道的中国人（名字不详）。余慈度的姐姐和姐夫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参加李叔青的奋兴会而得救



的（详情见《李叔青医生》）。

在这一两年之内，李叔青是上帝在中国教会复兴中最著名的器皿。他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到各地主领奋兴会。据卡尔博（Gustav Carlberg）所著《复兴中的中国》一书的记载，^⑤他也曾到华中武昌的文华学院（Boone College）向学生布道。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以后在中国基督教中颇负盛名的诚静怡，就是在那一次布道会中信主的。另外在抗战期间和赵君影共同创立“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Chinese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于力工牧师，他的母亲于三师娘也是在烟台因为参加李叔青的布道而复兴的。她见证说：“李的信息是以‘耶稣还要再来’为中心。他警告信徒们及早准备，迎接主来！”^⑥在这些重要器皿中，有的是因为读到了威尔斯大复兴中有关罗伯兹的故事受感而献身全时间事奉的。

3. 复兴的高峰（1908~1909）

1907年，朝鲜的大复兴爆发了。复兴的火向北燃烧，带进了中国1908年的“东北大复兴”（Manchurian Revival）。余慈度于1903年回到中国后，开始，她只是在上海一带监理会中间从事奋兴布道工作。到了1908年，她才清楚“蒙上帝呼召”，从监理会的范围中出来，投入上帝在全国的复兴中。那时复兴的洪流在中国已经进入顶峰。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余慈度回国后，一直到1908年“蒙上帝呼召”这一个期间，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接受上帝的对付，并经历灵命上的组织和装备，最终得以精兵的身份投入复兴高峰中。

第五部 信心生活的构成

第十二章 信心生活的开始

1903年9月，余慈度返回中国，但是她在4年以后，1908年初，才开始“蒙上帝呼召”到江浙以外的省份去工作，这使她变成全国性的奋兴布道家（那时复兴的洪流正在进入顶峰的第三阶段）。

在这头4年中（1904~1907），她一定在江浙一带主领过不少的奋兴布道会，但是在这方面，她在见证中提到的很少。相对的，她却用了百分之九十的篇幅去描述她属灵的经历，包括上帝在外面环境中给她的试炼和圣灵在她灵里给她的教导。

她虽然引用了诗篇第23篇第1节下半的诗句，“他领我在可安歇的众水之边。”（原文直译）来形容她属灵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想了解她在见证中所提供的全面经历，就必须把诗篇23篇中相互关联的诗句加进来，才能使她见证的内容和诗篇互相吻合。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1节）：正说明了她如何尝试着建立“因信而活”的职事，就是在生活上单



纯依靠上帝的供应。

“他领我到可安歇的众水之边”（2节）：正说明她如何操练与主保持亲密的交通，过一个联于基督的生活。

“他为自己的名引领我走义路，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我”（3-4节）：正是说明了她在环境中学习顺服上帝的引导和对付。^①

因信而活

本章我们先来看她如何学习“因信而活”的经历。

1. 凭信心带领家人归主

1903年9月，余慈度从朝鲜回到上海，稍作休息后，便离开上海到她姐姐家去暂住。在这段时间里，她发现虽然姐姐和姐夫（杨维翰）对她非常爱护，但是他们对属灵的事却漠不关心。她很想把他们带进“上帝的国”。有一天，她问姐姐是否可以在晚上有一段家庭敬拜的时间，她姐姐冷漠地回答说：“不行！我们没有时间！”她当时非常难过，她见证说：“我发现我唯一的姐姐虽然和我一同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她却这样远离上帝，甚至连在家中祷告的兴趣都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希望引起他们读经的兴趣，就建议每天早饭时，大家先背一节圣经才吃饭。他们同意了 this 提议，但是她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同意只是应付她罢了。有一天早饭就要开始，应当轮到她姐姐来读经节，但是她忘了准备，并且也不想回到房间去找经节，所以就胡

乱想了一句说：“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圣经上最短的一个经节！）从此以后，早餐背经的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之后她发现，原来在那段日子里，他们怀疑她的头脑有毛病。她的姐夫是一个很精明的医生，常常让她读一些新出版的书，意图使她的心思转移到别的方向去。她见证说：“上帝终于使我清楚看见，我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够多了，现在应当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上帝轻声地向我说：‘你应当用你的生活（感动他们），而不是用你的话语。’那个时候，上帝向我保证，他要照着他自己的时间来拯救他们，并赐福他们所属的教会。”

1904年的秋天，她姐姐、姐夫和他们两个最大的孩子都在一次奋兴会中蒙恩得救了（一定是李叔青医生主持的奋兴会）。她在见证中描述这一个奇妙的故事：

“那天我和姐姐一同坐着小船回家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她觉得以往这些年，自己一直是一个伪善的人。虽然她也去教堂聚会，也做了许多与教会有益的事，但是她的心都不在那些事工里面。她一边说话，一边感到懊悔，不自禁地哭了起来。那时候，我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我知道圣灵已经开始做工了。”

更奇妙的是，她姐姐和姐夫是在不同时间、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去参加奋兴会的。等到他们都接受主以后，才彼此把



自己得救的经过述说出来。数年以后，她的姐夫也接受了上帝的呼召，全时间献身于福音的工作。

2. 凭信心生活

余慈度回国后，最初打算要带着职业侍奉上帝。她想无论是行医，或开英文补习班，都是向人传讲福音的好机会。但是经过祷告以后，她感觉应当在她姐姐所住的城里另觅住处，使她得以建立一个完全凭信心生活的职事，正如当时西方新兴起的“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一样。（当时全时间事奉主的人，一般都是从差会接受固定的薪金，她在朝鲜作女传道人的薪水也是由监理会美国母会所供应的。）

一位西教士朋友很赞成她的计划，建议她把计划告诉她从前在苏州博习医院工作时所结识的一些富人和在政府做官的朋友们，请他们为她的计划认捐。果然，这些有钱的朋友们很快就认捐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有些甚至已经把钱寄给那个为她经管财物的姊妹。另外一个关心她的主内朋友，更劝她从本城的监理会每月领取一笔女传道人的薪水，以防万一。她开始不肯这样做，以后由于那位朋友极力催促，她只好答应了。但是她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她自己不需要的时候，这笔薪资必须用来雇用另外一位女传道人。这里我们看见她对完全凭信心生活的路，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

不久，她在同城的监理会教堂附近找到一所适合的房子，和那里驻堂牧师的家相距不远。她又祷告上帝赐给她两个佣人，一男一女，这一切“都蒙上帝垂听了。”

她的姐姐和姐夫原本都极赞同她的计划，并且还帮助她

找房子和办理签约的手续。不料就在她搬家的前几天，他们却忽然改变了态度。他们劝她最好暂时不要贸然开始这种“凭信心生活”的方式，以免遭遇到经济上的失败。她回答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现在不可能打退堂鼓，并且我也不相信上帝会让我从已经完成的计划中退下来。”半个钟头后，她接到一位与她很亲近的主内姊妹的来信，大意是说：“我亲爱的姊妹，希望你对你所要开始的工作重新考虑一下，你应当为这件事有更多的祷告，因为我听说现在的情形有了改变，认捐的款项被取消，就连已经收到的捐款，也必须退还给捐款人，因为在这件事上发生了一些误会。”

接着她又收到一封信，证明前一位姊妹信中所说的完全正确。她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祷告，向上帝说：“如果是我自己错了，我愿意停止这个工作。”（她知道就这样停下来，必将使她受到羞辱，因为她已经告诉朋友们说，她所做的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她说，在祷告中上帝给了她一句话：“我要使你达到最终所盼望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直译。）她得到主的话以后，就立刻去做搬家的准备工作。

当天早晨，在另外一个城市作牧师的朋友来访。他也是竭力劝她不要立刻搬家。她回答说：“我只是在这一切事上遵从天父的旨意而已。”那时她的姐姐在旁插嘴说：“先生，我看你还是别劝她了，只要我的妹妹决定做一件事，那就没有改变的余地，所以就请你来帮她搬家吧！”她见证说：“这位牧师好像就是被上帝差遣来帮我搬家的，因为他对搬家非常有经验。”



余慈度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认捐的人都打了退堂鼓，她只笼统地说，由于她自己个性太简单，对人了解过于迟钝，因此常常被最亲近的朋友所误解。但是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因此她就愿意顺服上帝，使她得以保持内心的喜乐。

1904年1月，余慈度搬进了新居。这是她凭信心全时间事奉主的开始。她描写头一天晚上的经历说：

“那一天，我和两个陌生的仆人搬进新居，半夜的时候，我突然从睡眠中醒来。那时我深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单和恐惧。但我隐约听到主甜美的声音在我耳旁向我说：‘有我在这里，你不需要惧怕！’这声音立刻使我刚强起来。当时大部分认捐的钱都已经退还，但是主向我保证说他会为我安排一切，虽然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如何来为我安排。”

她的姐姐和姐夫都非常为她着急。他们告诉朋友们说，总有一天她会卖掉她的所有，到那个时候他们准备寄钱去帮助她。他们觉得她的头脑出了毛病，因此非常可怜她，并且不断送给她一些日常所需要的东西。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放弃借医维持生活的想法。但是不久，她发现那并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然而心里却感觉非常平安。

两个月以后，她被邀请去带领一个监理会所主办的妇女

造就聚会（地点不详）。她收到邀请后，在上帝面前考虑是否应当接受，因为发邀请的人正是那些收回认捐的人。对于他们的做法，她心里一直无法释怀。有一次，她和姐夫谈到这件事时，眼里充满了泪水，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上帝立刻让她看见，她这样的可怜自己，实际上是在体贴肉体。她立刻向上帝悔改，甘愿“顺服上帝的引导”，接受了赴会的邀请。

她到达目的地以后，立刻就遇见当初写信告诉她捐款已被撤回的那一个姊妹。她一见面就问余慈度说：“上帝是不是已经给你钱了？”她说：“还没有。”那个姊妹说：“我想上帝很快就会给你的，因为我的丈夫今天早上跟我说，如果余小姐还没有收到任何捐款，我想我会给她我原来答应的那100元。”余慈度嘱咐那个姊妹，千万别再向她丈夫提这件事，只应当把它“放在主的面前”。两周以后，那位姊妹一清早就来见她，满面发光地告诉她说，她的丈夫决定要把那笔钱送来给她。她们满心感谢上帝听了她们的祷告。回家后，余慈度就靠着那笔钱维持生活，几乎达一年之久。她为此作见证说：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一年，上帝似乎永远面对面与我同在。他知道我的信心软弱幼稚，因此他以特殊的方式向我显现，常常在我不知道第二天的供应从哪里来的时候，上帝就应时地为我预备。有一个礼拜天，我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我发现家里没有足够



的食物可以摆在餐桌上，就在开饭前，上帝借着我姐夫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把我们所需要的食物送来应急。”

3. 凭信心讲道

1904年的夏初，亦就是她参加了第一次妇女聚会两个月以后，她又被邀请参加一个为期10天的特别聚会。根据事前的安排，特会中有一个专门为妇女举行的聚会，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而她只是该妇女聚会讲员之一。最初她有一点犹豫，不知道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后来她觉得既然这个聚会是由两位外国女传教士来主讲，而她自己只需负责一小部分的领会工作，所以她就答应了。

大会开始的前一天清早，有人传话给她说，那两位女传教士顶多只能来参加一两次聚会，这样几乎整个10天的妇女聚会的责任，就都必须由她来承担。她觉得这个担子实在太重，心里非常焦虑不安。

她见证说：“我从来没有承担过这样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向上帝祈求，差遣另外一个人来讲吧，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能力承担这个重任。从孩童时代开始，说话时常有咬舌头的毛病，因此连说话都说不清楚。每当我学习讲故事给别人听的时候，常常这错那错，使听的人一点都不觉得愉快。”

但是第二天大会就要开始时，上帝并未预备有其他人来代替她。那时她住的地方就在举行大会的教堂附近。她清早五点钟就起床迫切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给她应当释放的信

息。当教堂的钟声开始当当敲响的时候，她说：“我手里拿着《圣经》，战战兢兢地走向会场。那个时候，上帝一直向我说：‘时候到了，我必定会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但是我说：‘主啊！时候已经到了，钟也响了，人们现在都已经来聚会了，我还不知道讲什么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当我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遭到我预期的困难，并且聚会还大大蒙上帝祝福。”但是她承认自己仍然“缺乏信心”。在那10天的聚会期间，她竟然天天都重复第一天那种恐惧、战战兢兢的经历。

余慈度就是这样开始经历凭着信心生活，也凭着信心为上帝说话。

第十三章 信心能力的根源

前章我们叙述了余慈度如何经历诗篇 23 篇中因信而活的经历。在本章中，将继续深入了解，她如何学习绝对顺服上帝的旨意和她操练联于基督的生活。

顺服环境中的对付

上帝是借着她的两个佣人来使她学习顺服的功课。她说：“我的两个佣人总是和我唱反调，我要他们向东，他们就要向西，一点都不听话，常常令我生气。”她明白生气是出乎肉体的反应，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并且会削弱她属灵的生命，因此，她就把这些生活中琐碎的试炼带到上帝面前。在那里她顺服了“慈爱天父的引导”后，“不久就从这些试炼中得到了释放。”^①

顺服里面的教导

除了在环境中的对付以外，上帝也引导她在里面顺服圣



灵的教导，特别在对付罪的功课上。有一次，她正在主领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发现聚会中有一位是从前医学院的女同学。大约在12年前，她们之间曾发生过一次争吵。那个同学显然是因为她脾气好，便常常欺侮她，甚至连同学们都为她打抱不平；她们觉得她逆来顺受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同学不但常常欺侮她，还在别人面前夸耀她自己霸道的行为。最终她实在忍无可忍，就向那个人发了一顿脾气。这次她们在特会期间再一次见面，上帝就把她“发脾气”的罪显明给她看，并且催促她向那位女同学认罪。

经过一段挣扎后，她终于服从了上帝的教导，走到那个同学旁边，对付了她发脾气的罪。她说：“这个时候，上帝已经使我学会了顺服的功课。”

对余慈度来说，对付罪不只涉及对人的亏欠，也涉及不合乎上帝旨意的事物。信徒对后者通常是不容易察觉的。有一次，几乎有一周之久，她陷入了极端黑暗的感觉中。她经过一番自检，却找不出任何使她失去“与上帝甜蜜交通”的原因。她把心向上帝敞开，求上帝来鉴察她的内心。不久上帝就向她指出，在某一件事上（她没有说明是什么事）她没有顺服上帝，因此上帝就不能再带领她进入更深属灵的经历。显然在那件事上，她也学习了顺服的功课，因为她紧接着就引用了坎培·摩根（G. Campbell Morgan）的名言：

“只有一个人顺服了已经看见的真理以后，他才有资格去得到进一步（从上帝来）的异象。”

注重生命过于恩赐

对一个奋兴布道家来说，圣灵的恩赐是非常必要的。但上帝却要在她身上组成一个与普通布道家不同的属灵职事，使她重视上帝的生命过于重视上帝的恩赐，她说：“圣灵诸般恩赐是我们事奉上帝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恩赐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Life）和他爱（Love）的控制之下，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东西。许多人因为过于重视恩赐而使他们在事奉上帝的功用上受到破坏，正如一只触礁的船一样。”

活在上帝面前

余慈度以前一直认为，每一次在她为上帝说话以前，她需要先在上帝面前有一段长时间迫切的祷告才行。现在上帝让她看见，她这样做是不够的。要想在作工上得着上帝的能力，她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活在我君王的面前”，并经常让他来“洁净我的思想和话语”，这样“我在上帝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应当一致”。她显然受到慕安得烈名著《住在基督里》（*Abide in Christ*）一书的影响而见证她与主同住的经验。

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这是何等奇妙的真理！基督和我需要互换地位（正如保



罗所说)，我的地位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歌罗西书 3 章 3 节）。我们在地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 2 章 20 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腓立比书 1 章 21 节）。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主和一切的一切，这是何等自由的生活！何等得胜的生活！

不住地祷告

余慈度信心能力的来源和她不住祷告的操练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她的见证，她在祷告中经常祈求的重点是：

1. 求上帝“一直保守她活在属天的境界里。”
2. 求上帝“赐给她顺服的灵，像婴孩般遵从上帝的旨意。”
3. 求上帝“使她常常被上帝占有，常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4. 求上帝“用他的爱浸透她，好使她能够像上帝一样去爱人。”
5. 求上帝“使她以上帝的观点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儆醒等候主荣耀的‘再来’。”

我们发现，当余慈度接受上帝的信心训练达到上帝的标准时，上帝就使她承担更重大的责任。1908 年初，当复兴的洪流涌向顶峰时，上帝就把她推进中国教会的复兴之中。

第六部 复兴职事的转变

第十四章 复兴运动的高峰

在复兴运动的扩展期，关于复兴情况的记载非常缺乏；余慈度的见证中，对于与她自己有关的复兴情况提供的数据更是稀少。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参与复兴布道只局限于上海和苏杭一带监理会的范围，包括地方聚会和学校。

那时，李叔青医生是唯一在全国主领奋兴布道的人物。因为听他复兴布道而信主的人，包括以后在基督教中的重要领袖诚静怡，以及于力工的母亲于三师娘。余慈度的姐姐和姐夫也是在他的布道会上得到复兴的。可惜李叔青医生只活了34岁，在1908年8月病故。当时继承李叔青全国复兴职事的有两位，分别是北方的丁立美和南方的余慈度。这一年，正是全国复兴的流涌至高峰的时刻。当余慈度被上帝带进全国性的职事以前，她仍然需要再一次接受上帝彻底的对付，才能从上帝得到更大、更新鲜的属灵能力。



重拾起初的爱

余慈度记录说，1907年的夏日，当她与上帝交通的时候，上帝问她是否现在仍然爱他，像她当初刚出来为上帝工作的时候一样。上帝还问她：“你现在做这么多布道的工作，到底是因为爱我呢？还是因为你成为众所周知的‘工人’（布道家）呢？”经过半年之久，上帝一直追问她这一个问题，她也一直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的心，我当然很爱你。”但是上帝并未停止问她，一而再，再而三之后，她终于向上帝坦白承认，实际上她已经渐渐离开了她向上帝“起初的爱”（《启示录》2章4节）。

这一个属灵的经历发生在1907年的冬天。余慈度说，那时她问上帝，她应当做什么才能恢复她对上帝起初的爱心。她说，上帝指示她什么都不必做，应当撇下一切工作去专心祷告（那时有5个牧师和传道人也正在寻求同样的经历）。在祷告中，她在上帝面前彻底地对付了以后，她就又重新被圣灵充满。不久上帝就差遣她去主领一个奋兴会。她说，就感觉而言，她自己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任何新的能力，因为上帝是要带领她学习凭着信心为他工作。她描述上帝的灵在这次聚会中所彰显的“复兴大能”的工作：

“那使人深深自责的灵降在众人身上。他们都照着《圣经》的话向上帝认罪及与人和好。那一个教堂的牧

师，花了两天的时间，挨家挨户到信徒家中去向他们认罪。他懊悔自己以前并没有用‘生命之道’去喂养上帝的‘群羊’，他不但使他们忍饥挨饿，还要求他们来伺候他。与会的信徒们都大大地受到感动，为他们的罪悔改哭泣。但是哭泣之后，他们心里都充满了乐。”^①

在这次的复兴大会中，上帝也使余慈度看见：一个信徒不但要常常对付以往所犯的罪，并且更应当天天胜过罪的生活。

从1908年开始，余慈度开始到监理会以外的公会去布道。她在见证中没有提到她主领复兴会的任何情况。她只笼统说了一句：“纵然我在许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是上帝竟然用我微弱的见证，把祝福赐给他的子民。”

她在见证中提到，当她被邀主领布道会时，她对一些西教士属灵情况的低落感到失望。有一次，她被请到某地去领会，聚会前她就被通知说那天来聚会的人数不会太多，因为当天下午大家都要去参加两个传教士所举行的生日庆祝会。她见证说：“教堂里布置得花花绿绿，堆满了漂亮的礼物。虽然生日庆祝会是以崇拜聚会的方式举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称赞这两个传教士的一生是如何忠心地事奉上帝。”她觉得：“我们应当把荣耀尊贵归给上帝，而不是归给自己。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带到歪路上，同时也会使我们的生命被这些从上帝窃夺而来的荣耀尊贵，像重担一样地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使我们在奔走天路的途中无法向上，无法爬



高。”从这个例子，也许说明当时为什么教会复兴的责任开始转移到中国信徒的身上。

大复兴的模式

1908年，复兴的流已经从朝鲜到达中国的东北；又从东北流向华北和华南。到了1909年，复兴的流涌至高峰。各地复兴会中圣灵工作的情况一般都重复着“东北大复兴”的模式^②：

1. 参加奋兴会的信徒和慕道者非常踊跃，几乎使教堂无法容纳。

2. 圣灵强烈作工，使人为罪扎心，当场向上帝认罪悔改；并彼此认罪和好。

3. 奋兴会一般都举行10天左右，但有时因为复兴之火越烧越旺，可以一直延续数周之久。

对于带领奋兴会的情况，在余慈度自己的见证中有一段难得的记录，并且是发生在1909年春天。稍后，在4月间，在福建兴化县宋尚节的故乡，也爆发了空前的大复兴。

我们知道，余慈度对有关自己的好事一般都不愿意多说，因此我们也可以顺便把兴化大复兴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好使我们对圣灵复兴的流在1909年涌向高潮的情况，得到更深的了解。

有上帝同在的奋兴会

1909年春天，余慈度第一次接到从华南某地（大概是汕头）寄来的邀请函，请她去主领奋兴会。那时她马上就想到语言上的难处，因为她完全不懂得中国福建和广东两省的方言。当她把这个难处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向她说：“你所需要的不是语言的能力，你所需要的是圣灵的能力。”果然邀请她的教会早已为她安排了翻译，使她可以用英文讲道，而由当地的西教士替她翻译成本地方言！

每当她扩大职事的范围时，她都必须先接受上帝更深的对付。就在动身的前几天，她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她想起了多年前做医学生时所犯的一个罪。在她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她曾经“打小抄”欺骗了某一位教授。她见证说：“我自然知道上帝对我的要求是什么。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就对付了这个罪（有可能是向教授写信道歉来对付这个作弊的罪）。”

当她到了目的地以后，简直像到了外国，对当地信徒所说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但是上帝与她同在。虽然通过翻译，她的话语仍大有能力。她见证说，当时圣灵赐福她的聚会，与圣灵在朝鲜和东北等地复兴中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也是她第一次描述圣灵在她带领的奋兴会时工作的外在表现。她说：



“上帝的确使他强大的能力临到与会的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那使人为罪自责的圣灵就临到会众身上。这真是一个使人得到彻底洁净的时刻。有些亲爱的信徒，他们心里昼夜不得安息，长达数日之久。他们照着圣灵的引领，或私下在上帝面前，或在聚会中公开认罪和赔偿，真是一种又荣神又令人感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牧师、传道人，以及普通信徒，都一个接一个地从座位上站起。他们穿过会堂里拥挤的人群，去寻找和他们出过问题的人。彼此存着真诚悔改和深切谦卑的心紧握对方的手，他们哭得泪流满面，互相认罪并寻求对方的赦免。其中有3个女人，抱着她们怀中的婴儿，徒步行走了15公里，为要赶来聚会。上帝大大地祝福了她们，把他独生子的生命赐给她们。”

这次的奋兴会后不久，余慈度在同年5月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诗集——《奋兴布道诗歌选集》(*Hymn of Reviving*)。当时著名的“教务杂志”对她的诗歌集用显著位置予以推荐。这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中一个空前的出版物。从她在诗歌集的序言和杂志编辑的按语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圣灵的复兴运动到了1909年，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已到达巅峰。她相信这本诗歌是为着迎接“全中国更广泛的复兴即将来临的日子”。^③

兴化教会大复兴

其实，在她奋兴诗集出版的前一个月，福建的兴化已经发动了影响深远的复兴了。1907年7月，兴化大复兴开始，那时候兴化监理会的传道人首先听到朝鲜大复兴的消息，他们就开始向上帝迫切祷告，求上帝复兴兴化的教会。当时一个青年传道人首先蒙上帝光照，使他看见他在传道人甄审考试时作弊的罪，和他对同工们心怀怨恨的罪，他在祷告会中当众谦卑认罪后，圣灵就开始动工。这一位青年的传道人为着兴化的复兴，经常禁食祷告，终于带进了复兴的流。

根据宋尚节的见证（那时他才9岁），这一位青年的中国传道人“被灵感动，大有能力”。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听他讲道。有一次，在他主领的奋兴会上，受圣灵感动而悔改的儿童们有300~400人之众，他们把偷来的皮球自动归还学校，竟有500多个。另外他们也交出从学校偷来的纸笔墨砚，不计其数。一个商人信徒被圣灵光照，使他对付了一个严重的罪，他把政府颁发禁令以前所购存的大量吗啡交给传道人销毁，价值美金1800元（相当现在数十万美元之巨）。

1908年5月，复兴到达高潮。那时在各地会堂和学校里有无数的祷告小组建立起来，他们禁食祈祷，求上帝把圣灵浇灌下来。^④来参加奋兴会的人逐日增长，使得会堂无法容纳，他们不得不在空地上支搭起一个可容纳4800人的帐篷。主日参加聚会的人数更高达6000~7000人。他们必须分四



处同时举行聚会。许多未信主的人第一次参加聚会就得救了。不少来自厦门、福州和华南各地区，甚至来自美国的信徒都来到兴化，一同有份于复兴的祝福。

虽然这位中国传道人，当时算不上是鼎鼎有名的复兴家（像余慈度一样），但是上帝借着他所发动的复兴之火，在兴化地区一直燃烧下去，长达数年之久。直到宋尚节 12 岁的时候（1913 年），他父亲所主持的监理会教堂仍然需要在主日分 3 次聚会，平均每次 500 ~ 600 人。他见证说：“这一切都完全是借着祷告使教会得到‘圣灵——五旬节的圣灵——的充满’所产生的结果。”^⑤

兴化复兴的详细记录，应当可以帮助我们推想到，余慈度这个举国闻名的布道家在华中和华南所主领的奋兴会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中国各地所启动的复兴工作，在那些日子里都是大同小异的。

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兴化的青年传道人和余慈度都是被一个圣灵所感去做上帝复兴教会的出口。从这一个观点来看，他实在是余慈度在上帝复兴运动中的属灵同伴。不过余慈度的属灵同伴中，还有几个是影响到全国复兴的重要人物。

第十五章 复兴运动中的同伴

余慈度从南方布道返回上海以后，全国各地邀请纷纷而至，使她难以应付，因此从1910年开始，她就决定把精力和时间集中在扩大查经祈祷处的事上。同时上帝也在中国兴起了一批新的生力军来分担教会复兴的工作。从1910年开始，余慈度和这些人的工作方式逐渐由“个人”转变成“协和”的关系。这种“协和”的工作方式无论在全国或地方上都有具体的表现。

1910年12月，“第一届全国布道协会”（First National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在华中的汉口召开，大会中包括一个由余慈度主持的会议，特别讨论如何推动妇女的福音工作。此外还有丁立美主讲的“学生（立志）献身布道会”（Student Volunteer Society）的工作，另外一个题目专门讨论“朝鲜、中国东北和中国内地各省的复兴运动和它们对教会所提供的属灵功课”。

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政权被推翻，共和政体得以建立。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明订“人民享有宗教的自



由”。上自中央的总统，下至地方的士绅，对基督教的态度都非常友善。在中国一半以上的西教士，和众多中国教会中的领袖人物，都投身于中国现代的教育工作；那些坚持以拯救灵魂为主旨者，仍然继续献身于福音布道工作。余慈度自己就属于后者。与她同道的主要人物，包括男青年会的丁立美，女青年会的安汝慈（Ruth Paxon）和内地会的葛洁茜（Jessie Gregg）。

内地会教士——葛洁茜^①

葛洁茜生于1871年，比余慈度大两岁，她的工作范围一直都限于北方河北省获鹿县一带（获鹿县为内地会在华北的总站）。但从1911年开始，她布道的范围渐渐扩大到全国15个省份。1900年，她经历义和团运动，几乎被杀。她福音的对象是以乡镇妇女为主。有15年之久，她到中国15个省份布道，旅程长达两万英里之遥，足足绕地球一圈有余。虽然她结果累累，但是她的果子多半是乡村妇女，所以很少有具备领袖恩赐的人。相对的，余慈度和安汝慈等专门在大学生和沿海城市的上流社会中做工，因此下一代中国教会的领袖，大部分是由这一个社会阶层中产生的。

青年会教士——丁立美

丁立美是在1908年复兴的高潮中在中国北方被上帝兴

起的属灵领袖。上帝在北方的大学生中间的复兴工作，是借着丁立美从山东潍县的广文大学开始的。根据美国教士鲁斯（Henry W. Luce，《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 Henry R. Luce 的父亲）在 1909《教务杂志》的报道：

“本年（3月底）我们广文大学毕业的丁立美得以奉献全时间在山东展开福音工作。他是一个大有属灵能力的青年。他在潍县地区各教堂布道达两个月之久，结果有数百人记名学道。也有许多信徒无条件地把他们的孩子奉献事主。”^②

从 1910 年起，丁立美的属灵职事从中国的北方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重要省份。每逢他主持奋兴会的时候，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他的讲道对于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影响力，但是他不凭着个人的智慧和委婉的话语，去说服听众；而是借着祷告而来的能力。他也特别注重个人代祷工作，在他的代祷簿上，总有上千个人名，他经常按名为他们代祷。他所发动的“学生立志献身布道运动”特别注重个人的代祷工作。1916 年，他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布道团连环祈祷单》（*Cycle of Prayer For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The Ministry*）帮助学生信徒实际操练代祷的功课。他非常注重祷告，所以虽然他并不是一个能说善道的人，但是他所主领的复兴会，却常常能够产生极大的福音果效。

1910 年初，丁立美被邀到山东的沂州府领会 10 天，结



果有 1400 人“记名”，他们都愿意参加大会后的读经聚会（重在认识基督的救恩）。其中不但包括学生，还包括苦力、商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吏等各社会阶层的人士。

同年 6 月，男青年会在河北省的通县，召开了一次“华北（基督徒）学生大会”，除了本地学生以外，还有从湖北、安徽和江苏来的代表参加。“中国学生立志献身布道团”就是在这次大会中成立的。他们的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中福音化祖国和全世界。”丁立美被推为这个组织的全国巡回布道执行秘书。他到各地教会办的大学和中学去领会，培养各地新组成的“布道团”（在 1915 和 1916 年的《中华布道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中，都有学生参加“志愿布道团”的记载）。“中华女青年会”虽然也有类似的福音活动，但远不如前者所做的那样有声有色。^③

丁立美的布道工作并不只限于学生中间，他传讲的信息对一般群众也具有超凡的能力。例如 1918 年 1 月，他在湖南湘潭的布道会吸引了 2000 名听众。聚会分早晨、下午、晚上三次。来听道者必须凭入场券进场，结果有 1000 人记名，其中包括曾国藩的外孙聂继昆（他父亲聂缉规在清朝曾任湖北和浙江巡抚）。

在中国上流社会中，因丁立美布道而接受福音，并投身于基督教文宣事业者，有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家简又文（从事中华青年会工作），妇女教育家曾宝荪女士（为曾国藩的孙女），以及致力于中国本位神学建立的谢扶雅教授。^④中国国内布道团成立以后，丁立美曾经深入中国云南边疆地区传

道。1922年后，他因年岁渐长，就回到北方，先后任教于华北神学院（山东滕县）和天津神学院，他于1936年去世。



丁立美

丁立美所结的果子中多半献身于文化教育工作，因此对以后教会复兴的工作影响不大。那些第二代承担教会复兴任务者多半是“属灵派”的布道家们（如安汝慈等）所结的果子。

女青年教士——安汝慈^⑤

安汝慈（Ruth Paxon）是天津女青年会的传教士，她的



属灵生命很深。1910 年左右，她开始在中国的教会复兴中，逐渐承担起重要的角色。最初她与余慈度因为工作领域南北不同，双方只有在参加大会时得以接触。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初期，安汝慈从天津迁到上海后，她们建立起更密切的同工关系。

安汝慈在中国女青年会团体中的复兴工作，最早由北方的天津开始，以后扩张到全国，正如丁立美在男青年会所扮的角色一样。他们两人都非常注重祷告，特别是为福音的代祷工作。她在 1914 年《教务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题目是《代祷和福音》，在这篇文章中她着重论述代祷的作用。她说：代祷是地上的能力支配天上的能力，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的路。

1915 年，她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振兴代祷》。在此文中她把代祷的需要和实行，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首先她强调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和西教士都应当有份于代祷的工作。她建议把代祷分三方面去实行：

1. 在信徒个人生活中。
2. 在各差会教会中。
3. 在全中国的教会中。

关于在个人生活中的代祷，她建议每个人都应当：

1. 建立持守晨更的生活。
2. 保持为之代祷者的名单。
3. 养成每天写祷告日记的习惯。
4. 查读圣经中有关代祷的例子和真理。

关于代祷的操练和实行，她说：“学习祷告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要祷告。”她建议西教士应当善用每周的祷告聚会，学习随从圣灵而代祷；并应在各处举办短期祷告训练班，并采用慕安得烈的名著《在祈祷学校里与基督同在》（*With Christ In the School of Prayer*）做主要之教材。^⑥

对于全国的教会，她强调：信徒们不但要为自己的朋友祷告，更应当和他们个人或数人一同祷告；当信徒们认识到代祷的重要、能力和地位时，他们在邻舍中间就自然形成一个个的祷告小组。这些小组就变成教会的血轮；各教会每月都应规定一天作代祷的工作。^⑦

安汝慈还建议大家应更进一步地去阅读慕安得烈两本名著：《代祷的职事》（*The Ministry of Intercession*）和《祷告的生活》（*The Prayer Life*）。此外，还有叨雷（R. A. Torrey）的《如何祷告》（*How to Pray?*），以及皮尔逊（Arthur T. Pierson）的《乔治·慕勒传》（*George Muller of Bristol*，这是关于慕勒学习祷告的书）。

1919年开始，安汝慈和余慈度都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华国内布道团”，她们工作的关系益趋密切。1924年，她们又都成为“全球祷告复兴运动”（World - Wide Prayer Revival Movement）的主要成员。

以上是20世纪早期，和余慈度共同担负教会复兴的同伴。现在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余慈度在同一时期中属灵职事的转向。

第十六章 复兴培训的建立

余慈度把1908年当做她“蒙上帝呼召”的新阶段。从那一年开始，她的布道活动首次从上海一带的监理会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公会；接着从1909年开始，又从长江下游扩大到华南沿海的重要城市。这个时候，她深深地感觉，为了照顾那些初信者和得到复兴的信徒，就需要在教会中及时培养出更多称职的教牧人员。

当时的女性传道人（男性也一样）非常缺少圣经真理的认识和属灵生命的经历。因此，从1908年开始，她就和几位同工同心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祈求上帝赐给她们一个合适的场所。她们的祷告很快得到答应，一个来中国度假的美国信徒奉献了一笔巨款，使她们得以在同年9月间租妥一幢房子。这就是“查经祈祷处”的开始。

注重祷告的学校

查经祈祷处每周举办中、英、韩三种语言的查经班，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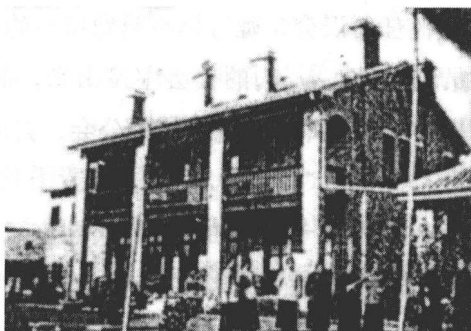
且每天都有祷告会。随着参加人数的增长，现有的场所不敷使用，迫使她们在两年内搬家数次。她见证说：“上帝从上海各公会送人来参加查经，我以极大的喜乐向上帝这些饥饿的孩子们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许多人因着上帝话语的能力，在生命上得到变化和更新。”^①

自从查经祈祷处成立以后，余慈度在信心生活上学习了更深的功课。她说她不但要为自己的生活仰望上帝，也必须为查经处的费用仰望上帝。

她记得有一次，她被邀到外地去主领奋兴会，当时她口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经过向上帝祈祷以后，就在她出发的前两天，一位西教士姊妹忽然来访。她说，上帝指示她把15块银元交给她，这笔钱本来是她预备用来为自己买一张新床的。上帝用这笔款项正好补足她旅行所需要的钱数。还有一次，她需买一件新衣裳，她就为这个需要向上帝祷告。刚刚祷告完，她就收到邮局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正是她所需要的东西，在包裹外面写着一句经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节）她见证说：“这是我第一次理解到这节圣经的美丽。我们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这些暂时的需要是他额外加给我们的，我们是多么容易就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呢！”为着查经处的大小需要，她都借着祷告仰望上帝的供应。即使为了探望和工作所需的一辆人力车，也是借着祷告向上帝祈求得来的。在这一切的经历中，她引用主的话来见证上帝的信实；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没有鞋，那时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路加福音》22章35节）

查经祈祷处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圣经学校（Bible School）。它和普通圣经学校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把“查经”建立在“祷告”的基础上。查经祈祷处在上海的运作很受场所的限制。因为是租来的房子，当学员人数不断增加时，校址就不得不屡次迁移。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宿舍，无法使学生把学习和生活联结起来。为此余慈度和她的同工们就求上帝赐给她们一个永久的校舍。



江湾查经祈祷处

经过迫切祷告，上帝就感动多人踊跃捐献。大部分的捐款都是从中国信徒来的。1916年2月15日，“江湾查经祈祷处”正式建成。同年3月3日，“江湾圣经学校”正式开学。课程分三年制和二年制两班。共收住校学生12名。课程内容注重读“上帝的话语”和属灵生命的追求；并且着重将课堂所学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膳宿费每月大洋4元，学费全



免。余慈度在《教务杂志》上声明圣经学校的宗旨：^②

1. 帮助渴慕上帝话语的女传道人，使她们不但能够获得圣经的知识，并且能使她们被上帝占有，而成为基督大能的见证人。

2. 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圣经》将是学校所采用的唯一课本。

3. 欢迎任何蒙上帝呼召，而想要把自己献身事奉主的人来受训，特别是那些已经为主做工，而有心对上帝的话获得更深认识的人。

4. 为了避免任何误会，她特别声明她招生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学员们从她们的公会中拉出来，而是帮助她们能回到原来自己得救并接受过栽培的公会，去成为更称职的工人。”

余慈度的见证——《上帝如何对付余慈度》，就是在江湾校舍建成时，因同工们的敦请而写的。

兴建与扩建

1919年，鉴于查经祈祷处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余慈度决定在原来的场地上另建一个正式的圣经学校。1920年，新校舍建成后更扩大招生（可能也开始接受男生入学，因为倪柝声就是那一年到这里就读过一段时期）。因为到查经祈祷处来参加聚会的人数剧增，主日聚会时拥挤不堪。从1922年底，她又开始兴建一个专为崇拜聚会用的“伯利恒会堂”

(Bethlehem Church)。在余慈度亲自督工下，扩建工程得以在4个月之内完成，并于次年（1923年）复活节举行了庄严的献堂典礼，由著名奋兴布道家古约拿单亲临致辞。^③

至此，江湾校舍的扩建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在扩建过程中，余慈度的健康严重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她劳累过度（远在1911年冬，她就因为过劳而病倒。她必须停止一切事工，到烟台内地会的安歇楼去休养达两个半月之久）。

她除了在江湾沉重的培训工作外，还要应付各地主领奋兴会的邀请，以及每年夏冬两季向全国开放的查经训练大会（类似现在的“夏令营”和“冬令营”）。我们现在需要回头来研讨一下她在这两方面尽职的经历。

奋兴会布道活动

关于余慈度在1910年代复兴布道活动的记述，我们所能发现的非常稀少。因为她自己极力避免为她的工作宣传，而教会刊物，如最有影响力的《教务杂志》，对她的布道活动都只有非常简短的报道。

根据1911年的《中国布道年鉴》，我们知道她曾于该年11月到苏州乡下主持奋兴布道大会，是由监理会和浸礼会联合举行的。参加奋兴会者多半是公会教友。他们都“在生命里接受了新的亮光”，而且“上帝荣耀的光辉从他们的脸上照耀出来。”即使那两个公会的牧师，也“坐在这位被圣灵充满的女人脚前欣然受教”。^④



根据《教务杂志》的报道，余慈度于1912年3月曾受邀主领宁波6个公会联合举行的奋兴布道会。大会在该城可以容纳千人的礼拜堂举行，结果非常成功。1913年2月，她再一次到宁波主领联合布道。这次的对象是城内那些“闭门不出的”（shut-in）上流社会妇女。信徒们挨家挨户去发请帖，这在中国是一种创新的传福音方式。

1920年春，余慈度被邀到福州开奋兴会。那时圣灵强烈做工，奋兴会越开越旺，一直延续了两个月之久。在这次奋兴会中，倪柝声的母亲——倪林和平得着“厉害”的复兴，因而导致倪柝声的“厉害”得救和奉献（详细经过见下章）。但是在《教务杂志》上，关于这次奋兴会的报道却只有如下寥寥数语：“福州（的教会）被余慈度小姐的工作激动起来了。她是应那里中国信徒的邀请去开布道会的。她的讲道对那里的妇女们特别有效。”^⑤

根据这些例子来看，我们可以推想她在20世纪早期，必然主领过不少类似的奋兴会，类似福州的情况一定在许多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但是留下来的记录却很少。然而，对于她主办全国性的夏冬查经特会的情况，倒是有一些较详细的报道。

暑期查经班

1909年，余慈度从南方回到上海以后，那里的西教士和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一致要求她举办“暑期查经班”（Summer

Bible School)。她和同工们经过祷告后，就为这个暑期计划寻找合适的场地。上海美国南浸信会的牧师主动把他们位于北四川路的教堂和女子学校免费借给她用。

1910年，第一次“暑期查经班”开始。以后每年都固定在这一个场地举行。在前四次暑期班中，每次约有60人参加。与会者来自全国不同省份，包括传道人的妻子、女传道人和教会学校的教师，她们对上帝的话语非常渴慕。8月，许多人不畏炎热，从千百里以外的地方前来赴会。关于费用方面，只有少数几个人接受了西教士的帮助，其他都是自费参加的。余慈度说：“她们有些人在经济上实在有困难，我们就仰望上帝来帮助她们。我们盼望任何饥渴的人都不会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不能前来得得到喂养。我们感谢慈爱的天父，因为他每次都供应了我们的需要。”

有关暑期班操作的细节和查经的内容，我们可以从1915年的例子中得到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该年的训练是从7月19日开始，为期两周。与会人数是63人，包括女传道人、教师和学生。他们有的是单独来的，有的是成组来的。学员们在训练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七时到会场报到，然后大家聚集一起，由余慈度简单致词欢迎，会员们“个个满面发光，他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公会，却都在上帝的爱里融合为一了”。

会员来自全国7省的20个大小城市，她们代表了10个不同的公会，包括：南、北长老会（美国），循道会（英国），联合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英国），内地会（英



国)，宣道会（美国），南、北浸礼会（美国），国外基督徒公会（英国）。

费用的来源由西教士全额补助的有 19 人，部分补助的有 9 人。其余全部是自费来参加的。每人每天付饭费 0.15 元，住宿免费。每日生活和训练课程由余慈度和她的同工一起担任。

早上 6:45 至 7:45 是早餐和饭后集体祷告，接着在 8:30 至 9:10，由南京协和女子圣经学校（Nanking Union Women's Bible School）李小姐（A. Y. Lee）主讲《以弗所书》（礼拜天除外）。第二堂课是 9:45 至 10:45，由松江监理会圣经学校（Sunkiang Methodist Episcopal Bible School）杨维翰医生主讲《希伯来书》（杨医生是余慈度博习医学院校友和亲密同工）。中午用餐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在下午课程开始之前，有一段共同祷告的时间（16:00 - 16:30），接着从 16:30 直到晚间 18:00 的一个半小时，是由余慈度传讲一系列《主的再来》（*Lord's Second Coming*）的信息。她把上帝的话中有关主再来的真理用浅显的话讲给学员们听。结束后，大伙便一同用晚餐，餐后大家坐在草坪上有非正式的聚会。

受训的学员们见证说，她们在训练期间深深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并且确实得到了灵性上的复兴和赐福。特别对余慈度所讲关于《主的再来》的信息，许多人都说“主真的就要再来吗？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为了迎接主来，我们多么应当注意自己的为人啊！”^⑥

因为她的夏季查经特别注重“预言”，因此以后就定名

为“暑期预言查经特会”（Summer Prophetic Conference）。除了1918到1922的4年期间因为余慈度健康不佳暂停外，查经特会都定期举行，为期10天，与会的人数有时高达200人之众。

余慈度的培训职事，诚然为教会造就了不少男女传道人才。但是所有承当第二期复兴重任的人物，都不是从她的圣经学校或预言查经班产生的，而都是她奋兴会上所结的硕果。

第七部 复兴布道的果子

第十七章 江南的大家闺秀 ——汪佩真

汪佩真是安徽省休宁县人，生于1899年4月。她得救的时间应当是1918年（民国七年）。^①那时她父亲在浙江台州（临海）作县长。她的祖父汪鸿庭在清朝时官至一品，作过提督、钦差大臣，也曾作过湖北汉阳兵工厂督办，并被派往欧洲各国充任



汪佩真

公使。她父亲汪楚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教。民国建立后，被派到日本，任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那时汪佩真生母已经过世，父亲与日籍女子平泽美代子结婚。汪佩真就是被日本继母养大的。继母对她视如己出，除在家督促学业外，还教她各种编织、刺绣，以及烹饪等，使她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家闺秀。因为她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祖父盼孙心切，就给她起了一个类似男孩的名字叫



“亦菴”（意表“也是孙子”之意），“佩真”是她蒙恩以后所取的新名字。



汪佩真的日本继母——平泽美代子

蒙恩与奉献

根据汪佩真 1919 年刊登在《灵光报》上的见证，她从小并不喜欢念书，对福音也毫无兴趣。但是在一次偶然的会里，她和一位美国传教士相识。这个传教士就是杭州美国

浸信差会的甘惠泉师母 (Mrs. Sweet)。甘师母看她聪明伶俐，就鼓励她入该差会在杭州建立的弘道女校 (Mary Vaughan Girls' School) 读高中。她询问母亲的意见，母亲对她说：“读书是可以的，但千万不可轻信耶稣教。”她很痛快地答应说，她绝对不会信教！她还暗笑母亲何必为此顾虑。她进入弘道以后一心追求学问，对福音一点都不感兴趣。

中国那个时期，除了余慈度以外，另外还有一位被上帝大用的女医生，名叫石美玉（英文是 Mary Stone。她只有一段时间全时间传道，一生全心献身于伯特利医院的工作，是用医疗服务达到福音的目的）。汪佩真是在学校里听石美玉讲道得救的。她见证说：“有一天，石美玉医



石美玉医生

生来到弘道主领礼拜。她所讲的话句句打入我的心坎，深觉非承认教主，就不能除罪。”她害怕父母反对，所以虽然信了，却不敢立刻受浸。恰巧那时她的父亲被调到台州做县长，母亲也一同去了。所以她就瞒着父母受浸加入甘师母的浸信会。等她放假回家时，她还是不敢向父母承认自己已经信主。直到有一天（多半是清明节日），当全家祭祖的时候，她这个信徒的身份才完全暴露出来。她母亲看见她不肯向祖先的灵牌跪拜，就质问她：“你一定是信教了！是不是？”那时她只好承认说：“是的。”她的母亲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从此就常常责备她。以后也告诉她的父亲。父亲也非常生



气，就不许她再返回弘道，从此她就辍学住在家中。

她在家里待了一年半之久，用种种办法来感化父母，却毫无功效。她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大约是1918年左右，她参加了一次余慈度的奋兴会，心里很受感动，她就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奉献给主，并且迫切寻求主的同在。从此以后，她的心中常常充满喜乐和平安，但是逼迫和为难也跟着接踵而来。

婚姻问题是她遭遇的第一个难关。1918年，汪佩真19岁，她的父母决定为她成婚。她在幼年时曾经奉父母之命和杭州的一位青年徐祉仁订婚。徐君品貌和学业兼优，上海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又留学德国，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工程师。据说当时国内所制造的火车头都是他负责监制的。为了准备婚礼，她母亲怕她固守教义，不肯履行传统婚礼仪式，^②极力催促她离开教会。但是她觉得主呼召她，对她说：“你当以祈祷传道为你毕生的事工。当效法亚伯拉罕，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她听见这个声音时就非常害怕。她想，如果“听从主，就是违背父母；若听从父母，就是辜负主恩。”因此天天心中交战。但主对她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最后，她决心对父母讲明她不要结婚了。那时男方已经准备迎娶，她的嫁妆首饰也已全备。她流泪痛哭，坚决反对结婚，并且一心想要念神学院。她向母亲说：“我要到神学院，预备为主做工。”母亲不肯答应。此时她父亲任嘉兴县长，她亦住在县长公馆。那时她听见主对她说：“保罗蒙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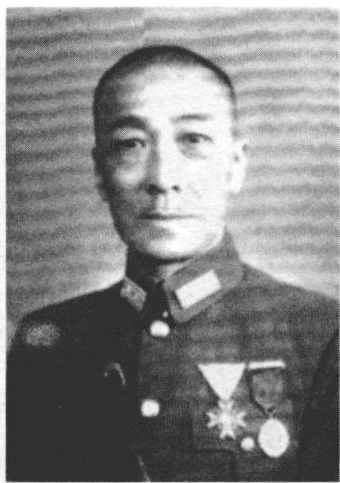


汪佩真堂妹替她和未婚夫结婚

时，并没同属血气的商量，他也没有违背天上的异象”（《加拉太书》1章16节，《使徒行传》26章19节）。

接受神学训练

可是即使她想不告而别，她又怎么能够离开大门呢？何况她也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但里面好像有声音说：“一切事



汪佩真父亲

都有我的安排，你只要听命，我必引导你。”有一天夜间，趁人不备之时，她潜行到围墙边，先脱下长裙丢到墙外，然后越过围墙出走了。当时她亦不知道该到哪间神学院去，所以就先从嘉兴坐火车到杭州（约75公里），目的是请求杭州的“一位西教士”（显然就是甘师母）送她进神学院。父母也猜想到她到那里去了，就派人至杭州找她。来人告诉她说，她的父母因她的出走几乎发狂了，她只好跟着来人回去。她的父母见了她之后非常难过，以为她真的疯了。她又仔细地向父母述说她蒙天父呼召的事，但父母坚决不许她去念神学。这时她来到主面前，两天之久禁食祷告，求上帝感动父母的心。她父母以为她要绝食自杀，最后只好叹息说：“你去就去吧！不然你必要死了。”她就是这样到南京进了金陵女子神学院。

至于她的婚姻问题，她的父亲最初“以为她的行为有损汪家颜面”，非常气愤，声言一旦见她回来，定要将她置于死地。可是他气消以后，还得想法解决这个难题。她的父亲只好和男方商议，同意由她一个堂妹汪亚兰（三叔之女）来顶替她和徐君结婚，并且赠送全部的嫁妆。“这大概是1919年5月左右的事了。她多半是在夏秋期间到南京入了”金陵女子神学院（学期二年）。同年11月20日，她第一次参加了李渊如姊妹们的聚会，并且向她们述说她得救和蒙上帝呼召来读神学的事。李渊如把她的见证记录下来，刊登在1919年她所主编的《灵光报》上。

汪佩真离家以后，因她继母从中劝解，她父亲渐渐气消了，许可她在假期中回家探亲。大约在1921年左右，她父亲又调回杭州任县长，暑期中恰逢王载到杭州讲道，她请王载到她家传福音，家中第一位受感而信主的就是她的庶祖母，不久她的继母也接受了主，接着她的4个弟弟、2个妹妹和弟媳亦相继信主。

1921年，她从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时年仅22岁。她容貌秀丽，气质高雅，讲道大有能力。不久她就成为风靡大江南北，全国闻名的女布道家。

她起初工作的范围多限于长江下游。1925年，她与余慈度共同主持夏季查经培灵会。张光荣（倪柝声的第一位同工）和他的师母，就曾经参加这次的查经会。

1925年4月，她首次被请到北方的烟台去布道，她在浸信会的大会堂中向千余人传道，轰动全城。那时听众中有不



少是基督教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只是因为好奇来看热闹，曲郇民就是其中一位。还有一位身材短小，20岁左右的青年，在那一次布道会中得到灵性上的复兴。他当天立即把自己终身奉献事主。

第十八章 热衷革命的女强人 ——林和平

1880年，林和平出生。1894年，她父母送她到上海的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①去学习英文，目的是准备到美国去学医。从她前半生的事迹来看，她显然是一个个性坚强、胸怀大志的女人。如果她的留学美梦得以成真，她就要立志成为一个终身不嫁、献身革命的女强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和余慈度在上海分别后不到一年，上帝就借着她那爱女心切的母亲把她的留学美梦给戳破了。她的母亲生怕她留美时间太长，可能使她一生不能再见到爱女。正好这时在福州一位“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牧师倪玉成急着为他的儿子倪文修物色对象。他虽然为儿子和许多人家的女儿谈论婚嫁，却一个都没有成功。

这次当倪家托人向林家小姐求婚，正中林母心意，她就欣然答应了。她立刻写信通知在上海的林和平束装归里，与倪文修结婚。林和平接信后，正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一切雄心都归乌有。她只有服从母命回家，因为那时的女子胆



小，婚姻全凭父母做主。^②她回家后，心情真是“冷得无比”，因为她根本就不想结婚，她见证说：“我觉得无用的女子才去出嫁。别人能独立，做教师、做医生、做大人物。我呢，罢了，去出嫁！真是垂头丧气。”但是她这一个不愿出嫁的女子终于出嫁了。

有名无实的教友

林和平婚后，除了短短数年 and 丈夫住在外面（丈夫先后在汕头和苏州海关任职），一直住在福州的公婆家里。她的婆婆和小姑们一直对她不好，所以她“大半住在娘家”。即使回到婆家与丈夫同住，也是过着吞声忍气的日子。也许就是因为家庭关系的恶劣，她就尽力在外面从事政治活动，以求满足自己的雄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她在福州热心参与革命爱国活动。她见证说：

“那时烈火炎炎，（我却）不顾生命，到处演说。自己先把首饰、金手环奉献国家，以身作则，自然也有许多男女跟随。闽政府以我成绩可嘉，爱国可风，孙道仁都督特为请奖于北京政府。结果蒙允给我二等勋章。此时我又通函各界妇女，组织妇女爱国会，孙道仁都督夫人为会长，潘寿松夫人为副会长，我自己被举为总干事。此时我多与不信主的人接触，自然而然地从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落到一个无信仰的地步中，爱名誉、地位、

势力、美服等。实在说起来简直是个浪子，已到了吃豆莢的光景，却还在那里自高自大，目中无人。”^③

当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到福建访问时，林和平被省政府任命为“特别女招待员”。那时来访人员中也包括孙中山先生的女秘书宋庆龄女士，她们都是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的校友（庆龄是学妹，生于1892年1月27日）。^④“相见之下，自有一点特别感情”，林和平一直陪伴着他们“全市环游，并赴各机关宴会。”除了这些特殊情况外，她终日若非“颠倒在竹林（麻将桌）及电影院中”，就是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结果呢？“礼拜也不作了，祈祷也早已丢到背后。”

1920年2月中旬，林和平忽然听到消息说，余慈度被邀到福州开复兴布道会。虽然相隔22载，她在1897年和余慈度在上海相逢的一幕，重新在她的脑海里映出。当时内心极端矛盾，她说：“相隔22载，忽听她要来福州开大会，心中的感受大概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若说欢喜她来，一想到自己对上帝的态度，就不敢想了，连外面基督徒的壳子都没有了；她是真正无私的，一定给我一个钉子，那么怎么办呢？若说不喜欢，她在基督徒中又是我所顶佩服的，这一种又喜又惭的情形，真是笔墨不能形容。”

灵命死灰复燃

余慈度到达福州后第二天，林和平就邀请余慈度到她家



吃饭，并请了两位她所属公会（美以美会）的教友和几个麻将朋友作陪。席间，她向大家热心叙述余慈度的为人和如何爱主等情形。最后她说：“明天早上八点钟她在天安堂（福州最大教堂）讲道，请你们都去。”她们说：“你呢？”她回答说：“当然也去。”

第二天（1920年1月15日），林和平一清早就赶到天安堂去听道。第一天和第二天的题目都是讲《亚当如何在伊甸园中失去生命》。她那时实在听得不耐烦，这样老掉牙的故事有什么可听的呢？因此她第三、第四两天就留在家里和她的牌友们搓起麻将来。牌友们也抱怨说：“糟蹋了两天不打牌……讲道一点都听不懂。”她口虽不说，心里也非常同意她们的话。

圣灵继续静静地在林和平心里作工。她见证说：“这天打牌，她们都照旧兴高采烈的。我呢，像一个要断气的人一样，坐在那里如无魂的人一般，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似乎一直要哭。也不知道是何缘故。”她说她以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里头作工了”。这种光景一连两天都是如此，她实在不能再打下去，只得向牌友宣告说：“我是基督徒，该去听道。余女士不远千里而来讲道，我在咫尺之间，岂可不去？不必讲天道，就是讲人道也讲不过去。”因此她对牌友说：“无论如何，我不来了，真的不来了！”



1920年余慈度开奋兴会的天安堂

第五天凌晨四点钟就睡不着了，她就起来预备再去天安堂听道。她到得很早，一进门余慈度已经在会场了。一看见她，就立刻问她这两天为何不见她来？她说：“人不大好过。”余慈度对她说：“愿上帝光照你，祝福你的病快快好。”她回忆当时的感觉说：“哦！这一句话从她口中出来是何等的有力量！”因为“光照了我的心，给我看见：人既然不大好，何以能去打牌，不能去听道呢？为何推辞，又说谎呢？”这个时候，她的心中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聚会时间到了，她只好硬着头皮坐下，这天的讲题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行为如何》，余慈度也不时用手指着她说了许多使她扎心的话。她觉得那些话使她坐在那里好不舒服，但又不好起来一走了之，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会后，余慈度又请她明天再来。她当时心里想：“我今年40岁，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得罪我，当面指责我，毫不留余地。今天无故来此受她的气。”所以她早已决定此后不再来。现在被她这样一请，可难为情了，只得勉强点点头。但是回家以后自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因为不是人家找机会来骂她，而是自己去找骂挨！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忽然自



己又想：余慈度怎么会知道她的生活情况呢？定是有人告诉她的，是谁呢？她想没有别人，一定是那个给余慈度做翻译的姓许的姊妹说的，真想去找她大吵一顿，但是自己又没有真凭实据；如此鲁莽行为，万一不是她，那岂不是大大丢脸，弄得不可收拾吗？因此只得忍痛一夜未眠。她说：“本来千定万定第二天绝对不再去了。可是不知不觉的，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催我去，因此莫名其妙地又去了。”

那一天的题目仍然是继续讲“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余慈度所举的例子件件都好像是亲眼看见她一切所行的样子。她坐在底下满心懊悔，觉得自己昨天被余慈度骂得还不够，所以今天又再来给她骂得更畅快一点。她决定明天无论如何也不再来挨骂了！

与上帝、与人和好

一连数天她的决定都归失败，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聚会了。最后她见证说：“到了有一天（余慈度）讲到上帝的爱和主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亲自替我们死，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因他的死不至灭亡。她说，主在十字架上也有肉身，所受的是顶痛苦的，羞辱是顶可怕的；但是为了爱人的缘故，就不顾一切，甘心舍己来做人类的救主。”林和平听到这里时，她说：“（我）顽梗的心，不知不觉被这位可爱的、为我舍命的主所融化了。”她当场痛哭一场，巴不得尽其所能都奉献给主，甚至愿意为主殉道来报答他十字架的救恩！



复兴之后的倪林和平

等到回家以后，她丈夫见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软弱得哭成这样呢？他对林和平说：“人家去做礼拜都是欢欢喜喜的，你去了，回家几夜不能睡，饭也不能吃，此后不必去了。”她的丈夫倪文修虽是一个好好先生，但是并没有得救。对他的这位太太本来就有点畏惧三分，所以他只对她说了一点安慰的话。林和平的反应更使他莫名其妙，因为她这位一向跋扈的太太居然向他认起罪来了！她说：“你不知其中的事。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大罪人。我犯的罪，上帝都知道。现在我也知道，因上帝给我看见。从前你给我当家的钱，我留下一点为赌钱用，没有完全用在家中。这是何等的罪，求你赦免。”她丈夫根本不觉得这是什么“何等的罪”，因此就又安慰她说：“这是妇女常态，



没有什么!”可是林和平受圣灵感动，继续向丈夫认罪，她觉得以往自己没有忠心伺候丈夫，实在亏欠他，凡是能想到的，她都对丈夫一一认罪，求他赦免。结果她的丈夫也受感动，对她说：“这样说起来，我也是何等得罪你，求你也赦免我。”结果两个人在一起大哭一场。

第十九章 雄心勃勃的大学生 ——倪柝声

1920年春天，倪柝声因参加余慈度的复兴布道会而“厉害”得救了。他在未出生以前，就已经被母亲奉献给主了。他的得救也是因为首先受到母亲的影响，而去听余慈度的讲道才发生的。

奉献给上帝

他母亲如何肯在他未生以前就把他奉献给主呢？这是因为他的出生和旧约中的先知撒母耳有些相似。当林和平结婚后，她一连生了两个女儿。那时她丈夫的大嫂已经一连生了六个女孩，她婆婆非常盼望她给倪家生个儿子（那时中国的社会仍然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现在眼看她这个儿媳妇也是个专生女孩的媳妇，就挖苦地说：“她必定也是和大嫂一样，只会生女孩子。”她听了这话，一面心里十二分地不服，但另一面当她怀了第三胎时，心里也实在害怕，诚恐婆婆说的



话成为事实。她见证说：

“奇妙的就在这里，当我无路可走，有冤无处申时，也会想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我就起来求告他，在糊涂中也会记得哈拿的故事。于是，就把我的心愿倾吐于听人祷告的上帝面前，心里也相信他一定答应了我的祷告，接受了我的奉献。到了产期，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我的丈夫头一个看见是男孩子，立刻跑到我的耳边说：‘是个男孩子，感谢上帝。’我听了心里欣喜，谢谢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除去羞耻，心中觉得有说不出的快乐。”^①

林和平给她的男孩取名为述祖（他得救后又取名柝声和傲夫；英文名字先后是 Henry Nee 和 Watchman Nee）。接着她又生了4个男孩，其中有一个在青年时代因参加革命活动而丧命。其他3个依次为怀祖（George Nee）、洪祖（Paul Nee）、兴祖（John Nee）。倪家是美国美以美会的教友。述祖从初中开始就进入英国圣公会的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就读。这个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二年级，毕业后相当于美国的两年制的大学（Junior College）。他在学校的品行不佳，常常违反校规，但在功课上却因为天生聪明而每次考试都能轻易地考到前几名。他见证说：“我的文章也常被贴在告示板上作为模范；因此就成了一个骄傲、自高自大的人。”并且“我也有许多青年人的梦想和对前途的远大计划”。^②

心中的疑惑

17岁前，他一直到对于信主的事毫无兴趣。那时他父母所在的公会已经堕落不堪，所谓的基督徒多是“有名无实”的，公会中的牧师多半缺乏实际。他在美以美会所认识的牧师，对他来说都是“资格最卑鄙的”，并且“除了牧师来要募捐以外，平日是看不到牧师的面”。有时牧师来到他家募捐的时候，他母亲正在和牌友们打牌打得兴趣高昂，为要赶紧打发牧师离开，她就“顺手把牌桌上的钱拿些给他，虽然牧师也明知是牌桌上的钱，仍是收下”。^③

因此他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因为“只要有钱就行”。那时“牧师”多是欧美人，中国人只能作“传道人”（preacher）。在他眼目中，“传道乃是最轻贱的事，是最下流的。”他们必须要“看牧师的情面”，每月不过拿八九块大洋的工资（西教士的薪水可以高到二三百元）。鉴于教会中这样的情况，他对听道根本没有兴趣。因此他虽然从小就受洗，但他说：“那一次的受洗，是我母亲替我做的，我自己并没有信主。”^④

他母亲虽然是信了主的人，但是她和余慈度第一次会面时那一股青年的热情，结婚以后就慢慢消失在家庭婆媳姑嫂间的钩心斗角中。她在社会上热衷于政治活动，加上她性格特强，自尊自傲，对儿女们的教育采取权威手段，即使自己错了也不肯认错。她终日沉迷在麻将桌上的时间多过对儿女



的照顾，毫无基督徒家庭应有的氛围。一次，家中一个贵重的花瓶被打碎了，孩子们谁都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以后，定规要挨揍。她认为那一定是最坏的大儿子述祖所做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痛打一顿。以后她发现，那个花瓶的确不是述祖打破的，但她碍于面子，始终没有向他道歉。

林和平因为听了余慈度的讲道得到了复兴。因着上帝的光照，她先向丈夫认罪，接着上帝也光照她要去对付冤打大儿子的罪，可是她总是不肯。但是另一方面，她是真的得到灵命的复兴了，因此又对聚会敬拜上帝的事热心起来。有一天，她买了足够的诗歌本和《圣经》，为要恢复家庭礼拜。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只好来到客厅，围绕在钢琴前来参加这个不情愿的崇拜聚会。她在见证中描写圣灵这个时候如何强烈地在她身上做工。她说：

“我才把诗歌拣了一首，要弹唱的时候，主的灵有权柄地在我心里，不许我弹琴，要先向我的大儿子认罪，方许唱诗礼拜他。我就说：“上帝啊！我是母亲，怎能向儿子认罪呢？从今以后我在家庭中怎么过日子呢？”上帝顶清楚地说：‘非认罪不可！’那时我只得屈服上帝。我的丈夫和儿子见我弹琴又不弹了，只见我两眼泪流涔涔，不知为着何事。但是我转过身来抱住我的大儿子，诚诚恳恳地对他说：‘我为主的缘故向你认罪，有一次冤打你，是得罪你，求你赦免我。’大家都稀奇我这样做，但是大儿子对我说：‘你那一次无故打

我，我的心真是恨你。’我说：‘求你赦免我。’他就不开口了。可是那一夜上帝也抓住了他。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他也愿意去听道。”^⑤

与主面对面

第二天，述祖在余慈度的复兴会上，同样被上帝的灵抓住。他当时“心中大有交战”，因为他说，他不但“要决定是否接受主耶稣作救主，也要决定是否作主的仆人事奉他……那时我怕得救，因为我知道一旦得救后，非事奉主不可。”他从天安堂回家以后，心中的交战一直没有停止。他描写当天夜里与主面对面的情况：

“1920年2月29日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有坐卧不安之感，问题是要信主还是不信。起先我想不信耶稣，不作基督徒；但不信又不安，里面起了挣扎。后来我跪下祷告。起初没有话可祷告，但过了些时候，我看见许多的罪摆在面前，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面看见自己是罪人，一面也看见救主；一面看见罪的污秽，一面也看见主的宝血能将我洗净，使我洁白如雪；一面看见主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一面也看见主伸出双手来欢迎我，并对我说：‘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这样的爱折服了我，



我无法抗拒，就决定接受主作我的救主。以前看见别人信主耶稣，我就讥笑他们，但那一夜我不能笑。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认罪之后，罪担就脱落了，人觉得轻松，心中充满喜乐平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一次经历喜乐与平安。以前或者也有喜乐与平安，但得救后的喜乐与平安才是真正的。那夜我一人在房间里，我似乎看见了光，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对主说：‘主啊，你实在恩待了我。’”^⑥

就是这样，倪柝声强烈得救了。接着，他就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成为圣灵水流的重要出口。上帝借着他和王载等，带进了1923年影响深远的“福州大复兴”。

第八部 复兴运动的继续

第二十章 福州大复兴

20 世纪的 20 年代，是中国教会复兴史上的一个转变期。从 1920 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上帝在中国南北各地兴起了新一代的教会领袖。其中以南京的李渊如和汪佩真，福州的王载和倪柝声代表圣灵复兴运动的主流。不但如此，1924 年，当注重地方教会建立的倪柝声和注重福音奋兴工作的王载分手后，他和南京的李渊如与汪佩真因为所见相同而联手。自此，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就在这两个主流中平行发展。

1923 年，“福州大复兴”对第二期复兴运动的影响深远。倪柝声和王载是这次大复兴中两个最关键的人物。倪柝声的得救和奉献已经于前章详述。本章首先需要把王载蒙恩和奉献的经历加以补充。^①

全时间作主工

王载生于 1898 年，14 岁时（1912 年）进上海的南洋公



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两年后进入烟台海军学校，次年转入吴淞海校深造。毕业后在海军军舰上服役。王载幼年已与潘少容订婚。潘少容进美以美会的华南女校就读，目的在于学习英文。一日，安汝慈到该校开布道会，潘少容受感动归主。时为1915年11月7日。潘少容信主后立即写信给王载（那时他已转学吴淞海校），告诉王载她已归主，并劝他到礼拜堂听道，接受耶稣为救主。最初，王载非常反感。1917年王载与潘少容结婚，时年19岁。他婚后受了潘少容虔诚代祷的影响而决志信主，时为1918年11月11日夜。王载旋因看见他所受的滴水礼不合《圣经》真理，而决心于1920年1月19日受浸于厦门鼓浪屿海边。次年春，王载蒙上帝呼召，辞去海军军官职务，全时间奉献为主传道。

王载和倪柝声的相识是因为他们得救后都喜欢读经。1920年春，倪柝声得救后，倪家开始每星期四有查经班，参加的人年长者居多。不久，王载也来参加查经聚会。他们两人年纪相近，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亲密的关系。1921年3月，倪柝声也看见受浸的真理，就和他的母亲一同到白牙潭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处受浸。他把这件事告诉王载，两人非常欢喜，因为他们看见了同样的亮光。1922年夏，他们继续查考《圣经》，看见擘饼的真理和宗派的不对，就公开宣布脱离宗派。在一个星期四下午的查经班后，他们在毓英女校王载住处（是一西教士的房子，暑期借给王载暂住）开始擘饼，参加者只有王载夫妇和倪柝声三人。王峙（王载的弟弟）因尚未受浸，只在旁观看。

那时倪柝声仍然在圣公会的三一书院读书，他经过彻底对付罪和完全奉献后得到圣灵的充满。他向同学们作见证，大有能力。他迫切为全班同学祷告，在一年之内，除一人外，全体归主。同样，王载也因彻底奉献，满有圣灵的恩赐。他在福州城内和乡下，热心布道。他和倪柝声等青少年信徒为福州迫切祷告，终于带进1923年的复兴。

灵火被挑旺

1922年底到次年初，时值三一书院寒假期间。那时复兴的灵已在福州兴起。那些脱离宗派的和新得救的已有20多人。他们想在假期请著名的巴教士（Miss Parmanter）到福州主领布道会（巴是宣道会的女传教士，金陵女子神学院兼任教授）。但因为巴教士已经接受了福州美以美会的邀请，无法分身，于是他们决定函请南京《灵光报》主编李渊如小姐来福州开复兴会。

福州复兴的火炬是经过三一书院的学生们挑旺起来的。他们灵里火热，不但在校中大传福音，也到福州城里（人口约10万左右）及其近郊乡下去布道。福州复兴的开始和继续，都和这些得救的学生们迫切祷告有关。根据王峙的见证：“当时这帮青年信徒心情非常热烈，学校中午停课吃午餐，至下午再上课，中间约有半点钟的时间，必会集中在学校大礼堂祈祷。”^②

倪柝声描写复兴开始的经过：“1923年1月，李小姐到



了福州，我们就预备开会布道。我们每主日本来是在王（载）弟兄家的客堂聚会，现在要开会，没有地方，没有凳子，又怕没有人来。我们就这样做：在王弟兄家一个亭子里聚会，现凑些凳子，到附近的地方请些人来。因主已起首作工，就有许多的人得了救。”^③

那时学生们在倪、王的带领下，利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吸引市内居民听道。“弟兄们每人在胸前背后挂上白布，前面写的是‘你要死’，后面写的是‘信耶稣得救’，还有其他类似的单句。手里拿着旗子，口里唱着诗，这样游行各处，看见的真稀奇。就是这样把许多人带到聚会的地方来了。天天都是这样游行，天天都有人来听福音……这样天天背着旗子游行的有六十儿人。福州不过有十几万的人。我们天天这样背旗游行，天天有几十人出去分单张，整个福州城都震动。”^④倪柝声见证说：“我一生没看过有一次复兴胜过那次复兴的！那次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好像无论什么人，碰一碰就得救了。”^⑤

三一书院的学生们因为得到复兴，在生活上有了极大的改变。倪柝声见证说：“（我）每天早起，五点钟就到学校。我一到学校，就看见无论在哪里，都有人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看。总有一百多人在那里读经。本来看小说是很时髦的，现在要看的只好偷着看了。现在看《圣经》是顶体面了。我们的学校一共有八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顶稀奇的，差不多每一班的班长都得救了。所有出名的运动家也得救了。”^⑥

李渊如主领布道会两周后，复兴的火越烧越旺。他们本来想请李渊如留下来，因为学生“顶盼望在阴历正月初（就是阳历二月）作点工”，但是“李小姐因南京有工作，就必须离开福州。”倪柝声回忆说：“我本来去请在马江的和（受恩）教士来帮忙，但是她说，不知道这个聚会是一个怎样的聚会，她不能来。我同王弟兄商量，会到底停不停？王弟兄那时伤风，我又把已经放假回家的陆忠信弟兄、缪受训（绍训）弟兄用快信请来了。我们只好定规继续下去……（我们）天天都是这样游行，天天都有人来听福音。在亭子的外面，在厨房里，在客堂里，都坐满了人。”^⑦

人人渴慕追求

那时复兴的情形，可以从凳子的事上表明出来。倪回忆说：“我们租了些凳子聚会，但是，租的期限是两礼拜。现在日子满了，钱也没有了，聚会停止不停止呢？凳子只好还人，我就宣布说，以后凡是要来聚会的，都要自己带凳子来。这一天下午，整山（仓前山）只见人搬凳子。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也有。警察见了，都有点稀奇。每天散会时，我们又宣布说，愿意把凳子放在这里的，我们尽力保管，不过，如有遗失，我们不负赔还的责任。要带回去的就请带回去。这样每天三次聚会，都是各人自己带凳子。感谢主，他特别的祝福，有几百人都得了救。”^⑧



倪柝声（左）与王载（右）“同二纪念”

（1922年5月7日）

他们在毓英女校王载住处聚会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后，王载有负担到福州乡间去布道，所以就迁往离福州5公里的阳屹乡（名士严复的故里）。青年弟兄们觉得应当有一个正式聚会的地方，因此就迁往十二间排继续举行（这个地方因为一排有十二间的房子，所以名为十二间排）。^⑨他们因为缺钱，就先租其中一间，名为“基督徒会堂”，后因来聚

会的越来越多，就续租二间，以至三间。倪柝声见证上帝如何供应他们房租的需要。他说：“那时候我们缺钱，没有能力租房子。有一家姓何的（何肃朝），他在复兴期间信主，肯以比较低的价钱租房子给我们，每月房租9元，但要先缴三个月房租。我就和几位弟兄一同祷告，求上帝给我们钱，因为一进去，就要先缴27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数目。”

奇妙地，有一个西教士供给了他们这一笔钱作房租用。

倪柝声说：“我每星期六都要到福州的马江去与和受恩姊妹交通。那一个星期六我见她的时候，她拿着一些钱对我说：‘这里有27块，是一位朋友叫我送给你，为工作用的。’这个数目刚好够付三个月的房租，不多也不少。我一回去就马上先缴清三个月的房租。后来再祷告，主又为我们准备。”^⑩（早在12年以前，和受恩于1909年第二次从英国来到福州以后，她就迫切向上帝祷告，求他在中国的青年信徒中间兴起复兴教会的器皿。她相信倪柝声和王载等都是她迫切祷告的结果。）

在十二间排聚会时期，王峙见证说：“除了主日在此擘饼及传道之外，也时常开特别聚会，有圣灵与我们同工；没有聚会之前，许多人聚集迫切祈祷，有时轮流整天祈祷；还有人列队出去游行、摇铃、喊口号，引人进入会所；一聚会，坐无空席，唱诗时，无人不唱，唱不和调，也不管。”^⑪

王峙和倪柝声都说他们“从来没见过比这次更大的复兴”。当王峙回忆在复兴中上帝如何兴起了更多的同工时，他也说到他们之间分手的经过：



“缪绍训、陆忠信、王峙相继蒙召，出来事奉主。十二间排的工人，就增至6人，即王连俊、王载、陆忠信、倪柝声、缪绍训、王峙（按年龄分先后）。此后工作发展，缪绍训先到阳屹与王载同工，后回原籍连江县开荒布道。陆忠信先到潘墩乡开荒布道，以后到马江、白牙潭与和受恩教士同工。王峙出来的时候，与王连俊弟兄同工。唯有倪柝声弟兄别有异象，离开我们，先到罗星塔，与和受恩教士隔江相对，后至南京、上海等地。外间有人传言，倪弟兄为其同工所革除，并非事实。”^⑩

不同的异象

倪柝声也曾证实，他和王载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了不同的“异象”之故。他见证说：“1921至1923年之间，好多地方都有奋兴会。许多人认为这种奋兴会能领人归主，所以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聚会。但主给我看见他的旨意，是要所有得救的人，站在地方合一的立场，来为他作见证。只是有些同工，对于这个看法，并不同意。我专心查考《使徒行传》，我看见上帝的心意是要在各地建立教会。对于这件事，我有清楚的亮光，明白他的旨意。由于这个启示，问题就发生了。有些没有这光的同工们，对于我们工作的重点，

有了看法上的分歧，引起我们中间的摩擦。他们觉得我们应当积极于传福音和奋兴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效果容易看见。但主给我看见他的心意是建立各地的教会，这也是我的负担，其他工作都属次要。”

王载显然是主张积极去开奋兴会布道的最重要的同工，而且他又比倪年长。这一点在倪的见证中说得很清楚。他说：“那位年长的同工常出去带领奋兴会，而我，是按我所看见的异象工作。我们两个人因所领受有关工作的亮光不同，因此我们工作的道路也不同。一个是为着奋兴和传福音，另一个是建立各地的地方教会。主给我的启示非常清楚，他不久要在中国大小城市兴起地方教会。我闭起眼睛，那景象就呈现在我眼前。1924年，有些同工对我不满意，上帝也许可福州教会落在试炼中。为了避免分裂，我离开福州。”

关于1924年后，地方教会运动在倪柝声带领下的发展，需要另以专书论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王载如何在1925年的“上海大复兴”中被上帝使用，因而产生出继余慈度之后为奋兴布道工作献身的新生代。

第二十一章 上海大复兴

关于上海复兴，余慈度在她的见证中说：“1925年夏天，正当反基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伍兹师母（Mrs. Henry Woods）作他的器皿，在上海带进一次强大的复兴。伍兹师母是‘全球复兴代祷运动’（World - Wide Revival Prayer Movement）的发起人。那些读过她《主恩满溢》（The Half Can Never Be Told）一书的人就会知道上帝所做的工作是何等奇妙。许多参与这次复兴的人，都能为圣灵在复兴中所显出的大能做见证。他们多人都是因为参加那一次的复兴大会归主的。”^①

我们只根据余慈度这一段简单的记录，自然无法看出上海复兴在圣灵之流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无法看出她自己在这次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主恩满溢》一书和其他当事人的见证，对这一次的复兴的经过和影响，加以阐明和补充。



全球复兴代祷运动

促成“上海复兴”的两种因素，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关于属灵方面：余慈度和她的属灵同伴在上世纪10年代后期，共同发起了全国信徒的代祷工作。安汝慈在《教务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有关信徒祷告生活和为教会复兴代祷的文章。1924年元旦，伍兹师母和她的先生（美国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一位医生教士），连同几个重要的属灵领袖，在上海发动了“全球复兴代祷运动”。^②他们为此成立了委员会，由伍兹师母担任主席。委员中包括安汝慈和余慈度两位女士，和当时著名的西教士何思德（Dixon E. Horst，内地会驻华主任）、伍伯之（Samuel, I. Woodbridge，美南长老会医生教士）、鲁雅各布牧师（Rev. James Walter Lowrie，美国长老会驻华会议主席）、万应远牧师（Rev. Robert T. Bryan，美国南浸信会的“上海浸会学院”院长）等人。余慈度是委员中唯一的中国人。

该会向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信徒，大量分送与信徒祷告生活和代祷工作有关的重要书籍，以图唤起信徒祷告的负担。另外，该会也邀请国外著名布道家到中国来开复兴会。那时英籍的魏克斯传教士（Paget Wilkes）为“日本福音团”（Japan Evangelistic Band）的创始人，他在福音布道上大有能力。他的属灵著述很多，其中《作工的炸力》（*The Dynamic of Service*）一书，对中国福音复兴的工作影响甚巨

(倪柝声重要同工张愚之，在抗战期间曾将此书译成中文)。

1925年初，伍兹师母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定期禁食祷告时受圣灵引导，决定邀请魏克斯牧师到中国来，主领西教士在江西牯岭举行的年度夏令会。该年5月底，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五卅运动”(或称“五卅惨案”)。那时上海的学生为了抗议当地的一位中国工人遭受到日本工厂的残酷虐待，而发动游行。学生中有12人被英籍警察射杀，并有多人被捕，因而激起全国各界规模空前的反抗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和日本)运动。

复兴会的重要果子

魏克斯因为自己是英籍教士，他就致电伍兹师母问她是否自己应当延期赴沪。伍师母等经过迫切祷告，灵里觉得魏教士还是应当如期来华，只是他们把聚会的地点，临时从牯岭改在上海英国公会的联合礼拜堂举行。他们起初为避免在大会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就规定把为期三周的培灵会只向外籍传教士开放。前来聚会的西教士们特别踊跃，圣灵大大做工。

有一次，大会破例准许一个患病的中国人与会(他是石美玉医生带来的病人)，结果他当场得到上帝医治而痊愈。因此就有人提议，大会也应当向中国信徒们开放。但是魏克斯不懂中文，必须能找到合适的翻译才行。有人提议找青年布道家王载来做翻译，可是他们发现王载那时正在山东一带



布道，恐怕远水不解近渴。那时，余慈度主办的“暑期预言查经特会”刚刚结束，伍兹师母就派人到江湾去找她推荐合适的译员。

当差来的人到了余慈度的住所时，发现王载正在她的客厅和余慈度讨论邀她到福州去领会的事，并且他就要在两小时之内坐船离开上海，回福州去为特会作准备。余慈度立刻改变计划，请王载留在上海帮助做大会的翻译工作。整个聚会被复兴的灵所充溢。培灵会结束以后，复兴的火越烧越旺，使大会一直持续了两个月之久。

王载在这次复兴中，除了担任翻译以外，也积极参与复兴讲台。当魏教士突然病倒时，他和另外一位桑教士（Rev. J. B. Thornton）共同担当大会主讲的责任。在一个全天禁食祷告会上（8月5日），王载又和余慈度共同负责主持这一个属灵争战的聚会。圣灵大大地做工，多人在大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冷淡多年的信徒在会中得到复兴。

复兴大会所结的果子中，除了初次蒙恩得救者以外，还有50位中国青年信徒，在会中决志奉献终身于布道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成为第二期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计志文就是在这次复兴中决定辞去他在邮局里的优渥职位，而回到上海的伯特利圣经学院接受训练。周志禹牧师和胡美琳女教士也是在那一年的复兴会中决心归主的。女神学家蓝如溪、石美玉医生和胡遵理教士（Jennie Hughes）等都是在复兴期间由王载予以施浸的。此外在复兴会中献身的，还包括创立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等。

1925年，在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代。上海复兴后，王载扩大他奋兴布道的职事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进而扩大到海外。1928年，他应邀到香港主领聚会，结识了加拿大籍的宣道会教士翟辅民（Rev. Robert A. Jaffrey）。次年他与翟教士组成“中华国外布道团”，到南洋各地布道，成为中国最早海外宣教团体之一（19世纪90年代，由李叔青所领导的“天津守真堂布道会”是中国第一个向海外宣教的团体。参《李叔青传》）。在国内，计志文成为20世纪30年代“伯特利布道团”的领袖。宋尚节于1927年由美国返回中国后，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参加该团，与计志文同工。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福音的广传影响很大，代表了“奋兴布道派”的主流。

第二十二章 信仰的捍卫者

对在中国的西教士来说，192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内部政治的发展，对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和中国教会的组织及运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共合作政策下，北伐的军队从1926年冬季开始，由广东向华中挺进。其中，左派的激进份子在北伐途中，以西教士及其教堂为对象，威胁到全国西教士的生命和安全。在英美驻华领事馆的催促下，西教士仓皇从内地逃往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如南方的福州和华中的上海）避难；有的甚至索性离开中国。北伐军的激烈行动于1927年3月达到顶峰。3月24日，军中的左派份子抵达南京后，枪杀了当时著名的南京大学美籍副校长威廉思（John E. Williams）。此一“南京事件”震撼全球。在中国的西教士团体，几乎一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时代就此结束了。



吹响真理的号筒

余慈度在这一个动荡的年代中，和其他西教士同样遭受战争冲击。从1926年冬季开始，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占了她在江湾的圣经学校，把伯利恒教堂变成马房。她和学校的负责同工们，被迫逃往上海避难，过了两个月的流离生活。她亲眼看见许多西教士从内地逃来上海，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那时，这些逃难的西教士对他们在华的传教工作，显得灰心丧气。

但是我们从余慈度的见证来看，她显然对于教会在外面所遭遇的试炼，远不如她对教会内部“新神学”对教会基本信仰的威胁更为关切。虽然她1913年第一次访英时就已经注意到新神学的危险，但她并没有公开向新神学宣战。^①乃是到了1927年，她才觉得必须公开“吹响号筒”，为真道争战。她的号筒是在该年夏季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上吹得最为响亮。

“开西”是英国西北部湖区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自从1875年在该处举行了第一次追求“更高生命”（Higher Life）的大会以后，“开西大会”就成为普世教会中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征。开西的属灵异象包括三方面：第一，追求信徒个人的圣洁（或成圣）的经历。第二，推动全球的布道工作。第三，恢复普世教会（基督的身体）的合一。这三个宗旨又是被一个“基督即将再临”的异象所控制。这一个

异象反映了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的“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m) 和其“千禧年前信徒被提” (premillennialism) 的神学影响。^②

关乎信徒个人圣洁生活的追求, 开西承受了 17 世纪以来以盖恩夫人、(Madame Guyon, 1645 - 1717) 为首的“奥秘派” (Mystics) 的属灵神学, 注重信徒里面的属灵成长如何从幼稚阶段达到“更高生命”的过程, 以及信徒必须与上帝合作, 甘愿把“一切交给上帝”或“绝对顺服上帝” (full surrender)。

每年参加大会者经常有数千人之众。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宗派中的领袖人物。因为参加人数众多, 他们就在湖边支搭一个庞大的帐幕。每年大会的主讲人都是围绕在“成圣”这个主题上加以发挥。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具属灵权威的人物, 并且都是男士。著名的女性属灵领袖只能在另外一个会场向妇女听众讲道。有一次, 一个男性讲员在大会开始的当天忽然病倒, 大会临时破例请在妇女聚会中作主讲的宾路易师母 (Mrs. Jessie Penn - Lewis) 到帐幕的会场去代替他。从此以后, 这一个性别的限制才被打破。以后, 女性主讲员, 包括史密斯·哈拿 (Hannah Whitall Smith, 她是 1875 年开西大会最主要的创始人) 和安汝慈教士。^③

对新神学宣战

开西大会期间, 除在大帐幕中传讲其中心信息以外, 还



举行一场“传教士大会”（Missionary Meeting）。余慈度于1904年左右已经接触到开西大会重要讲员的著作。此后，她和内地会驻华主任何思德（D. E. Hoste）建立了亲密的属灵关系。在上世纪20年代，内地会英国总部的主任艾迪思牧师（Rev. W. H. Aldis）担任开西大会的主席，因此当余慈度1927年应内地会邀请二度访英时，她也被大会邀请担任“传教士大会”的主要发言人（在中国人中间，王载和倪柝声也曾参加过开西大会，但都没有被请在会上发言。倪于1938年曾被请为大会作结束的祷告）。她发言的主题是警告大家注意新神学的危险。为了更清楚了解余慈度何以对新神学公开宣战，我们需要追述一下新神学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受“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们对于西方的科学和以杜威为主的实用主义极端崇拜。他们认为宗教是迷信的，是不合科学的，这些思想也影响到中国教会内部的“文化信徒”。他们受了西方新神学思想的影响，对《圣经》的记载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圣经》的记载与科学相反，不可能是永无错误的。他们也怀疑基督的神性，更不相信基督的复活和基督的再来。这一个新神学的思想，在美国以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教授福斯德（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79）最为著名。1926年，曾经在协和神学院读书的宋尚节，就是受了福斯德的影响而一度怀疑自己的得救。当时许多从欧美到中国的传教士，也都受了新神学的影响，而变成“社会福音派”（就是王明道所说的“不信派”）。

在基督里的合一

余慈度在传教大会上发言的时候，首先为“基督身体的合一”作见证，响应了“开西大会”的口号——“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All One in Christ）。当她在大会中被介绍为“中国的代表”时，她立刻改正说：“我在这里不是中国的代表，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我属于一个天上的城市。”接着她就集中对付新神学的问题。她以动人心弦的话语向与会的教会领袖们大声疾呼，恳请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去阻止他们的公会，千万不要再把新神学派的传教士送到中国去，以防止他们破坏中国基督徒的纯正信仰。

关于余慈度在大会上发言的概要，当时主持大会的主席艾迪思牧师（Rev. W. H. Aldis），曾在内地会主办的杂志《亿万生灵》（*China's Millions*）上报道说：“一位中国女士、余慈度小姐在大会上发言。当她从内心倾倒出她那极其感人的话语时，与会的教士们都听得如痴如醉。”^④她的演讲在当时另外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上，也有专栏报道。文章作者评论余慈度的演讲说：

“大会为着中国信徒和在中国做工的西教士有一段祷告以后，接着广大的会众们得以听到从中国上海来的余慈度小姐的演讲……余小姐说：‘现在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时刻，因为新神学已经侵入中国，并且日益猖獗。’



余小姐确信现在教会在中国的需要，就是‘要高举基督，并要传扬纯正的福音。’她伤痛地指出：现在许多中国教会的领袖，还不知道‘重生’是什么呢！说到这里，余小姐把话锋突然转向会众，激昂地呼吁他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她的讲辞流利非凡，所用的比喻简明有力，听众认为她的演讲是他们在大会上所听到最精湛的信息之一。”^⑤

余慈度在英国的时候，把她1916年的见证加以补充。在原书中加了最后一章，以“总要做醒祷告”为题。这正说明她当时内心属灵的负担所在。

余慈度于1929年从英国路过美国返回上海。那时她的属灵生命已经到达相当成熟的境界，也得到世界属灵领袖们的承认。但是她的身体的情况也同时逐渐衰微，无法继续沉重的培训工作。因此她把查经祈祷处的房舍奉献给中华神学院，自己便迁到上海市内的虹口路去住。那时她不但有旧病缠身，并且又患上了晚期乳腺癌。根据赵世光的见证，她在病床上忍受着身体上癌症的痛苦，但她并不灰心，反而能感谢赞美上帝。当倪柝声去看她时，她对倪说，她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她的病。但是这一次上帝似乎对她说：“你已经为我劳苦了一生，你进入我给你所预备的安息吧！”^⑥

1931年春，当圣灵在中国借着一批新生代的器皿把教会复兴的流推向另一波高峰时，余慈度静静地安息了。对于她的安息礼拜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多少的记录。但是在参加

聚会的人中，有一位在中国教会第二期复兴中颇负盛名的女布道家——胡蕴琳（原名胡云麟）就是在参加她的安息礼拜时受圣灵感动而奉献终身。^①

余慈度的属灵职事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她虽死了，却因信，仍然说话！”（《希伯来书》11章4节）

结语：余慈度复兴职事的时代意义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教会复兴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来看。1900 - 1927 年是第一期（初期）；1928 - 1949 年是第二期。余慈度的属灵职事在复兴史的初期中具有四方面的时代意义。

性别拣选的意义

在中国教会复兴史的初期中，我们发现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就是上帝在中国教会的广大原野上，兴起了许多女性奋兴布道家。正如《圣经》所说：“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诗篇》68 篇 11 节）。这些女性们在不同的灵工领域中成为圣灵水流的出口。她们的影响有的是全国性的（像余慈度、安汝慈、葛洁茜等），有的是区域性的。我们需要看看与余慈度同具时代意义的几个重要女性人物。

1. 蔡苏娟（英文名：Christiana Tsai）^①

她的出身和得救以至奉献传道的经历都颇具传奇性。她祖籍杭州，在南京出生。那时是清朝光绪年间，大约是 1890



年左右，她父亲蔡兴华任江苏省布政使（财务副省长）。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却对西教士相当友善。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曾代理巡抚（省长）的任务。



蔡苏娟

1906年，她为了学英文进入美国长老会在南京办的明德女校（Ming Deh Girls' School）；后又进监理会在苏州办的景海女校（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就读。她在景海女校因参加美国著名布道家高登（Samuel Dickey Gordon, 1859 - 1936）的布道会受感归主。在学期间，曾随西教士女布道家

白美丽 (Mary Culler White) 在苏州附近的水道上作游艇布道。毕业后，与明德女校校长玛丽·李曼 (Mary Leaman) 同工，并认李曼为谊母。

起初，她在南京的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员，带领众多学生归主。此事引起学生家长激烈反对，成为1917年报纸上举国皆知的新闻。她因此辞职，专心参与李曼的事工。同时她也协助安汝慈、葛理奋·多马 (Dr. Griffith Thomas) 和查里·崇堡 (Dr. Charles Trumbull) 等著名西教士担任布道翻译，并向中国各教会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广传福音；有时也在教会的礼拜堂向大众布道。当会众人数太多时，也会采取支搭大帐篷的方式布道。她的布道很有能力。

1921年，她偕同李曼赴美休假，得以在美国各教堂和神学院证道，并曾到华盛顿访问，蒙美国总统哈定 (Warren G. Harding) 接见，曾风靡一时。1931年，她患了严重眼疾，不能见光。1949年元月，国共战争渐近尾声时，伴同玛丽·李曼移居美国，终生居住在李曼于宾州农村故里的“乐园” (Paradise) 镇。她在一间完全不透日光的斗室中，接见了成千上万的来访人士，成为全球各地教会弟兄姊妹集体“观光”的重点。从她那无光的斗室中，她借着口述，寄出了无数的信函，回答中外信徒灵性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她曾在两本畅销著作中——《暗室之后》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中文有袁厚载译本) 和《蔡苏娟：暗室之后续本》 (中文有涤然译本) ——见证她蒙恩的经历，感人至深。



2. 李渊如 (1894 - 1970?)^②

她的信主和献身与蔡苏娟和玛丽·李曼有直接的关系。李渊如出身贫寒之家，父亲早亡。但她聪明向上，考进了武昌女子师范学校，立志做一番大事业，报答寡母养育之恩。但正在她参加毕业考试的期间，母亲忽然故去。从此，她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她不时怨天怨地，却又以无神论者自居，极力反对基督教。

1917年，恰当蔡苏娟离开江苏女师不久，李渊如受聘成为该校的“校监”（教务主任）。她向校长保证，要把基督教会影响从校中完全清除。她命令那些因蔡苏娟而信主的学生们交出她们所有的《圣经》，并当众予以销毁。并把7个到蔡苏娟家参加查经的学生开除。

那时，接替蔡苏娟教职的郑女士和蔡苏娟同属李曼的长老会。李渊如受到郑氏真诚之爱的人品所感，于1918年4月底答应郑的约请，一起到李曼家午餐，当日即受李曼的引领决志归主。不久她辞去女师教职，受聘成为明德女校的教务主任，并带领她在女师的两个学生，张耆年（非比）和缪韵春与李曼同工。^③

李渊如的文学造诣很深，有“女状元”之称。她在南京明德女校教书不久，就被当时著名神学家贾玉铭聘为他所办的《灵光报》主编。上世纪20年代初期，她在南京和王载相识，以后因倪柝声向《灵光报》投稿，而与倪相识。如前述，王、倪等于1923年邀请李渊如到福州主领新春布道，触动福州的复兴。结果有陆忠信、缪绍训（原名“受训”）、王连俊

(王约翰)以及王峙(王载的弟弟)等人的献身。1927年,李渊如以及当时著名青年女布道家汪佩真,因受到倪柝声“地方教会”异象的吸引,而脱离了她们所属的长老公会。

当北伐军在南京开始杀教士时,李渊如等3人一行逃离南京到上海避难。不久,倪柝声也从无锡来到上海,与汪、李、张、缪共五人在上海开始了“奉主名的聚会”。李渊如等虽然离开了蔡苏娟和李曼所属的长老会,但是她们双方一直保持友好的交通关系。蔡苏娟在她《暗室之后》中,对于李渊如等在上海地方教会的工作多有表扬。她们为那些因所见不同,而在不同领域中忠诚事奉主的人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3. 陈玉玲(1886-1965)^④

她是20世纪初期被上帝大用的布道家。她是浙江人,父亲曾在晚清名将左宗棠麾下任军需长,并首先信主。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她的全家在纷乱中离家逃难。陈玉玲在18岁时进入通州培善女子学校就读,后升北平贝满女中。在学期间,因参加丁立美主持的奋兴会而清楚重生得救。24岁(1910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28岁毕业。这期间曾与人订婚,后在上帝的引领下解除婚约,专一事主。1918年她蒙召加入诚静怡(会长)、江长川(副会长,江守道之父,监理会会督)和余慈度(执行委员)等所组成的“中华国内布道团”,赴云南乡间布道达25年之久。

她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布道大有能力。她在云南建立了多处的乡村教会,以后又在陕西、广东、香港各地从



事布道和神学教育的工作。1945 年底，她在北平结识陈伟昆（1897 - 1985，是 1908 年余慈度在汕头开奋兴会时受感蒙召的），两人成为亲密同工，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退休为止。

4. 焦维真（? - 1971）

她于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生于山东。早年曾就读于烟台的保姆学校（相当于今日的师范学校）。她的得救和蒙召都和余慈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她的属灵职事却和余慈度所办的查经祈祷处，在余慈度故去以后保持了属灵的延续关系。焦维真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专心致力于布道工作。她曾参与中华国内布道团和伯特利布道团的福音工作。她“走遍了朝鲜、青岛、上海、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向数万人传讲福音。”^⑤余慈度去世以后，将她的查经祈祷处捐给江湾的中华女子神学院（由美籍女教士毕路得任校长。在上海《通问报》1931 年 11 月第 41 号曾报道，该校为了纪念余慈度把她全部财产捐赠该校而召开了追悼大会。）该校以又后改名为中华神学院，焦维真在该院担任教职。

在众多女性布道家被上帝兴起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一种男女两性交互影响的连锁效应。首先上帝借着女性布道家带动了男性的复兴；然后又借着新生代的男性布道家带动了更多男女两性复兴家的兴起。

如前所述，倪柝声是 1920 年因参加余慈度的奋兴会而得救并献身的。1925 年后，继续余慈度奋兴布道路线的王载，就是首先受到他妻子潘少容的影响而信主的，以后他又受到美国教士玛丽·李曼（Mary Leaman）的影响而决志献

身传道。接着，因为王载的布道，又产生了更多新生代的男女奋兴布道家。在著名的男性人物中，伯特利布道团的创始人计志文是在上海大复兴（1925年）时由王载施浸的；创办灵粮堂的赵世光也是在那次复兴中因王载的证道而决志献身的。以后成为倪柝声早期同工的江守道（原名江德茂），又是因为参加计志文的夏令会而清楚得救的。

王载的重要女性果子中包括张性初。她是抗战期间创立“中国大学学生基督徒联合会”的赵君影（1906 - 1997?）的妻子。张性初起先是在清江浦（淮阴县）参加王载布道决志奉献传道，成为区域性的奋兴家。赵君影又因参加张性初的奋兴布道而清楚得救（并随即向她求婚），以后又因参加计志文的奋兴布道而决志献身。^⑥王载的另外一位女性果子是胡蕴琳（原名胡云麟，1900 - ?）。她是在1931年参加余慈度的安息礼拜时受感蒙召的。她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区域性的奋兴布道家。^⑦

这种女性奋兴家影响男性的情况，也包括国际间的例子。中国20世纪中传福音最有能力的宋尚节（1901 - 1944），就是1926年在纽约参加15岁的女童布道家阿特丽的奋兴会后得到“重生”（笔者不久将出版阿特丽的传奇传记）。

社会阶层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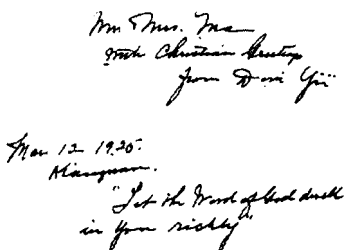
余慈度的复兴职事，是以中国沿海城市的上流社会为对象，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于其



他阶层的人存心歧视，而是和当时西教士们一样，都是为着达到福音的目的而产生的传道策略。西教士所以对中国提供医疗服务和兴办洋学，也同样是执行这个策略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冲破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藩篱，好把福音传进不同的阶层。上帝在复兴初期所使用的重要器皿中，其中多位都是西医出身的。有的终身献身于医疗服务，如创办九江妇幼医院和上海伯特利医院的石美玉（Mary Stone）和康成（康爱德，Ida Kahn）是中国最早获得美国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而余慈度和石馥梅（Zah Foh May）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博习高等医学堂，即东吴大学医学院前身）。她们中间除了余慈度是全时间做奋兴布道的事奉外，其他都是以医疗服务



1928年余慈度参加开西大会后与上海先施公司少东马文辉夫人摄于伦敦
照片由马健源（照片中之婴儿）提供


 Mrs. Ma
 97th Christian Bk. Co.
 from Dr. Yi

 Mar 12 1920
 Mangwan.
 "Let the Word of God dwell
 in you richly"

1925 年余慈度在她赠马文辉夫妇
圣经上的签名手迹

作为手段，而达到传扬福音的目的。

医疗服务最成功的例子应当是 19 世纪末北洋西医学堂的建立。它的起源是因为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夫人生了一场重病，而她蒙两位西医教士诊治痊愈后，李鸿章就上奏西太后建立了这所近代化的海军医学院。^⑧

当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教士约翰·伍伯瑞（或译“伍约翰”）夫妇（John and Katherine Woodberry）于 1895 年到达天津后，许多西医学堂的学生因他们的福音蒙恩得救。其中包括中国 20 世纪第一个奋兴布道家李叔青、张汝舟和钟文邦等弟兄。上帝乃是借着这一批年轻的信徒启动了我国第一波的复兴浪潮。

女性医生在促使福音打入中国（朝鲜亦同）上流社会女性范围的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如前所述，上流社会的中国妇女深受儒教男女授受不亲的约束，被西教士称为“自我禁闭”的社会阶层。即使她们愿意接受西医的诊疗，也只有女性医生才有接触她们的可能。随着中国在 20 世纪初期社会和经济的急剧变化，一个新兴的有钱阶级——特别



在沿海城市——产生了。这些有钱阶级的男女，在信主以后常会在财务上慷慨捐献。因此使全时间的中国传道人得以脱离西方差会在经济上的控制。

关于兴学方面，几个为着上流社会的子女所设立的贵族学校，原来也都是为了达到传扬福音的目的而建立的。最初西教士的兴学都是以贫下阶级的子女为对象。即使一切免费，但也只有那些视女儿为“废品”的贫困家庭，才肯“牺牲”自己的女儿让她们去上洋学。因此教会所办的日校，第一个学生常常是那些在教堂做清洁和看门的“工友”们的女儿。上流社会的家庭绝对不肯把自己的“千金”送到这种学校去。

西教士看准了这一个问题，于是就开始设立收费昂贵的贵族学校。监理会在上海所办的中西女塾和在苏州所办的景海女校都属此类。蔡苏娟是在景海读书时得救献身的；林和平和宋庆龄姊妹们也都是中西女塾的学生。其姊妹学校中西书院则产生众多的男性教会领袖人物，包括开创朝鲜监理会的关键人物尹致昊。就余慈度来说，苏州的博习医院使她得以和上流社会的信徒建立了关系，因而促成她“凭信心生活”的属灵事奉；同样，到中西书院一类的贵族学校去证道，使余慈度得以接触到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女，如林和平等。林和平的父母是福州的富商，她的儿子倪柝声所上的学校也是西教士为有钱阶级所设立的三一书院。

教会真理复兴的意义

从余慈度的见证来看，她的属灵职事对上帝在中国教会初期的复兴——复兴救恩的真理和复兴信徒的属灵的经历——具有重大的意义。^⑨这两方面的复兴都和当时世界上属灵堡垒的开西大会所传扬的中心信息有密切的关系。余慈度从朝鲜返回不久（1904年左右），就开始接触到开西重要讲员的著作。她不但注重基督徒内在生命的成长和圣灵在信徒内心的主观经历，同时也非常注重上帝在信徒外面环境中的安排和对付，这一切都反映了开西大会的影响。

就客观的真理来说，余慈度的见证和所传讲的信息，涵盖了上帝救恩全部的内容：包括人如何在伊甸园的堕落、人的罪性和罪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和他的复活、升天、坐在天上以及他的再临，教会的被提和信徒得赏赐等基本的救恩真理。

就信徒重生后的主观经历来说，她的见证和她引用开西讲员们的著作内容，几乎涵盖了教会复兴第二期中属灵领袖们所释放的全部亮光（例如贾玉铭、王明道和倪柝声等人的著作中有关生命成长、成圣、变化、得荣以及顺服上帝和接受“圣灵的管治”等题目），不过在第二期中间，后者的确对这些经历提供了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和解说，也更能帮助有心追求的信徒去进入这些经历的实际中。

余慈度的属灵经历可以综合为下列数点：



1. 信徒必须时常对付罪。凡是被圣灵显明出来的罪，都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对付。在她晚年常去看她的赵世光，为她作见证说：

“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时，她所对我说的话至今我仍没有忘记……她对我说：‘我现在在痛苦的时候，旧时不觉得的罪，现在都觉得了。现在受痛苦的时候，我连微小的罪都一一向上帝承认出来。’”^⑩

2. 要绝对奉献！包括向上帝完全顺服（fullsurrender），把一切交（托）给上帝，跟随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教训，顺服上帝在环境中全能的安排和对付。因此她以“上帝如何对付余慈度”为她自述的主题，来见证她在环境中遭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都是上帝用来成全她的工具。

3. 圣洁或成圣的生命（活）。包括必须对付世界、肉体 and 接受十字架，并与基督同死的经历。她的遗稿《成圣六课》（A. S. Worrell 原著，余慈度译）中提到如何成圣时有一条说：

“基督一进来，就当算自己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加拉大书》2章20节）。以后若再看自己，切勿再认他，因你自己已经钉死了。要把凡一切属血肉的求主拢总灭掉（《约翰壹书》3章8节），用信心算这一切属血肉的都死了。倘有时再看见自己，务需凭着信心算已经

与基督同钉了，因为保罗向罗马人说：‘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罗马书 8 章 13 节）。若看见有身体的行为起来的时候，就当靠着圣灵治死他，这样行就真正‘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3 章 10 节）脱去旧人以致穿上新人。”^①

余慈度用“一个中国的十字架使者”作她自述的附题，来说明她如何经历十字架而追求成圣的生活。

4. 经历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充满和外面的浇灌。在为上帝作出口的事上她不靠自己的天然口才（她说话有咬舌头的毛病），而是靠圣灵的能力。她注重生命过于恩赐，更不主张一定要说方言才算是得着了上帝的祝福。

5. 认识属灵争战的重要。信徒必须养成时时儆醒祷告的习惯，防备撒旦在信徒心思里的建议和控告。她见证的最后一章就是以“儆醒祷告”为标题。

6. 她和开西属灵领袖们分享普世教会（基督的身体）合一的异象。她的培训职事也是为受训者所在的公会培植人才，而不是把他们吸引到她自己的教会。

她的“祈祷查经处”只是为帮助她尽职而建立的。她去世后，这个机构就失去了它的功用和地位，因而自然终止其存在。但就如前所述，建立这个机构的属灵原则一直到 1950 年才因为政治的因素而终止。



复兴流向的意义

照《圣经》来看，上帝在历代复兴的工作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计划和选择。正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圣灵的运行像风一样，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任意吹动。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凭着他意志拣选他所用的器皿。例如，当余慈度试图眷恋她在朝鲜所经营的属灵天地时，上帝的意旨却是要她回中国，去做上帝复兴中国教会的器皿；而在那时，上帝也正在朝鲜兴起本地人作他复兴朝鲜教会的器皿。当她回到中国不久，上帝就在她不自觉的情形下把她推进复兴的流；而朝鲜的教会复兴也同时爆发了。

1920年，当余慈度的复兴职事随着她的健康恶化而逐渐衰微时，上帝就在中国兴起了一批新生代的布道家。以王载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和他伯特利布道团的同工们）继续了余慈度奋兴布道一面的职事，使福音的火炬在20世纪30年代燃烧得更炙、更广。同时，以倪柝声和王明道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继续了余慈度“内里生命”一面的职事。他们为奋兴布道所产生的“婴儿”提供属灵成长的道路。

同时从1927年起，就是中国教会复兴进入第二期的前后，上帝照着他的意旨，把中国教会复兴的主导地位逐渐从女性转到男性。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第一代的女奋兴家相继凋零：余慈度于1931年去世，葛洁茜患

糖尿病行动受限，蔡苏娟 1937 年患严重眼疾，病困在床。至于新生代的汪佩真、李渊如和侯秀英（她是 30 年代初期在山东一带兴起的女奋兴家）等女性奋兴家也都停止了她们自己奋兴布道的职事，而去参加以倪柝声为首的“地方教会”运动。^⑩

同时，在上世纪 30 年代前六年半的时间，上帝借着新生代的男性布道家在中国各地，从华南到东北，激发起更深更广的复兴运动，使中国信徒的人数激增，也使教会在生命上向下扎根，向上成长（《以赛亚书》37 章 31 节）。当 1937 年日本侵华风暴袭击来临的时候，中国的信徒把复兴的火炬带到了后方，并为抗战胜利后复兴的高潮准备了更多合用的器皿。

注 释

与上帝交接的生命记录

1. 参李常受著《倪柝声——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台北，福音书房，1991）。

前言

1. 参看 *Worldmark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Practices*（世誉宗教习俗百科全书）（Michigan, Gale Research, 2005），Vol. 3: “CHINA”（by Silas Wu）。此数据是根据中国科研机构（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的“统计”和笔者的“估计”而来。本数据包括3000万左右“已登记”的教会团体中的信徒（俗称“三自教会”）和同等数据（或更多）“未登记”的松散教会团体的信徒（俗称家庭教会）

第一章

1. 本章所引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1-2。
2. Fearn (1939), pp. 30, 388。余慈度的父亲接受医学训练是在1850年以前。那时中国尚未有西式的医学院。那么她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多半是那时唯一的基督徒外



科医生马卡提 (Dr. D. B. McCartee) 单独教授的学生。马医生是美国长老会派华的传教士；他也是“在华医生传教士协会”的创办人。1844 - 1859 年期间，他在宁波“教授医学和传道”。宁波离余慈度的出生地杭州只有 70 公里。参 Lockhart (1861), p. 30。

3. Jen (1973), pp. 440 - 443

4. Ibid.

5 Ibid.

6. Spence (1996), p. 186

第二章

1. 有关西教士在杭州的传教史，参见 MacGillivray (1907), pp. 23 - 25, 381 - 382。

2. 同上。

3.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2 - 6。

第三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 22。

2. 当时长江下游的交通主要是依靠运河和交错的水路网。1893 年，甘博师母陪同华安妮院长从上海坐船花了三天三夜才到苏州。见 Fearn (1939), pp. 21 - 24。从杭州到苏州自然要一周以上。南京到上海和上海到杭州的铁路线是分别于 1904 年和 1908 年由英国贷款才开始兴建的。

3. 白乐浚 (1985), 327 页。

4. Stokes (1946), p. 139 引 *Korea Repository*, vol 4, October 1897, p. 400。其中 Stokes 的批注说：“In the fall the first

-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Mrs. Josephine P Campbell arrived, accompanied by a young Chinese, Miss Dora Yui (Yu, Ling - tsu)"
5. 倪林和平 (1943), 16 - 17 页。
 6. 参 Cannon (1926), pp. 100 - 101。关于博习医院建立的详细经过, 参 *Annual Report of the Soochow Hospital, The First* 1884, pp. 1 - 3。蓝华德医生在 1884 年报告说: “我们于 1883 年开始医学课程。1884 年有 9 个月之久每天都开课。”主要教员包括他自己和内兄柏乐文 (Dr. W. H. Park, M. D) 和帕克牧师 (Rev. A. P. Parker)。后者负责教授化学和物理。1883 年只有 7 个学生: 次年增加到 11 个。“除了一个例外, 其他学生都是基督徒。”参 *Annual Report of the Soochow Hospital, The Second.* (1885), pp. 1 - 7。
 7. Cannon (1926), p. 101 说是 1889 年落成, 疑误。
 8. Cannon (1926), p. 60 说费小姐是因健康缘故被迫返美。但据称 Fearn (1939), p. 28 证明她是 1892 年因为结婚离开苏州。此后院务由甘博师母代理。
 9. *Annual Report of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1894, p. 23
 10. Fearn (1939), p. 63
 11. 美国北卡洛来那州 (North Carolina) 南派因市 (Southern Pine) 的葛瑞尔先生 (C. Franklin Grill) 是联合美以美会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 1939 年 Methodist 各派别重



新联合以后的新名称) 北卡州教区会议的档案管理员 (Archivist of the North Carolina Conference)。他于 1998 年 7 月 6 日给著者复函 (原文为英文) 中说: “在现在我们美以美会百科全书中没有提到 Bright Jewels 这个名词。不过我们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档案中曾有记录说这个少年组织在他们那个地方是 1882 年由妇女布道会 (Woman's Missionary Society) 主办成立的。”

12. *Annual Report of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 p. 29.

13. *Annual Report of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1893), p. 23

14. Fearn 1939, p. 63

第四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7 - 11。

第五章

1. Foam (1939), p. 118

2. 关于尹的简史, 参 Kim, Y. H (1935), pp. 45 - 52。

3. Ryang, J S. (1926), p. 18

4. 同上 p. 19。

第六章

1. Campbell, Josephine P., Biographical File.

2. 同上。

3. Stokes (1946), p. 141

4.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of the*

MECS (1897), p. 7.

5.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11 - 14。
6. Stokes (1946), p. 142
7.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of the MECS* (1898), p. 23
8. 同上。
9. *Korean Repository* (1898), p. 395

第七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14 - 17。
2.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1898 and 1899), p. 35: "A Condensed Report of the Woman's Work of 1898 and 1899"

第八章

1. 见 1901 年的年会记录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1901), p. 29 所载俞灵芝的年度报告 (Yui Ling - tsu's Report) 关于培花学堂的建置, 见同记录, pp. 17 - 19 所载 J. Robt Moose 的年度报告。
2. 见 1903 年的年会记录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1903), p. 43 所载甘博的报告 (Campbell's Report)。
3. 同上。
4. 同注 1 之俞灵芝的年度报告。
5. 见 1903 年的年会纪录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1903), pp. 41 - 43。



6. 关于余慈度工作量的增加，见 1903 年的年会记录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1903), pp. 41 - 42。
7. 关于余慈度的“工人地位”，见 *Woman's Missionary Advocate* (1903), February, p. 299 和 May, p. 409。但同书 May, p. 409 的记录，她又列为“女传道人” (Bible Women)。
8. Yu (1916), p. 17
9. 见 1903 年的年会记录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1903), p. 42。

第九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 17 - 21。
2. 关于金永准事件，见 *Yun Chi - Ho Diary* (1915), May 1901, p. 289。 *Korean Review*, 1-3 (March 1901), pp. 118 - 119。他企图将所有西教士杀死的阴谋发生在 1900 年 12 月，见 Underwood (1918), pp. 199 - 201。
3. *Yun Chi - Ho's Diary* (1975), p. 289.

第十章

1. Bebbington (1989), p. 114。也参 Penn - Lewis (1905)。
2. Robert (1907) .
3. Ramabi (1906) .
4. Ramabi (1906), pp. 5 - 9
5. On (1975a): Chapter 22, “The Korean Pentecost”; Also On (1975b): Chapter 4

6. Kim (1992), pp. 47 - 54, 80 - 81.

第十一章

1. On (1975a), "Chapter 21"; On (1975b), "Chapter 5"

2. Bays (1993), p. 162

3. Lyall (1965), pp. 87、90、99、105

4. On (1915a), p. 157

5. Carlberg (1936), pp. 46 - 47

6. 于力工 (1988), 278 - 279 页。

第十二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22 - 23。

第十三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29 - 47。

第十四章

1. 本章引用余慈度的见证均见 Yu (1916), pp. 33 - 41。

2. Bates (1984), p. 39; Bays (1995), p. 164

3. *Chinese Recorder*, May 1909, p. 292

4. *Chinese Recorder*, September 1909, p. 529

5. 宋尚节 (1991), 10 - 16 页。

第十五章

1. 关于葛洁茜生平, 见董艳云 (1989)。

2. *Chinese Recorder* (1909), p. 472

3. Latourette (1929), pp. 593 - 594

4. 查时杰 (1983), 109 - 110 页。

5. 有关安汝慈的简介, 参 Yao (2000), pp. 79 - 83。



6. *Chinese Recorder* (1915), pp. 326, 429 – 433

7. *Chinese Recorder* (1915), p. 433

第十六章

1. 见 Yu (1916), p. 39

2. *Chinese Recorder* (1916), p. 327

3. Yu (1927), pp. 61 – 63

4.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1), p. 439

5. *Chinese Recorder* (1920), p. 515

6. *Chinese Recorder* (1915), pp. 580 – 581

第十七章

1. 本章是根据笔者 2002 年访问高汪杭荪的记录和陈则信 (1982)。

2. 当时结婚仪式中包括要向祖先灵牌跪拜，参 Doolittle 1865, p. 85 附图。

第十八章

1. 关于中西女塾的历史，参 Ross (1996)。

2. 倪林和平 (1943), 1 – 14 页。

3. 同上。

4. 关于宋庆龄的少年时代，参 Seagrave (1985), p. 60。罗元旭《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国现代化百年》(未刊书稿)

第十九章

1. 倪林和平 (1943), 20 – 21 页。

2. 魏光禧 (1981), 6 页。

3. 倪柝声 (1992), 74 页。
4. 同上书, 75 页。
5. 倪林和平 (1943), 20-21 页。
6. 本段引自李常受 (1981), 7-8 页。

第二十章

1. 关于王载得救的经历, 见王峙 (1980), pp. 9-13。
2. 王峙 (1980), 29 页。
3. 倪柝声 (1992), 86 页。
4. 倪柝声 (1992), 86、89 页。
5. 倪柝声 (1992), 88 页。
6. 倪柝声 (1992), 88 页。
7. 倪柝声 (1992), 86-87 页。
8. 倪柝声 (1992), 87 页。
9. 王峙 (1980), 22 页。
10. 倪柝声 (1992), 88 页。
11. 王峙 (1980), 31 页。
12. 王峙 (1980), 32 页。
13. 倪柝声 (1992), 31-32 页。

第二十一章

1. Yu (1927), p. 69
2. Woods (1927); Carpenter (1997), pp. 119-120

第二十二章

1. 新神学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才引起基要派激烈的反击。
2. 关于“开西大会”的详论, 参阅 Bundy (1993), pp. 118



- 144。

3. 参史密斯的属灵自传：Smith (1903)。
4. 见 *China's Millions* (1927), September。
5. 见 *The Christian* (1927), July 28。
6. 赵世光著《复兴讲坛：以赛亚书》香港：灵粮刊社，(1959)，6-7页。
7. 胡蕴琳 (1987)，71页。她在该处提起余慈度的葬礼是在1931年11月15日举行的。

结 语

1. 关于她的见证，见蔡苏娟（1994）和（1979）。
2. 关于李渊如的见证，见江守道（1995），169 - 183 页。蔡苏娟（1982），17 页。
3. 她们在蔡苏娟 1994 中文译本中译为“愉钟”和“春山”。该译本中把“李小姐”（指：李渊如）误译为“卜小姐”。
4. 关于陈玉玲，参梁家麟（1999），143 - 147 页。
5. 《灵光报》第七卷第二期（1928 年 8 月），26 - 43 页。引自梁家麟（1999），138 页。
6. 赵君影（1982）。
7. 梁家麟（1999），139 页。
8. Balme（1921），pp. 112 - 113. 据 Lacy（1948），pp. 176 - 177，天津的费氏妇科医院（Isabella Fisher Hospital for Women）也是因李鸿章夫人得了重病，被监理会女教士 Dr. Leonora Howard 治愈后应该教士请求而建立的。但另一说法是 Dr. Mackenzie 和 Dr. Inwin 治愈的。见 Lacy



(1948), p. 117。

9. 关于“复兴”和“真理”的关系，参 Finney (1989), pp. 15 - 17。
10. 参梁家麟 (1999), 135 页。
11. 《成长》第二期。
12. 倪柝声在 1928 年以前，非常注重他所看见的“地方教会”的异象。以后他更进一步注重“得胜生命”和“基督身体”的亮光。

引用书目

1. 于力工 (1998)。《夜尽天明——于力工看中国福音震撼》。台北：橄榄基金会。
2. 王峙 (1980)。《王载见证录》。台北。
3. 鲍贤玲 (万绍祖夫人)：笔者访问记录。
4. 白乐浚 (Paek, Nak - chun) (1985)。《韩国改新教史, 1832 - 1910》。汉城：延世大学校出版部。
5. 江守道等 (1995)。《福音见证集》。香港：拾珍基金会。
6. 《成长》网络杂志 (www.livingwordpub.com/knway/growth)。
7. 宋尚节 (1991)。《我的见证》。香港：晨星出版社。
8. 《承政院日记》(韩文)。
9. 胡蕴琳 (云麟) (1987)。《他领我手》。香港：证道出版社。
10. 查时杰 (1983)。《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1. 倪林和平 (1943)。《恩爱标本》。上海。



12. 魏光禧 (1981)。《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台北：台湾福音书房。
13. 倪柝声 (1991)。《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集》。台北：福音书房，第一辑十八册。
14. 倪柝声 (1992)。《往事的述说：倪柝声文集》。台北：福音书房，第一辑十一册。
15. 陈则信辑 (1982)。《汪佩真姊妹简史》（高汪杭荪口述）。香港：基督徒出版社。
16. 培花学校 (1982)。《培花学校百年史，1898 - 1998》（韩文）。汉城。
17. 蔡苏娟著 (1982)。《暗室珍藏》（*Jewelry of Dark Chamber*）（苏文峰译）。台北：基督使者协会。
18. 蔡苏娟著 (1994)。《暗室之后》（*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袁厚载译）。香港：晨星出版社。
19. 蔡苏娟著 (1979)。《蔡苏娟：暗室之后续本》（*Paradise: PA, Ambassaor For Christ*）（淦然译）。台北。
20. 焦源廉 (1984)。《我们逃脱了》。台北：校园出版社。
21. 赵君影 (1982)。《我的宗教经验》。台北：中华归主协会。
22. 梁家麟 (1999)。《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
23. 博习医院 (1911后)。《博习医院成绩记：本院创办人柏君六秩大庆之纪念品》（*Soochow Hospital Extras with an Appeal for a Larger Hospital in Honor of Dr. Park's 60th*

Birthday)

24. 董艳云 (Phyllis: Thompson) 著 (1989)。《内地六巾
帼》(Each to Her Post) (林嘉亮译)。台北: 校园出
版社。
25.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
pal Church, South.* (1886 - 1897) . Nashville, Tenn. :
The Southern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26. *Annual Report of the Soochow Hospital, The First* (1884) .
27. *Annual Report of the Soochow Hospital, The Second.* (1885)
28. *Alnnual Report of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3 - 1903) . Nash-
ville, Tenn. : The Southern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29. Balme, Harold (1921) .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
30. Bartleman, Frank, edited by John G. Meyer, (1982) . *An-
other Wave of Revival.* Springdale, PA: Whitaker House,
(Originally under the title Another Wave Rolls In. Voic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 1962) .
31. Bates, M. Searl (1984) . *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M.* New York: The China Program,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 S. A. , New York.



32. Bays, Daniel H. (1993) . “Christian Revival in China, 1900 – 1937,” Edith L. Blumhofer and Balmer, Randall, Ed. ,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33. Bays, Daniel H. (1996) .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 – 1937: A Pentecostal Case Study,” in Stephen Kaplan, ed. (1995) ,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34. Bays, Daniel H. (1996) ,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Bebbington, D. W. (1989) .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London: Unwin Hyman.
36. Bundy, David. (1993) – “Keswick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angelical Piety,” Blumhofer, Edith and Balmer, Randall, Ed. , *Modern Christian Revivals*. Urbana and Chicago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37. Campbell, Josephine P. , Biographical Fi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Archives, Drew University, NJ. Cannon, James (1926) . *History of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s*. Nashville, Tenn.
38. Carlberg, Gustav. (1936) . *China in Revival*. Rock Island: IL; Augustana Book Concern.

39. Carpenter, Joel A. (1997) . *Revive Us Again, The Reawakening of American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0. Chao, Jonathan Tien - en. (1986) . “The Indigenous Church Movement, 1919 - 1927: A Protestant Response to Anti - Christian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1.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The. (1911) . Edited by D. MacGillivray.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42.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The. (1912) . Edited by Rev. G. H. Bondfield.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43. *China's Millions*. July 1875 - May 1952. London: China Island Mission.
44. *Chinese Recorder*. (1900 - 1923) .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45. *Christian*, The. (1927) . London.
46. Codrington, F. I. (1934) . *Hot - Hearted; Some Women Buil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London: 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
47. Doolittle, Rev. Justus. (1865) .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48. Fearn, Anne Walter. (1939) . *My Days of Strength; An American Doctor's For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49. Galloway, Bishop Charles B. (1897) . *Circuit of The Globe*.
Nashville, Tenn. ; Publishing House of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50. Garrand, Mary N. (1989) . *Jessie Penn - Lewis; A*
Memoir. Ontario: Canada; Ontario Christian Books (The O-
vercomer Literature Trust, 1930)
51. Grill, C. Franklin. Letter to the author dated July 6, 1998:
on "Bright Jewels Bands. "
52. Gulick, Edward V. (1973) .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3. Hsu, Immanuel C. Y. (1990) .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4. Huang, Y. Y. (1971) . *While Drinking Water Remember it*
s Sources: A History of Trinity College, Foochow and Angli-
can High School, Singapore. Singapore.
55. Jon, Yu - wen. (1973) .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
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6. *Keswick Convention* (1938), The. London; Pickering & Ing-
lis Ltd.
57. *Keswick Week* (1922), The. London; The Keswick Con-
vention.
58. *Keswick Week* (1927), The. London; The Keswick Con-
vention.

59. Kim, In Sik (1992) . “The Great Revival in 1907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Korean Church.” Th. M. thesis. Pasaden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60. Kim, Y. H. , Ph. D. (1935) . “A Short Sketch of Dr. T. H. Yun’s Life,” in *The Korean Mission Field*, XXXI, No. 3. March 1935, pp. 45 – 52.
61. Kinnear, Angus I. , (1978) . *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Wheaton: Tydale House Publishers.
62. *KoreaMethodist*, The. 1905. Seoul. Val. 1, No. 3 (Jan. 10, 1905) .
63. *Korean Mission Field*, The. 1907. 9, 1908. 4, 1910. 6, 1915. 1
64. *Korean Repository*, 1964. The. Volume V, January – December 1898.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65. *Korea Review*, The. 1 – 3 (March 1901) . Monthly magazine edited by Homer B. Hubert, pp. 118 – 119.
66. Lacy, Walter N. (1948) . *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New York and Nashville: Abingdon – Cokesbury Press.
67. Latourette, Kenneth (1929) .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cMillan Co.
68. Lee, Witness (1980) . *The Recovery of God’s House and God’s City*.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69. Lee, Witness (1983) . *Concerning the Lord’s Recovery*. Ana-



- 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70. Lee, Witness (1991) . *Watchman Nee: A Seer of the Divine Revelation in the Present Age*. Anaheint: Living Stream Ministry.
71. *Lingguang Bao* (Spiritual light) . (1919) . Nanjing: Spiritual Light Publishers.
72. Lockhart, William (1811 – 1896) . (1861) .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73. Lyall, Leslie (1965) .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the Mission Hudson Taylor Bega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74. MacGillivray, Donald, ed. (1907) .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 – 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75. Marsden, George M. (1980) .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 – 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 – 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6. Marsden, George M. (1991) .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lism*.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77.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Korea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Seoul: Trilingual Press. 1897, 1898, 1901, 1903, 1907, 1909.

78. Orr, J. Edwin. (1915) . *The Flaming Tongue*, 2nd edition. Chicago: Moody Press.
79. Orr, J. Edwin. (1975a) . *Evangelical Awakenings in Eastern Asia*.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80. Parker, Alvin P. (1924) . *Southern Methodism in China*. Nashville, Tenn. : Publishing House: M. E. Church, South.
81. Paxon, Ruth (1928) . *Life on the Highest Plane: A Study of the Spiritual Nature and Needs of Man* - Chicago: Moody Press.
82. Penn - Lewis, Jessie (1905) . *The Awakening in Wales (And some of the Hidden Springs)* . Parkstone, England: The Overcomer Literature Trust.
83. Ramabi, Pandita (1906) .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Ghost & Fire*. Second edition. Kedgaon. Printed at the "Mukti Mission" Press.
84. Rawlyk, George A. (1988) . *Wrapped Up in God. A Study of Several Canadian Revivals and Revivalists*. Burlington, Ontario: Welch Publishing Company.
85. Reid, Rev. C. F. D. D. , *The Touch of Christ. A Tale of Missions*. Nashville, n. d.
86. Robert, Mrs. John. Prefaced (1907) . *The Revival in the Khasia Hills*. Cherraponjee.
87. Ross, Heidi A. (1996) . "Cradle of Female Talent: Mc-



- Tyr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s, 1892 – 1937,” Daniel H. Bays, Ed. ,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pp. 209 – 227.
88. Ryang, J. S. , ed. (Prefaced. 1929) . *Southern Methodism in Korea. Thirtieth Anniversary*. Seoul: Board of Missions, Korea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89. Seagrave, Sterling (1985) . *The Song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90. Smith, Hannah Whittall (Mrs. Pearsall Smith) . (1903) . *The Unselfishness of God and How I Discovered: A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91. Spence, Jonathan D. (1996) .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Siuquan*. New York: W. W. Norton.
92. Stevenson, Herbert F. selected & edited (1963) . *Keswick's Triumphant Voice: Forty – eight Outstanding Addresses delivered at the Keswick Convention, 1882 – 1962*.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93. Stock, Eugene (1916) .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Supplementary*. The Fourth Volume [microform] .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94. Stokes, Charles David (1946) . “History of Methodist Missions in Korea, 1885 – 1930”, Ph. D. thesi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95. Thompson, Phyllis. (1982), *Each to Her Post: Six Women of the China Island Mission: Amelia Hudson Broomhall, Jennie Hudson Taylor, Margaret King, Jessie Gregg, Jessie McDonald, Lillian Hame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96. Tsai, Christiana (Cai Sujuan) (1986) .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Paradise, PA: Ambassadors For Christ.
97. Tucker, Ruth. (1985) . “The Role of Bible Women in World Evangelism,” off – print from *Missiology* 13, no. 2, April 1985; distributed by Christian for Biblical Equality.
98. Underwood, Lillian H. (1918) . *Underwood of Kore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99. Wagner E. W. trans. (1984) . *New History of Korea*. Seoul: Ilchokak.
100. Weir, A. (1915) . “1908 Revival in Manchuria,” in *Chinese Recorder*, Feb. 1915, pp. 100 – 108.
101. Wilkes, Paget. (1923) – *The Dynamic of Service*. London: Japan Evangelistic Band.
102. *Woman's Missionary Advocate*. (1894 to 1904) – Nashville, Tenn.
106. Woods, Grace W. (foreword) (1927) . *The Half Can Never be Told*. Atlantic City, N. J. : The World Wide Revival Prayer Movement.



103. Wu, Silas. (2002) . “Dora Yu (1873 – 1931) : Foremost Female Evangelist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Revivalism,” in Dana L. Robert, *GospelBearers, Gender Barriers: Missionary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pp. 85 – 98.
104. Yao, Kevin Siyi. (2002) . *Missionary Women and Holiness Revivals in China during th 1920s*, in Dana L. Robert, *Gospel Bearers, Gender Barriers: Missionary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pp. 73 – 84.
105. Yu, Dora. (1916) .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 Shanghai: Mission Book Co.
106. Yu, Dora. (1927) .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 London: Morgan & Scott.
107. *Yun Chi – Hó's Diary 1897 – 1902*. Vol. 5. Seoul, Korea: National History Compilaltion Committee.
108. Zha, Shijie. (1983) . *Zhongguo Jidujiao renwu xiaozhuan* (Concisebiographies of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 . Taipei: China EvangelicalSeminary Press.
109. Zhao, Junying (Calvin Zhao) . (1982) . *Wodi Zongjiao Jingyan* (My religious experiences) . Taipei: China for Christ Association.

中英对照表

四划

中西书院 (Anglo — Chinese College)

中西女塾 (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s)

仁济医院 (Margaret William Hospital)

公理会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巴教士 (Miss Parmanter)

文德比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开西大会 (Keswick Convention)

开城 (Songdo)

五划

卡尔博 (Gustav Carlberg)

卡西亚 (Khasia Hills)

古约拿单 (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甘博师母 (韩文: 康夫人、姜慕仁女史, Josephine Peel)



Campbell)

白炳屯 (D. W. Bebbington)

白美丽 (Mary Culler White)

白乐文医生 (W. Hector Park, M. D)

皮尔逊 (Arthur T. Pierson)

石美玉 (Mary Stone)

史隆 (Walter B. Sloan)

六划

亨卓斯 (Bishop E. R. Hendrix)

伍伯之 (Samuel I. Woodbridge)

伍兹师母 (Mrs. Henry Woods)

多马·葛理奋 (Dr. Griffith Thomas)

安汝慈 (Ruth Paxon)

牟尔 (A. G. Moule)

艾伦医生 (Dr. H. N. Allen)

艾苏·萨街 (Asuza Street)

艾迪思牧师 (Rev. W. H. Aldis)

坎培·摩根 (C. Cambell Morgan)

连环道 (Circuits)

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乔治·慕勒 (George Muller)

华安妮医生 (Anne Walter)

朴露克医生 (Margret Polk)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七划

何受恩 (Margaret E. Barber)

何思德 (Dixon E. Horst)

吴伯瑞 (John Woodberry)

怀特菲德 (George Whitefield)

罗伯兹 (Evan Roberts)

八划

拉玛白 (Pandita Ramabai)

林乐知 (Young J. Allen)

波尼尔 (W. B. Bounel)

芬尼 (Charles G. Finney)

金倪尔 (Angus Kinnear)

奋兴布道诗歌选集 (Hymn of Reviving)

九划

胡遵理 (Jennie Hughes)

宣道会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哈迪医生 (Dr. R. A. Hardie)

威廉思 (John E. Williams)

柯立 (韩文: 李永福, C. T. Collyer)

津真道夫 (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美以美会（在中国）在朝鲜即“（北）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南）监理（教）会（在朝鲜对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的翻译）

威尔士（Wales）

查里·崇堡（Dr. Charles Trumbull）

费蜜芝医生（Mildred Phillips）

费琦（M. M. Fitch）

宾路易师母（Mrs. Jessie Penn - Lewis）

十划

监理会（在中国）（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监理（教）会（在朝鲜）即“北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倪维思牧师（Rev. John L. Nevius）

桑牧师（Rev. J. B. Thornton）

高登（Samuel Dickey Gordon, 1859 - 1936）

高阳（Koyang）

陶雷（It. A. Tarrey）

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爱莫瑞学院（Emory College）

十一划

博瑞安牧师（Rev. Robert T. Bryan）

康成 (康爱德, Ida. Kahn)

梅尔 (F. B. Myer)

景海女校 (Laura Haygood Girls' School)

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十二划

傅特将军 (Lucius H. Foote)

傅蓝森 (Frederick Franson)

塞弗伦医院 (Severance Hospital)

舒孚尔 (It. W. Shufeld)

鲁雅各布牧师 (Rev. James Walter Lowrie)

鲁斯 (Henry W. Luce. 儿子: Henry R. Luce)

十三划

瑞德 (韩文: 李德 Rev. C. F. Reid)

翟辅民 (Rev. Robert A. Jaffray)

十四划

葛洁茜 (Jessie Gregg)

蓝华德医生 (Water Lambuth, M. D)

十五划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慕迪 (Dwight L. Moody)

摩尔维亚大复兴 (Moravian Revival)

蔡苏娟 (英文名: Christina Tsai)



十八划

魏克斯 (Paget Wilkes)

中国教会中,没有余慈度,就没有中国教会;没有余慈度,就没有中国教会。倪柝声说:“我是因一个姊妹得救的。这个姊妹就是余慈度。”

余慈度与中国教会的复兴渊源何在?她如何为神使用?本书通过史学家吴秀良教授的搜集与研究向您阐释,值得您一读再读!

真挚的推荐——

这是一本既有学术深度,又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对教会内外的人士都有帮助。

北美华人基督教会会长 王忠欣博士

ISBN 978-7-5108-1449-5



定价:37.00元